

炎黄春秋

第 **10** 期
2011年

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座谈“历史问题决议”发表30年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读李锐“流放”日记

目 录

春秋笔

- 1 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雷 颐
7 安庆巡警学堂起义记 尹曙生

群言堂

- 10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李伟东 程 敏 执笔
16 走进全球化 周有光
18 再说新民主主义 王也扬

亲历记

- 20 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 陈其阵
25 荣经“五九事件” 童梓平
28 广州“文革”中打杀“劳改犯” 万绮芬
29 饥饿的学生时代 石圭平
32 我们公社的“101 反革命案件” 宋士华

争鸣录

- 34 走出伪民主误区 许良英
37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 王 龙
40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阎长贵
41 应客观评价曾希圣 张 军

往事录

- 43 批判陶行知始末 李仲谋
49 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 秦卫东
52 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 萧 凌

品书斋

- 57 骨头如故作铜声：读李锐“流放”日记 奚 青

访谈录

- 64 远征印缅见闻 刘金海口述 刘德玺 整理
69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被访谈者 朱永嘉 访谈者 顾训中

人物志

- 75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赵英秀
77 南怀瑾：海峡两岸的信使 周瑞金

求实篇

- 80 长征中几个细节的考辨 夏宇立
86 罗隆基人权与法治史观 刘志强

忏悔录

- 92 我打地主堂曾祖母 黄仪瑛

编读窗

- 93 对《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的几点意见 王伯惠
63 《汉阳一中事件》的纠误 李功成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淳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执行主编：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周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 行 部 邮 箱：yhcqfxb01@126.com

电 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 公 室：68522852 (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 雷 颐

“辛亥革命”已整整一百周年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一、“制造革命”的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但它的成功、或者说清王朝的覆亡却并非偶然,而是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一次次避免最终灭亡的机遇面前,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使矛盾逐渐累积最后爆发。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打败,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以夷变夏”;二十余年后洋务派才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也被斥为“奉夷为师”、“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敌人的武器远远胜过自己,尽最大可能学习、掌握、拥有这种武器,本是每一个“正常”的政府的正常反应,但坚持华夏中心论的清政府,却无此“正常”反应,从1865年有人提出建电报到187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4年时间;从1872年有人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7年。诸如架电线、修铁路、造枪炮对自己的好处、对自己生死存亡的重要显而易见,不需要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政府就能看出。此类事涉及利益相对不大,尚如此被动,直接分配、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就更不必说了。

惨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国人认识到体制变革的重要,发动维新变法,却被残酷镇压。“戊戌变法”实际是非常“温和”,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一旦“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就很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平和的改革,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这样,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再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至多只有“一线希望”。然而清廷对这“一线希望”亦未珍视,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

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进行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协。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需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主要内容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此时,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无济于事,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

1905年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影响大增,不久就迅速高涨,形成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

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采纳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然而,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这次改官制,各利益集团你争我夺,斗争白热化,为避免更大的动荡,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

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分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由满人担任。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与此大有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的后果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踬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远在日本东京、与革命派激烈辩论,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当即在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清廷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

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面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

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二、改革与革命之门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

激进的革命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对此宪法草案坚表反对,认为其“偏重于命令权”,“专制之余风未泯”,“最足假以文饰其专制”,并警告清廷若要“出其狡猾阴险之手段,假钦定宪法之名,颁空文数十条以愚吾民”,必“动摇国本而伤君民之感情”。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

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其实是梁启超最早发动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应效仿当年英国“权利请愿运动”:“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国内立宪派响应他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并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一个立宪团体,名为“政闻社”。政闻社在其“宣言书”中说:“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其主张是“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公诸国民”,实行国

民政治 ;只有召开国会、君主立宪才能达此目的。并强调从事合法的活动与和平的斗争 :“常以秩序的行动 ,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 ,绝无干犯尊严之心 ;其对于国家 ,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 ,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 ,而集会结社之自由 ,则各国咸认为国民公权 ,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 ,岂其倏忽反汗 ,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值得注意的是 ,梁启超实际对自己以前主张的“开明专制论”所持的“国民程度不足论”作了检讨 ,公开提出改造“恶政府”。从“开明专制”到“立宪” ,从“国民程度不足”到“恶政府” ,梁启超的思想明显“激进化”。政闻社的纲领有四点 :一 ,实行国会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二 ,厘定法律 ,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 ,确立地方自治 ,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四 ,慎重外交 ,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成立后 ,活动重点放在国内 ,派大批成员回国 ,广泛联络各地立宪人士 ,推进国会请愿运动。政闻社在国内的发展虽不顺利 ,国会请愿运动却一浪高过一浪。1907年 ,杨度以他领导的宪政讲习会的名义发表意见书 ,号召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 ,力争开国会。9月25日 ,宪政讲习会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等四人领衔、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 ,请求开国会。请愿书指出 :“国家不可以孤立 ,政治不可以独裁 ,孤立者国必亡 ,独裁者民必乱”。只有立宪开国会 ,才能消弭革命的祸乱 ,“独裁之弊不除 ,内乱之源不塞”。强烈要求在一两年内就开国会。

对此请愿书 ,清廷不加理会 ,但是 ,请愿书在报上公开发表后 ,影响巨大。全国各立宪团体、开明士绅、甚至一些官员都起来响应。

面对如此局面 ,慈禧太后与支持她的顽固派官员认为任其发展最后无法控制局面 ,于是决定镇压。但是 ,如何镇压却并不简单。杨度是请愿运动的最重要的发起者 ,但在请愿运动高潮时由袁世凯、张之洞保荐 ,被朝廷委任为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提调 ,已是四品高官。影响同样大的是张謇领导的江苏预备立宪公会 ,但张素以稳健著称 ,且与朝中许多高官私交甚好 ,与袁世凯关系尤其密切。因此 ,慈禧无法也无意以此二人或此二会“开刀”。

在请愿高潮中 ,政闻社也以全体社员名义致

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 ,提出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的主张。而且 ,自称政闻社成员和法部主事的陈景仁从南洋单独致电清廷 ,不仅要求三年内开国会 ,而且要求将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康、梁素为慈禧所恨 ,于是 ,慈禧决定拿政闻社“开刀”。7月25日 ,朝廷突然发一上谕 ,严责陈景仁 and 政闻社 :“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 ,且多曾犯重案之人 ,陈景仁身为职官 ,竟敢附和比曜 ,倡率生事 ,殊属谬妄 ,若不量予惩处 ,恐谤张为幻 ,必致扰乱大局 ,妨害治安” ,“着即行革职”。

对陈景仁的“革职”使人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因为上奏、请愿要求开国会的官员为数不少 ,独独惩罚陈景仁明显不公 ,舆论哗然 ;可笑的是 ,陈景仁是“捐班”出身 ,其实是一个南洋商人 ,人都不在国内。但清廷就是要用此来镇压政闻社 ,同时敲打整个“立宪运动”。8月13日 ,朝廷又突然下旨查禁政闻社 :“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 ,内多悖逆要犯 ,广敛资财 ,纠结党类 ,托名研究时务 ,阴谋煽乱 ,扰害治安 ,若不严行查禁 ,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 ,认真禁止 ,遇有此项社夥 ,即行严拿惩办 ,勿稍疏纵 ,致酿巨患。”由于朝廷严禁 ,政闻社已难于生存 ,不得不宣告解散。

朝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 ,具有多重悲剧意义。首先 ,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 ,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 ,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 ,最后却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这对他个人来说 ,是悲剧 ,也是讽刺。更广些说 ,也是整个“立宪”的悲剧 ,主张和平变革的立宪派的精神领袖都不能回国、还被清政府通缉捉拿 ,这本身就使寄希望于清政府“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 ,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当然 ,更是清廷的悲剧 ,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 ,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 ,不仅不想设法抚平创伤 ,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 ,不仅不让其为己所用 ,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 ,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敌人。这也说明 ,清政府确实失去了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机会。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 ,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1910年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人就公开号召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他们和清廷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进一步说,是士绅、立宪派认为其是真还是假最重要。因为无论清政府做什么,革命党人自然都激烈要攻击,不足为据。所以,如果广大士绅、立宪派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哪怕它是假的),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哪怕它是真的),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说到底,其实是政府信用问题。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还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

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12日,立宪派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次日就确定了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与会人员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后来知道一时无法达到目的,便做妥协做让步,只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6月6日呈请都察院代奏。但朝廷却置之不理。联合会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内阁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亡国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联合会人员满腔愤怒,又写了一篇通告各省团体书,指出政府罪恶滔天,人民对它深恶痛绝,并严厉驳斥了上谕。

对人们忍无可忍的皇族内阁,立宪派仍要妥协、仍不愿最后与朝廷决裂,但清政府却拒绝妥协。清政府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走向革命、弃它而去。越到关键时刻,清政府的政策将自己的“利益边界”划得越清晰、越狭窄。至此,晚清立宪的改革之门终被清政府彻底关闭。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越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彻底关闭之日,就是革命之门完全敞开之时。

三、总崩溃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的政策也摇摆不定,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经它同意的、具有合法性的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

从理论上来说,湖广铁路借款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职权,必须经资政院议决通过;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权利存废,属于咨

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议决通过。可是,皇族内阁竟然擅自决定实行,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

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三十余名手无寸铁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史实彰彰,不须多言。

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得到了立宪派领袖汤化龙的赞同、支持,他通电各省立宪派,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他的作用尤大。各省立宪派迅速响应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立宪派从“反革命”到赞同、响应革命的根本性变化,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的后果,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历来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他们是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一旦他们支持革命,统治基础动摇,清政府就难以维持了。所以,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

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颞顽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

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然势已至此,奈何者谁?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继)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安庆巡警学堂起义记

——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而作

○ 尹曙生

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1873~1907年)领导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英勇行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大事。一些近现代历史书籍对这件事都有记载,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也有反映。但是都不那么详细、具体,有的甚至有史实错误。它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起义为什么在短短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有哪些经验教训?笔者因工作关系,阅读过国家档案馆有关史料,现整理记载如下。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3年游历日本,1904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和秋瑾(他们俩是表兄妹,也是好朋友,私人感情很深)办大通学堂,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积蓄革命力量。1906年春,为进行革命活动,徐锡麟捐资(拿钱买官)成为清政府道员,赴安徽候补,由其表叔、时任湖北学政俞廉三和浙江巡抚寿山推荐,被恩铭任命为巡警总局会办兼巡警学堂(警察学校)监督(总办是毓秀,不到学堂管事,由徐锡麟主持全面工作)。1907年春,他与秋瑾密谋,准备择机在皖、浙两省同时举行起义,然后占领中国东南各省,再图全国。可是光复会的一个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称光复会首领光汉子已经进入安徽官场。两江总督端方获悉,紧急电令安徽巡抚恩铭搜捕光复会首领光汉子(徐锡麟的化名),恩铭不知道光汉子就是徐锡麟,他将侦办这件事交给徐锡麟。徐锡麟十分震惊,意识到恩铭会从各方面加紧侦办,也许恩铭对自己有怀疑,交他侦办这个案子,是有意试探他,很快就会知道他就是光汉子。形势危急,刻不容缓,必须提前举行起义。同时他得知秋瑾因为同样原因准备在5月26日提前举行起义的消息后,虽然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仍决定5月28日趁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届时趁军、政界要员出席之机,举行起义,将清廷在安徽主要官员一网打

尽。擒贼先擒王,其重点目标是刺杀恩铭,使安徽的清廷官员群龙无首,失去指挥者,这样,成功的把握就大,对起义后扩大斗争规模大有好处。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5月19日徐锡麟亲往巡抚衙门,请恩铭出席28日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检阅学生受训情况。恩铭并没有对徐锡麟有任何怀疑,满口答应出席,但是因为他要在28日参加朋友张次山母亲80大寿宴席,在时间安排上有冲突,于是徐锡麟决定将毕业典礼提前到5月26日举行。恩铭答应了。

徐锡麟认识到由于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更加不足,只好打算在26日毕业典礼正式开始之前,设宴将清廷在安徽的主要官员们先请到巡警学堂花厅,事先在那里埋下炸弹,到时候引爆,将他们全部炸死。

在这关键时刻,5月25日光复会骨干分子、徐锡麟得力助手陈伯平(1882年生,别号光复子,浙江绍兴人,1906年初随徐锡麟到日本留学,入支那学堂学巡警,同年秋应秋瑾电邀回国,协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马宗汉(浙江慈溪人,1905年加入光复会,1906年1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同年4月回国,在家乡任教)从上海来到安庆,得知提前举行起义,感到太仓促了,要求徐锡麟改变计划,延期举行起义。徐锡麟对他们说:端方电令恩铭,清廷已经知道有人要举行起义,正在加紧秘密侦查,如不提前举行起义,我们都将成为阶下囚。他还对陈、马二人说:“你们不必怀疑,一切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起义也布置好了(其实起义工作根本没有准备好——笔者)。只要我们杀了恩铭,便可宣布反清革命,在安徽,除了几个满清官员外,那些汉族官员,只要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他们就会醒悟过来,拥护我们(这个估计也彻底错了,正是一个汉族官员洞察他的计划,密告满族官员,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笔者)。

那些不拥护我们起义的人,由于我们事先破坏了通信联络,使他们失去联系,不能调动军队来镇压,而我们的革命援军就会到来,浙江方面也会支持我们,先拿下安庆,下一步我们就会拿下南京。”陈、马二人得知恩铭已经从端方那里知道有人要举行推翻清廷的起义,必然会抓紧侦查活动,也认为起义时间越早越好,表示赞成徐锡麟的意见,决心和他共生死同患难。当日夜里,他们三个人起草起义文告,制作光复会军旗一面,上书“光复汉族,大振国权”。陈伯平代表光复会,将“讨虏大元帅”的印鉴交给徐锡麟,然后他们将秘密运来的四箱子弹、十余支刀枪、数枚炸弹运进一间未住人的学生宿舍,以备急需时用,并对第二天的起义细节,做了妥善安排。

26日凌晨,徐锡麟换上一身崭新警服,佩带刀枪,来到学堂操场,对集合起来的学员发表演说:“我来皖省并非贪图利禄,为的是矢志救国,诸君行止坐卧,当不忘救国二字,如忘了救国,便失去人格。我自到校以来,与诸君相处不久,然感情弥深。我为救国责任所系,不敢苟且偷安,所以有特别的计划将要于今天实行。你们要体察我心,助我成功。”

徐锡麟演说时声音高亢,情绪激昂,深深地感动了学员。但是学员们有些茫然,不知道他所说的“救国”的确切含义、不知道他说的“有特别的计划将要于今天实行”的是什么计划,他今天要干什么?学生们一头雾水。接着,徐锡麟拿出警哨,对学员说:“如遇紧急情况,以警哨为号,听到哨音,大家立即集合,听从指挥。”

学员散去之后,徐锡麟又到学员宿舍同他们交谈,说:“今天大家就要为人民求幸福了,我与你们是师生之谊,假如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才是。”学员们仍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接着,徐锡麟来到学堂前客厅,总教习(教官)赵廷玺、教习胡国宾、收支委员(后勤官)顾松在那里等候,徐锡麟命令顾松告诉门卫,待恩铭等各部要员来到学堂后,立即把大门关上,任何人不得出入。徐锡麟不了解顾松,就轻易下达这样一道草率的命令,铸成了大祸。顾松虽然答应照办,但颇为怀疑徐的动机。就在这时,藩台(仅次于巡抚的最高行政官)冯煦、臬台(司法官)毓

秀、学台(教育、考试官)沈曾植等走来,徐锡麟出去迎接。顾松对走近自己身边的毓秀悄声说道:“徐会办不是好人,各位大人要警惕!”毓秀虽不露声色,但暗自吃惊。

过了一会,恩铭坐着八抬大轿,在文武巡捕的护卫下来到巡警学堂,徐锡麟将他迎进客厅后,对来宾大声说:“宴席已在花厅摆好,请大帅和各位大人先去用膳,然后再参加学员毕业典礼。”恩铭听了不置可否,环顾左右官员,只见毓秀向他摇头,引起他的警觉。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对徐锡麟产生怀疑,于是便说:“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酒就不喝了”。徐锡麟听了这话,想到在花厅炸死他们的计划将要落空,心中焦急,但是并不慌张,随机应变道:“大帅既然不舒服,就请到东礼堂观看毕业典礼吧”。于是恩铭和其他官员在徐锡麟引导下来到东礼堂坐下。

陈伯平、马宗汉潜伏在花厅准备引爆炸弹、刺杀恩铭的行动落空,只好暗带武器到东礼堂待机而动。

上午九时整,毕业典礼开始。总教习赵廷玺指挥队伍,发出口令,向恩铭行谒督礼。礼毕,站到一边。接着,徐锡麟站起来,走到恩铭面前,行礼毕,然后说道:“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他在给陈伯平、马宗汉发出的刺杀恩铭的信号。恩铭大惊,紧急问道:“徐会办从何得此消息?”话音未落,站在廊阶下的陈伯平,向恩铭投去一枚炸弹,由于准备不足,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见到这种情况,只好自己动手,乘机大声对恩铭说:“大帅放心,我一定将此革命党捉拿归案。”说话间,他从长筒靴中抽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猛射,恩铭应声倒下。陈伯平、马宗汉也一起开枪射击,礼堂顿时大乱,官员们纷纷逃命。恩铭身中7弹,卫士不知所措,一死一伤,其他官员也有数人重伤。恩铭仆人背着他想逃走,被陈伯平发现追上,又补了几枪,当场死去。礼堂里满族官员全部逃走。徐锡麟对没能将他们关在学堂一网打尽,十分恼火,正遇上收支顾松,对其大声斥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把所有出入的门关上,还没等顾松回答,举枪将其击毙,然后跑到大门口,又将看门的卫兵击毙。再返回来吹哨集合学生。300名毕业生,只到了50余人。他高声训话,说:“今日本堂毕业大典,不幸潜藏坏人,枪击

府台,却喜刺客就擒,已经被我枪毙,但惟恐尚有党羽,不可不防。我们都是警界中人,必须准备枪械,请跟随我去捉奸细”。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学员说实话,集合起来的学员不明就里,跟着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直扑巡府衙门。那些逃回巡府衙门的满族官员,布置重兵把守,严阵以待。徐锡麟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带着那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向城西大珠巷军械所进发。学员们这时才真正知道徐锡麟的目的,于是50多名学员有20多名趁机逃走了,没有逃走的只有30名学生。军械所总办闻之革命党要来,带着钥匙逃跑了。徐锡麟带领的学生虽顺利进入军械所,可是枪支弹药库房的铁门坚固无比,怎么也打不开;在另一间库房里得到6尊大炮和几颗炮弹,但是不能派上用场。徐锡麟只好写信给他认识的驻扎在安庆东门的新军一标(相当于团)二营管带王则宾,命令他杀掉恩铭的心腹、一营管带樊卫堂,然后和他会合;又写信给新军炮营管带吴介麟,命令他带兵入城声援。可是城内已经戒严,送信的人无法出城,吴介麟得悉起义消息,虽带领炮营军队前去营救,却被阻于城外,只好返回。

徐锡麟占领军械所之际,从学堂逃回的藩台冯煦,组织军队追剿徐锡麟,派缉捕营管带杜春霖率兵追捕,悬赏3000两白银捉拿徐锡麟,并电告两江总督端方,派兵前来镇压起义军。

杜春霖接到命令,踌躇满志,先独自一人来到枪械所面见徐锡麟,劝他投降,只要放下武器,保证他逃跑出城。遭到徐锡麟拒绝。其实杜春霖名为劝降,实则是来侦查徐的军事实力,而徐锡麟没有看清他的目的,没有把他扣下,让他回去,留下祸患。当杜春霖知道徐锡麟所带起义队伍不过二三十人,枪不过几支,于是带兵围住军械所。起义军利用军械所建筑物作为掩护,双方战斗两个小时,僵持不下。毓秀又增兵几百人,将军械所重重包围。捉拿徐锡麟的赏银由3000两增至7000两,后升至1万两。但清兵慑于革命党的英勇无畏精神,不敢冲进军械所。

激烈战斗持续6个小时,起义军先后打死打伤巡防营和缉捕营几十名官兵,陈伯平也在战斗中英勇献身。这时,起义军所剩子弹不多,援军又无消息,马宗汉对徐锡麟说:“起义难以成功,不

如焚烧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摇头道:“不行!我们革命党要杀的是满人,若是烧军械所,则是黑白不分,全城将化为灰烬,百姓遭殃。”马宗汉又提议说:“那我们就用那几门大炮开炮,清兵必然躲避,我们就趁机冲出去,否则只能坐以待毙。”徐锡麟摇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这开花炮厉害得很,城中居民密集,一颗炮弹落下,会有多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我们革命党的行动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岂有伤害人民的道理!这是我宁死也不会做的。”

清军火力越来越猛,离军械所越来越近。徐锡麟命令马宗汉带领未牺牲的二十几名学员从后面越墙而出,各寻生路,日后再图大业。等他们走了以后,徐锡麟脱下警服,穿一件衬衫,一条黑裤,翻墙越屋离开军械所。杜春霖带领的缉捕营占领了军械所,方知徐锡麟已不在那里,便命令对周围民房逐一进行搜查,不多时在大珠巷一姓方的居民家中,将徐锡麟捕获。

徐锡麟被押到督练公所,由冯煦和抚幕张次山、臬司毓朗会审。冯煦问他:“恩铭是你恩师,你初到这里,他就让你充当陆军会堂会办,又让你当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监督,待你如手足,你为什么这样毫无心肝?”徐锡麟答道:“他待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了平天下的公愤。”审毕,要徐锡麟在笔录上签字,他奋笔疾书,写下如下话语:“为排满事,蓄志几十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满贼,别无他为。”

当晚,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被斩首挖心,时年34岁。恩铭的心腹卫士把徐的心、肝割下炒熟下酒。

几天后,马宗汉和越墙逃跑的二十几名巡警学堂学生先后被捕,8月24日马宗汉被杀,年仅24岁。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失败。

7月10日,秋瑾得知安庆巡警学堂起义失败,徐锡麟牺牲。她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别人劝她赶快离开绍兴,她不愿意走,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以死相待。绍兴绅士胡道南向清廷密告秋瑾是革命党,徐锡麟同伙。7月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 李伟东 程 敏 执笔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这一拨乱反正的重要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回顾从“文革”内乱到改革开放的艰难转折,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南方周末》报社在京举办了“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胡德平、高尚全、宋晓梧、杨启先、江平、章百家、何方、孙长江、郭道晖、张胜、沈宝祥、马立诚、周为民、王长江、黄方毅、于建嵘、张曙光、张木生、张维迎、王占阳、王小鲁、常大林、陈有西、吴思、雷颐、蔡霞、杨继绳、张剑荆、李楯、丁学良、章立凡、何兵、王海光、王贵秀、丁东、高峰、吴稼祥、张鸣、展江、卢跃刚、胡舒立、项小米、降边嘉措、杨鹏等来自理论界、学术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

与会者认为,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极大的勇气和远见领导形成了这样一份历史文件,这一文件系统分析了党在三十二年执政历程中的得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个人崇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决议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区分开来,对争论严重的问题采取“搁置再议”的做法,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

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

与会者认为,必须守住《决议》所体现的彻底

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也一分为二的底线;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用“文革”的方式处理,而应该通过继续全面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巩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解决。

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又处在改革的一个关键期,《决议》制定过程和《决议》本身所体现的很多做法和精神,对于解决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决议》通过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训,提出了以党政分开、扩大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实践中,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配套改革的滞后等原因,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现将会议主要讨论成果分四个专题综述如下(各位发言人的发言全文见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一、《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须坚守《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里

程碑式的作用。

胡德平说: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刚才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些经过了“文革”、也经过改革的人应该明确,我们走上了“活路”,但是现在负担还很沉重,还有很多问题。

宋晓梧说:《决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其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绩。

张胜说:我们重温《决议》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借鉴就是对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退缩,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回避自己的失误,有直面问题、检讨错误的勇气。

王长江说:《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担当。我所说的精气神,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体现。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而不是得过且过。

王海光说:《决议》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文件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全党思想解放的过程。《决议》代表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周为民说:《决议》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指出了毛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表明我们共产党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教育,深刻反思认错,痛下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为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李楯说:《决议》最大的价值,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现场

命的理论。

吴思说:《决议》放弃了“文革”理论,回到了八大路线,就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发展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这是一个进步。《决议》总结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这个总结很好。

陈波说:这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及支持“文革”并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政治判决是镇制党内各种公开的与潜在的“文革”势力的定海神针,是极“左”势力的一副魔咒。

章立凡说:从政治层面观察,首先应该肯定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执政党达成的党内共识,是当时党内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有了这个公约数,执政党才能以此为基础,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杨继绳说:《决议》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

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剧。

郭道晖说:《决议》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就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而言,初步打破了毛的神话和两个“凡是”。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左”的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余孽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30年后对《决议》科学性的再认识

座谈会在充分肯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在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氛围中,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看法。

胡德平说:《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时候,也说到他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于中央之上。《决议》说“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四人帮”集团,——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

宋晓梧说:对《决议》有困惑,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决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并没有否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问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处理劳资矛盾,这有没有道理?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日益多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好,还是建立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好?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结论上往前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和谐劳资关系,而不是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沈宝祥说:《决议》中有些话,就说的不够充分,“宜粗不宜细”嘛。有些话,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实际,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王贵秀则强调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间点应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应充分肯定华国锋同志的历史作用。

蔡霞说: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能够解决。我们需要汲取前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有的人至今肯定斯大林体制,批判和归罪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如何看待斯大林体制,实际上可能影响到以后党的走向与思路。

王海光说:《决议》毕竟是一个政治决议,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历史,有许多历史认识很不到位,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执政的两年,评价的都很不够。再比如说《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一个切割,把正确的思想当成党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不当毛泽东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丁东说:要承认这个《决议》有历史局限性,对建国以来给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反思不彻底,四千个高级干部中有人已经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见,没有吸收进来。对毛泽东过于维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

张曙光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决议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认了一些错做了一些检讨,否则我们也不会有30年来的进步。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

杨继绳说:《决议》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全面肯定,还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如大饥荒)。《决议》回避了造成“文革”的制度背景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

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

雷颐说：由于历史受到权力掌控，权力往往选择性记忆，要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对这一点我们做历史研究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和遗忘作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历史记忆？因为有些人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由于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觉得那个年代或者是物质贫困精神丰富，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不是无视就是无知。

于建嵘说：这个《决议》又存在非常严重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执政党治国理念没有进行全面检讨，对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探索。

吴思说：《决议》不足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否定“文革”，“大跃进”和“反右”，当然不错。但《决议》肯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成绩，而是失误。否则就用不到改革开放。大方向错了，走得再稳再快也不值赞扬。《决议》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也不符合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

高峰说：历史发展证明，在国家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私人企业实行公有化，搞“社会主义改造”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违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设想。

三、关于当前各种思潮和体制现状的评析

鉴于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潮涌动，与会者也对各种思潮进行了评析，其中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文革”回潮思潮做了广泛的讨论。

胡德平说：近年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鼓吹“文革”这种东西好像在“复活”，有人留恋它；有的人尽管不信“文革”，但却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要守住！另外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有些人反对《决议》的这条底线，如果他们拿出论文、拿出实践来辩论那也好，如果只是一个口号，那也是一种利用。中国人民吃这个亏吃得

太多了！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也说到了《决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提高认识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说这两个底线也弃而不守了，那么中国人也太没希望了吧？

高尚全说：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一是政府行政主导，二是受控市场。所谓模式就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我国仍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就是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近年来，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纵容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对中华民族未来将会造成巨大的祸害。

张木生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共产党的领导要改革，要完善。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极左，越来越表现在城市里面而不是农村。今年的“苏州事件”、“杭州事件”、“广州事件”、“大连事件”，大规模的冲突都爆发在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目标就是广场，民粹主义和极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国搞普世价值，这和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广场集合，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广场民主的情况下智商最低，越来越极端的口号越有人接受，这在全世界都有历史教训。今天应回到原点的新民主主义，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直到国际大环境允许我们建成够格的社会主义。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来解决在国际大格局下的新问题。

黄方毅说：当前人们在热议新民主主义,并提出将此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而非终点,对此我赞成。我关心新民主主义“1.0版”,70年前的历史就一个词,宪政。凭着这个,中共赢得人心,把全国爱国与正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也凭着这个,把广大知识分子吸引过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王占阳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做了详细阐述。

张胜说: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相伴而来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败的泛滥,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因为一级政府要抓好经济就要善于经营好本地的资源,也就是要经营城市,把你所辖的城市、农村当做商品和资源去经营,政府成了公司,市长、县长成了董事长,他可以招商、发包、配发资源,名正言顺地坐收红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公权力的商品化、商业化、私有化,腐败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了。

王海光说《历史决议》在今天还是确认党内政治动向和社会政治动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坐标。现在一些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唱红”,颂扬“文革”,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被《历史决议》否定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出现了历史的错乱。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倒退。说明我们的改革底线现在已经发生了动摇,改革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

周为民说:纪念《决议》的意义集中地体现在今天会议的主旨上,就是反对倒退,坚持改革开放。因为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使人非常忧虑,那种可能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已经是现实地存在着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那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和行为及其对社会的蛊惑,另一方面来自在这个问题上暧昧摇摆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倾向。中国是在一条生路上继续前进以争取光明的前途,还是倒退到死路上去,现在正处在非常严重的极其紧要的关节点上。

丁学良说:我一直认为,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文革”中激进行为甚至暴力行动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以后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监督上层官员的渠道越来越收窄,到了1966年基本没有了。等到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的时候,底下人就把多年来积累的民怨发挥

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是普通民众在“无法无天”的最高领导者的亲自领导下,多年累积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如今国内有些人向往乃至热衷于重拾“文革”的办法,恰恰是近年来普通老百姓合法的和自下而上制约、抗议、改正上层权力机关滥用职权的渠道越来越少的折射。合法的渠道越少,非法的做法就越具有吸引力。

张维迎说: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只有想当官的,没有想干事的人;只讲关系,不讲是非。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条款,或者根本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

四、对下一步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希望

与会者对下一步改革开放的重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胡德平说: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很好,刚才有同志还说到了这点。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这个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是一个什么理念的执政党?对人民的要求,对世界的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吸收了些什么?关于民主集中制,我觉得民主一直很弱势,集中很强势。集中就是权威,只要党内有权威在,只要省里、市里有权威在,就是很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婢女。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真正的民主主要是发挥好了,集中也就在里面了。怎么做到两者统一和谐,这是党要研究的问题。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来?不要把党性孤立和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于之外,确实很可怕。我觉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乱了,比如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以前看有关材料,我也被吓蒙了,如果你说“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评者的意思是必须把“坚持”放在“改善”一词的前面,这样才“顺理成章”。《决

议》是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是目标,但前提是必须“改善”。不在内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号,于党不利。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现在是不是这个时机,我还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提出这个任务,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高尚全说: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是能不能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关键。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有紧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同时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然高水平小康社会有落空的危险!

于建嵘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不是要回到争论不休的历史评论中去,而是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有明确回答:第一,国家的权力到底属于谁?第二,公民有哪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第三,如何保障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第四,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何兵说:国家和政党的中心任务,都有历史的阶段性。很多人说,经济繁荣会带来政权稳定,这是错误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爆发的。下个时期,党要“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最好同时提,以“政治和经济建设为重点”。我们不仅要与外国拼经济,更要与外国拼政治、拼制度。制度拼不赢,经济最终不可能拼得赢。政治要让人民讲,不要总是对人民讲政治。司法改革要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只要司法是公正的,人民就有希望,政局不会出现大变动。

陈有西说: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

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

蔡霞说:既要防止“文革”重演,又要解决好当前的贫富差距、党内腐败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靠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前走,把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

李楯说:我认为,还是要认可利益主张多元,要有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机制。第一,要确立认可“别人和自己不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第二,要构建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宪政、法治,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要走向宪政,最根本的是要启动早已停滞的改革——即:启动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

郭宇宽说:能够有公共讨论的平台是最关键的。当年要是毛泽东能就政策和刘少奇彭德怀公开辩论,怎么还能搞得起个人崇拜呢?鼓励公开的对话辩论,才能从事实上改变个人迷信和各种迷信的土壤,避免再走“文革”覆辙这样的教训。

王占阳说:“有中国特色的”本来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其含义是“我不搞你苏联那一套,我们中国要另搞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又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有中国特色的”本质是告别苏联那一套,转向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排除了只要“中国特色”不要“世界一般”的保守主义。

杨继绳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郭道晖说: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第三次思想解放。主题是执政党自身改革

走进全球化

○ 周有光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聚合运动中不断前进的：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国家到国家联盟，从国家联盟到世界组织联合国，实现全球化。

农业化时代，安土重迁，没有全球化。工业化时代，不断扩大国际贸易，开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穿透各国的国境界线，全球化一往无前。

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立场，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评价。

经济全球化

和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核心是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变。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基本理念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吴思说：为什么一直说民主，一直不能实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强调民主。建国后，八大仍在说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文革”提出了大民主。《决议》否定“文革”，但也主张高度民主。现在仍在说民主。为什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可以证明，毛泽东早就知道，民主是走出兴衰循环的正确道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我的看法是：领导人有一种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人民抄一条近路，一步跨进天堂。后来的实践证明，所谓的近路是弯路。

张剑荆说：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以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后能不能这样讲，经济问题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在历史决议通过30年后的今天，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执政党能不能像30年

经济全球化改善了全人类的生活。举例略谈虚拟工厂和生产外包。

虚拟工厂：

美国的航天飞机最近结束服役。航天飞机不是在美国一国制造的，而是分成若干部件，举行国际招标，由世界各国各显神通，精密分工，合作制造的。例如，奥地利得标制造航天飞机的一扇门，加拿大得标制造航天飞机的一个机械臂。

每个零部件严格按图纸生产，美国航天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还在电视里监督得标各国的生产进程。各国把部件制造成功以后，运到美国，由美国集合组装，成为完整的航天飞机。虚拟工厂是高科技的生产全球化。

前那样拿出一个新的改革的纲领？我们呼唤执政党要有这样的历史感、勇气和担当。

陈波说：我们要解决中国融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体制问题。所以我非常同意郭道晖先生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由专政党转成宪政党，要用宪政的手段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

高峰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学习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政治勇气，为党和国家命运担负起改革政治体制的历史责任。

沈宝祥说：《决议》是解决党的问题。今天从总的问题来看，仍然是党的问题，关键在党。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关键在党。党的关键又在哪里呢？关键在党的改革。我们常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我认为，就是要把我们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党。现代化的党，主要的，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科学化。

马立诚说：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

（责任编辑 吴思）

事有凑巧,我到奥地利参加学术会议,会议组织参观奥地利为美国制造的航天飞机的门,门上一个螺丝钉价值 5000 美元。

生产外包:

经济发展,工资上升,需要较多劳力的企业无利可图。为了减轻成本,把工厂迁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继续生产。例如玩具工业,起初主要在美国,后来迁移到欧洲,到日本,到中国香港,今后可能再迁移到中国内地。生产外包,工厂迁移,使难于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也开始进入工业化。工业化走向全球化。

中国改革开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实行生产外包。原来反对资本侵略,现在欢迎外资来临,虔诚的信徒百思不解。邓小平南巡,就是去说服人们,转变思想,适应时代。中国跟“世贸”谈判,经过 16 年之久,最后悬崖勒马,达成协议。中国一只脚跨进了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工厂”。

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风云变幻,使人眼花缭乱。举例略谈“阿拉伯之春”和“保护责任”新理念。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共有 23 国,占据西亚和北非广袤地区,称为“阿拉伯世界”。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裔。天主眷顾阿拉伯,给予石油;有石油就富,无石油仍穷。

阿拉伯世界一向被看做是人间净土。《天方夜谭》是阿拉伯的仙境。现在,净土仙境里发生了大闹天宫,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没有预谋,没有组织,没有理论。一人自焚,多国起义。星星之火,顷刻燎原。天国圣徒,只知“天主”,不知“民主”;只要“民生”,不要“民主”。可是,草根起义一旦扩大之后,不由自主地滑入了民主,这就是“民主”的潜在力量。

历史学者认为,阿拉伯的历史包袱太重。西欧的启蒙运动经历几百年。阿拉伯的启蒙运动将是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只是开端的开端而已。“阿拉伯之春”是春寒料峭的“早春”。

“保护责任”新理念:

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环节。我傻乎乎地在电视里看北约轰炸利比亚,不懂为什么发生

这场战争。我向网络寻求答案。原来,联合国有一个“保护责任”新理念的决议(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 R2P)。

关键文件是 2005 年联合国通过一项名为“保护责任”新理念的决议。“保护责任”,说得含糊其辞,不清不楚,为了避开敏感字眼。说得明白些,“保护责任”就是“保护人权的责任”。决议说:“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

“保护责任”新理念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使“人权高于主权”成为联合国的法定原则。一国无道,多国介入;吊民伐罪,辅助起义。国际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轰炸利比亚之前,新闻也说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中国这次投了弃权票(中国如投反对票就不可能去轰炸)。

网络说:“保护责任”新理念,先后执行了两次。前一次是对“波斯尼亚大屠杀”做出的军事回应:全世界花了三年半时间方才结束;首犯前南斯拉夫暴君米洛舍维奇最终死于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这一次是对付利比亚,至今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

文化全球化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一万年前,人类创造了文字,世界各地兴起许多文化摇篮。经过缓慢的交流融合,形成东亚、南亚、西亚和西方四种地区传统文化。历史向全球化前进,四种地区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成为一种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核心内容是科学和民主。地区传统文化依旧存在,进行各自的完善化,成为国际现代文化的补充。这是文化全球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文化休克状态中苏醒过来,开始重建文化。有人一时兴奋,闭目高歌“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世界文化的接力棒传到中国来了!张开眼睛一看,世界已经广泛流传国际现代文化和文化的全球化。■

(作者为著名学者,现年 106 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继)

再说新民主主义

○ 王也扬

近来人们又在讨论新民主主义,其用意无非是想推进理论创新和改革开放事业,这是值得肯定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对邓小平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于光远先生曾说,中共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里面,还包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于老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是想为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寻找某种理论的依据。

新民主主义旗帜,确是中共的胜利旗帜。对此,著名党史专家胡乔木和胡绳都有论述,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党用新民主主义争取到了包括中间阶级在内的多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读者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最适合中国的实际,为什么要把它提前结束?既然毛泽东对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有认识,为什么建国后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

对此,杨奎松先生和笔者,曾先后撰写论文(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回答了读者上述问题。我们指出,中共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具有政纲和政策两重的性质,其制定的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其代表作为撰于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627页)列宁提出“两步走”,即共产党先参加并争取领导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段引文在原著中为黑体字——引者)读者可知,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列宁要求党选择不同的联合对象与麻痹对象,而革命对象与麻痹对象之间也是一种转换的关系。“麻痹”之谓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这正是列宁主义策略的巧妙所在。当党一旦夺取政权,又有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列宁便公开表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转变,是完全遵循列宁主义办事的。开国之初,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签订《共同纲领》,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并规定国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个体、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毛泽东对党内打招呼说:“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但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以积蓄“我们的力量”,他还是号召:“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他解释道:“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三年之后,国家经济顺利恢复,抗美

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诸项斗争节节胜利，毛泽东认为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的时机渐趋成熟。1952年6月，他明示党内：“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继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提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对所谓“过渡时期”下定义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于是有人不解《共同纲领》里可没有这样写。甚至党内高层也有人思想跟不上，认为还是稳一点好。毛泽东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于是又有人不解：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按照毛泽东上述观点，可以说既有又没有，因为一切都是变化的。这就是列宁和毛泽东都非常强调的革命的辩证法。果然，说15年完成的过渡，三年就解决了问题。事后毛泽东说，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他还指出，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当我们回头看列宁关于“两步走”，关于联合多数民众、麻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按照我们的力量”不断推进革命的阶级斗争策略时，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近年研究新民主主义的论者都十分看重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认为它的含义主要是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且比较长的经济发展时期，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其实，这是用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解释历史。笔者要强调的是，今天与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彻底否定了“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见中共十七大报告）因此可以说，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与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产物。简单搬用过去的某些东西来为我们今天行事找根据，可能一时有用，却弄不好会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现在需要继续努力的，恰恰是真正否定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而不是“重走过去的路”。君不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民营企业家中的很多人仍然加入了移民潮。他们是对党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不放心，有疑虑，担心有朝一日，又像当年放弃新民主主义那样，说变就变。

还值得一说的是，新民主主义推出之初，也曾叫做“真三民主义”，这说明它虽冠之为“新”，实与“旧”民主主义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宣称共产党人是真心实行民主主义，而批评国民党对民主主义不那么真心。民主主义，是20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潮流，至今涌动不已。孙中山在创立三民主义的时候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要忘记，当年中共正是顺应这世界潮流，高举新（真）民主主义的旗帜，才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拥护，取得革命胜利的。今天有人一面说新民主主义，一面却否认有世界民主潮流这回事，其自相矛盾若此，令人无语！愿一切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坚持和推进社会历史的进步，这才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2011年第7期第3页左栏倒数第2行“八大到九大，又隔了11年”有误，应为12年；第8页左栏倒数第4行“思想、言论自由的条款写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之中，并被《五四宪法》和以后的其他宪法所继承。”亦即“1954年以来几部宪法都写了‘思想、言论自由’的条款”之意。但实际情况是：“思想自由”仅见于《共同纲领》，而1954-1982年间四部宪法中均无。

本刊热心读者 陈济生

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

○ 陈其阵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龚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灾难起因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

展到支一派、压一派。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我们拒作检讨。这使军代表感到背后有人支持，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国务院决定粮食部和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700余人到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畔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那里。我是到干校的一员。1970年1月，樊得知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五一六”的攻击矛头之一就是解放军，反对军代表还不是“五一六”活动吗？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均未说明出处）樊省轩在会上声称：“‘五一六’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将他们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他也是部大联委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1966年‘文革’初起时，部党组决定粮科院在京外的五个研究所人员进京参加运动，朱、殷遂来到北京。1968年2月，军代表说国务院指示，五个所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朱、殷跟所里人员一起回到原地。樊发动清查时，又把朱、殷揪回北京。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2月5日决定给我办‘学习班’，隔离审查。”

生不如死

审查我的专案组有5个人，组长是原市镇供应司的办事员（粮食部大批人员下放时，原司局建制撤销，仿军队建制设连、班，这个人时任一个连的副指导员）。见面坐定以后，他领读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然后宣布纪律：不许随便走出房间，去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为了保证安全，要我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我所带的东西，片纸未留。与此同时，派人到我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我家里搜查。3月13日，组长领读完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的语录后说：“军代表把问题的底和政策的底交给你，交代你的‘五一六’关系，交代的彻底，可以回到群众中去。”我一再申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和“五一六”没有关系。专案组说我不老实，开始体罚，要我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准直腰。5月下旬的一天，组长拿了几页纸，让我看第一页第一行，是“认罪书”几个字。又让我看末尾，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几个字。我如入五里雾中。这是军代表眼中粮食部“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字迹。我表示，我不知道他是“五一六”，我和他没有“五一六”关系。我不是“五一六”。组长说我冥顽不灵，“再不交代就要给你改善待遇了！”6月上旬，我被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我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糊得严严的。与大屋相隔的隔壁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活动纸片，用手掀开，便可看到屋内的一切。这是个瞭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我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来了个下马威，抡开膀臂，一连打我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组长动手外，还有一个组员帮打（以下称“帮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他们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找四五个人来。打

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内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我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把我的胯部以下至脚踝，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没法迈步，走路得慢慢蹭。组长用铁炉钩子打我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骂：骂爹、骂妈、骂爷爷、骂奶奶，骂祖宗、骂八辈祖宗！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人样，生不如死。我多次想死，但死了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妻子、孩子是反革命家属，我死不起。

攻心诱供

在使用多种手段摧残的同时，专案组人员不时使用“软”的一手：攻心诱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我耳闻目睹“同伙”如何“认罪”，以使我不再相信“攻守同盟”。8月12日，专案组把我押进一间空屋，收听小喇叭转播的殷嵩义认罪实况。12月上旬，专案组组长领我在院内转了一圈，看到了原粮科院翻译胡××写的“认罪书”，承认是“五一六”，描述了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我押进一间空屋，收听“集团”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认罪实况转播。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我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我说的话，这等于在群众大会上指认我是“五一六”。收听后，组长开导说，你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你想想怎么办吧？！我身受的打骂折磨难忍，军代表指定交代的不供认不行，那就认下来吧！于是我向专案组说参加了“五一六”，是1967年4月19日一个人跟我说，我同意参加的，把那天以后的活动都往“五一六”上挂，但是专案组穷追不舍，逼我交代的问题更多。没影的事编不出来，过不去。特别是我本清白，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在1965年12月初甚至告诉我就要发展我入党了！我怎么能把“五一六”的黑帽子往自己头上按呢？我怎么和妻儿交代呀？不行。假坦白这条路不能走。专案组找我继续交代问题时，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前两天说是‘五一六’，那是假的。”组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上来劈头盖脸地打。他的手指把我太阳穴的血管

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我忙用手按住。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我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五一六’,不叫‘四一九’哇?”我的天,原来这“五一六”是5月16日(或以后)才有的,我编的日子早了。我急忙表示:“我端正态度。”他说:“敬酒不吃,吃罚酒!”示意几个人走出监室。为了防止我再翻供,组长问我:“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你说谁不是‘五一六’吧?”我说了一个人名,这个人政治上成熟,是我尊敬和信赖的。组长说:“他交代了!”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连的副指导员到我的监室,拿出两页纸,遮遮掩掩,让我看第一行字,是“认罪书”,最后一行字是“五一六”分子×××。我无言以对。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人,一个是原机关团委书记,一个是原政治部办公室科员,都是我的好友,看见他俩,我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劝我“认清大势,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我联想到早在半年前,我一位颇为敬重的部领导在三里河商业部礼堂批斗会上就编造说吴传启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被迫招认是“集团”的“黑后台”。实际上他早在1967年4月就被群众组织打倒了,置于专案组监管之下,吴传启怎么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这样的人谁都顶不住了,我顶得了吗?我多次申明,我13岁家乡得解放,是人民助学金供我到大学毕业。我热爱党,写过五次入党申请书,誓言把自己献给党。他们说是给他们忆苦思甜,上来就打。我被隔离之前,刺破手指,写了“永远忠于毛主席”的血书,专案组搜查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表达真心,如果看到我的心是红的,就相信我是革命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我愿意剖腹!”他们又打又骂。血写的事实他们不信。只信墨写的谎言,那就编吧!决心沿着已招供的供词和专案人员逼供、诱供的线索,开动脑筋编造。

屈招脱难

经过20多天的苦思苦想,我写出了“认罪书”。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我“认罪”。我照字宣读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开口说“1967年5月下旬,我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参加经过和‘五一六’阴

谋组织情况已经向学习班交代。下面交代我所犯的罪行和思想根源。”“三次参加”和“4月19日参加”的说法一样荒唐,可是专案组信以为真,因为除了“四一九”以外,其他的编造都没有真凭据对比,无法辨别真假。“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我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人一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1971年3月15日,军代表在干校召开清查“五一六”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一位处级干部不以“五一六”分子看待。一位头目“暂不戴反革命帽子,以观后效”,宣布我“解除隔离,回到群众中去交代问题”。宣布粮科院一位翻译从严处理,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宣布郑志勋(后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隔离审查。宽严大会以后,气氛逐渐缓和下来,专案组人员虽隔三岔五地找我,都以“想不起来”的托词回复,他们也不穷追猛打了。

申诉雪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邱会作随之倒台。清查“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的纲领不再提出了,军代表没有往日的气势了。随着批林的深入,被打成“五一六”的同事们纷纷向商业部(1970年7月,原商、粮、供等四个单位正式合并为商业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党组的权力)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上访,反映粮食部清查逼、供、信,打人、体罚的严重情况。1972年6月,核心小组派人到固安五七干校调查。我于7月1日向专案组人员申明不是“五一六”,全部推翻了屈打成招的假供,开始给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原商业部军代表)写信,详述被整、被打的过程,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并多次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申诉冤屈,要求调查、处理粮食部军代表在清查中违反政策的问题。

在群众强烈反映和要求下,1973年1月13日,固安五七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商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多位成员到会。原粮食部副军代表翟梦僧先发言,声称原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承认犯有错误。搞了逼、

供、信、扩大化，有的人被打得很重，致使身体受了伤，心情感到沉痛，给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宣布给41个人平反，另对被整的时间很长、有的被打得也很重的42人纠正错误，赔礼道歉。翟讲完，樊省轩发言，几乎和翟说了同样的话。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也在会上讲了话，基调跟翟、樊讲的一样。会后讨论三天。被错整的同志均不同意“清查”的“方向、路线正确、成绩是主要的”提法，摆出大量事实、揭露军代表按林彪“一个也不能漏掉”和他的死党“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的一套搞，纷纷贴大字报。这时，一位领导干部的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丈夫在监狱里每天只给喝三杯开水，如果再想喝，就得喝凉水。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在群众中传开了。2月28日翟梦僧也在干校传达了。被整的同志受到了鼓舞。以后在联系实际批林中，我和被错整的同志一起，把揭露军代表在“清查”中的恶行写成大字报，贴到了西单商业部大院，又在全部人员批判大会上的发言中列举。机关干部们看后、听后都感到震惊，军代表很被动，很难堪。

1973年5月1日，陈国栋参加游园活动，报纸上登了名字，随即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1月7日，陈在商业部和廖祝南、我等四人见面、谈话，说他“受党的委托”，协助处理粮食部“清查”的问题，要到固安干校和我们详谈。11月24日，陈国栋到干校与原粮食部副部长安法乾（时任干校党委副书记、后任粮食部副部长）一起，找朱相远、我等四人谈话，听取我们的意见。1974年1月14日至16日，陈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安法乾、翟梦僧和商业部政工组的陆柯（后任商业部干部司司长）、邵祖山（后任商业部五金交电化工局副局长）也参加了。安首先说〔注：引号内的文字均摘自当时的记录，下同〕“11月份，党委在商业部开了一个会，核心小组范子瑜、郭士荣、樊省轩、柳垣（原四个单位的军代表——笔者注）、马敬夫、林永清参加。现在把会议纪要向大家传达一下：会议认为，范子瑜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在1973年1月13日对我校清查的分析是正确的。”“清查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的工作中

犯了逼、供、信、打人、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打人，有的人留了残疾，伤害了群众，影响了团结，错误是严重的。”“打人的错误主要由当时的校领导负责，打人的没有责任。”他说：“今天跟大家讲讲，还是商量，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行政16级转业干部）第一个发言。他说：“对‘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两句话我不同意。”“100多个同志受了非人的待遇。凭什么打掉我八颗牙齿？凭什么把我胳膊打折？我被关起三天，手就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一样。我要撒尿，没办法，站在外边，憋得受不了。魏金娥（医务室女职工）看见了问：‘你在干什么？’我说：‘要小便，撒不出来呀，把裤子尿湿了，你帮帮忙吧！她帮我小便了一下。我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我是这样过日子的呀？’他泣不成声。在座的很多人流泪、抽泣。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咱们这儿打人，到现在还谈虎色变！我跟家人讲，不信。李×（五连指导员，原财会司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会司办事员）100多个耳光，问：‘我打过你吗？’120人，谁没有一本辛酸账？”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翟梦僧同志你量量两块砖的分量，你用手拿10分钟试试。打我，打折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逼我交代‘五一六’还不算。还叫我交代里通外国，说军代表那里有材料。现在军代表在这里，你把材料拿出来！”我想寻死，又想，死了不行，死了，骨灰都没影了。没法，我承认。交代外国人名，我编不出来，最后从《参考消息》上找了一个跳高运动员的名字。”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殷认罪以后，让我交代‘五一六’，说‘×、殷交代了粮科院的五一六’，你是也是，不是也是。没法，我在9月说参加了‘五一六’，认罪书是12月才写出来的，怎么写是别人告诉我的。写出后，叫我在会上认罪，然后贴大字

报。我不愿贴，让我立功。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使很多人受折磨。我说了假话，对不起同志们。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是个好同志，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是谁要这样做的？”对含冤死去的人，无中生有，诋毁声誉，对模拟像批斗，亵渎逝者，良知何在？人性何在？殷嵩义死了，死因不明，连骨灰也没给保留。1973年樊省轩在和廖祝南的一次谈话中说，殷是1971年3月死的，死后，有关人员告诉了他，他没去现场。死时身上有逼、供、信，甚至严重逼、供、信的伤痕。殷已于1970年8月在群众大会上认罪，怎么会在半年后“自杀”呢？群众怀疑殷是翻供惹恼了专案人员，被打死了。大家要求调查其死因，公布真相。座谈会共有13位同志发言，一致要求军代表对“清查”中的错误认真检查、为被整成“五一六”的同志平反昭雪。同时认为，打人由领导负责，包起来，不对。各有各的账，打人情节恶劣的和组织者、幕后指挥者，应追究其责任。

偿还欠账

1974年11月14日，商业部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大会，陈国栋和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均出席并在台上就座。大会由副部长高修主持，他说：“先由范子瑜同志代表中共商业部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范在检查中说：“关于‘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经查证，除程镇华（原北京商学院学生，1967年8月，因张贴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被商学院和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多次批斗。1970年3月，商业部又在三里河礼堂召开大会批斗，为清查造势，会后期被北京市公安局押走）由有关部门继续审查外，原四个单位没有发现有‘五一六’组织，也没有发现有‘五一六’分子。”“由于核心小组成员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和干扰，在林贼及其死党‘一个也不能漏掉’、追组织、查表格，‘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等反动谬论影响下，犯了错误。”“在打人方面，原粮食部打得很严重，被打的同志很多，有的同志被打得留下了残疾。”“在这里我代表核心小组向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赔礼道歉！”范检查完，高修宣布：

“现在由樊省轩同志检查。”樊在检查中说：“清查‘五一六’一开始，我认为粮食部可能有‘五一六’。有些事情办不下去，我认为背后有捂‘五一六’的盖子。70年1月18日我讲话就说‘五一六’的魔爪伸进了粮食部。我对几个所谓的‘学习班’指示追查‘五一六’名单。”“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1974年底，军代表撤回了总后勤部，固安五七干校随之撤销，剩下的几十名干部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8年12月1日，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和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杨少桥（1979年粮食部恢复后仍任原职）找我和被打成“集团”第六号人物的崔秀春谈话。姜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开，金（明）部长在参加。他想找同志们谈谈心，没时间，委托我们跟你们谈。原粮食部的清查运动有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好，你们有什么意见，今天谈谈心，希望敞开心扉。”我和崔秀春都敞开心扉，说了心里话。崔说得很动感情，声泪俱下。姜习同志表示把我们的意见向金明同志、向党组汇报。

1979年1月11日，商业部召开大会，金明同志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说要解决部里的遗留问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说：“姚依林同志走时（从商业部调往中央）讲：‘有账的还账，谁想捂，捂不住；想盖，盖不住；想包，包不下来。账，早还好。’”金说：“有话就讲，充分发扬民主。”1979年2月27日，商业部在空军体育馆召开大会，部党组书记金明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查‘五一六’是另搞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原粮食部‘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个假案、错案。有几个人被迫害致死，要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死因，召开平反大会。”因为金明很快调离了商业部，会上说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到了1983年整党、党员都要对“文革”中的作为作自我检查，然后重新登记。部整党领导机构要求在“清查”中打过人的，都要向被打者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否则，不予恢复组织生活。“组长”和“帮手”都找我，对当年动粗的行为认错，赔礼道歉。劫难虽已过40年，昔日有过同样遭遇的人偶聚一起，谈起往事，仍摇头叹息，伤痕太深了。但愿像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事，今后不再重现。■

（作者原任中国粮食贸易公司总经理助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荣经“五九事件”

○ 童梓平

荣经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雅安地区中部，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里矿产资源丰富。荣经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尤以边茶著名西南。以独特的原料，独特的制作方式，独特的外形和独特的效果而独步天下的“荣经砂器”，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然而，这样一个好地方，在1959年却蒙受巨大灾难，死人近半。人称“五九事件”。当时我就在荣经，亲历了这场灾难。

三高五风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三高五风”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1959年，荣经县委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荣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荣经县委学习。荣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庾开云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土高炉遍山林立，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资金，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把

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县委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将25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

1958年8月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焦点就是争夺粮食。提出“宁可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

反瞒产私分

征购任务是依据上报的粮食产量来确定的。粮食没有生产这么多，征购任务自然完不成。上级不相信没有粮食，说是农民瞒产了，私分了。为了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荣经县委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搞“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

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代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她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50多年了,提起这件事她仍然伤心流泪。

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讲了粮食实际产量没有达到计划指标的实话,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斗,罚跪在地上不准睡觉。批斗后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给社员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在以后的反违法乱纪运动时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浮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抢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就被折磨而死。

饿殍遍野

1959年荣经大约有9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活活饿死的有3.5万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1960年春后饿死的人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下放到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亲眼看到了很多饿死人的情况。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那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

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

最严重时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荣经县领导对外封锁信息,不让外边知道发生了饥荒。县里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

我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我当时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饿死了大人,留下了不少孤儿,不得不办孤儿院收留。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 n),才逃鬼门关。”

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涸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

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荣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以后的反违法乱纪运动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荣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荣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荣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代反省所犯罪行为,听候处理。当时农民受害致深,这些对农民作恶的基层干部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从根本上说,责任在上层。基层干部是上级推卸责任的牺牲品。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1000万,全国第一。荣经死人一半,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荣经,一方面找了一个替罪羊——把荣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

守卫良知

19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

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草根、树皮活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活到19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18斤,刚出生的婴儿6斤,增加一岁加1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62斤粮,平均每人12.4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作者为原民盟荣经县总支主委、离休盟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广州“文革”中打杀“劳改犯”

○ 万绮芬

“文革”期间，广州街头曾出现过一股打杀“劳改犯”的恐怖狂潮。许多被指控为“劳改犯”的人被群众活活打死，暴尸街头，或者被群众用绳子吊死在树上，情景十分恐怖。

广州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是跟着北京的步调不断深入的。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毛泽东分批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等，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论指引下进行的。按照当时的说法，人们头脑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要绷得紧紧的，思想上充满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仇恨。大街小巷无数的大字报，加上红卫兵在马路上刷上“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都让人触目惊心。由于党委被踢开，公检法被砸烂，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正道消息只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了。

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一下子闹得广州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居民纷纷拿出门板、杉木等材料，在马路上构筑起许多栏栅或街垒，对过路人进行盘查询问。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珠光东路比较靠近珠江，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于是敲打脸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

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掉了下来，当时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

“文革”期间打杀“劳改犯”的持续时间前后约一个多月，栅栏街垒之后亦由群众自行拆除。我丈夫因为当时是搬运工人，拉着大板车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但他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他自己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听了会害怕。到底广州“文革”期间被打杀的“劳改犯”有多少？我不清楚，也无从调查了解，但我心中始终存在疑问：那些被活活打死的人真的都是“劳改犯”吗？他们都是坏人吗？■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饥饿的学生时代

○ 石圭平

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吴传斗同志的《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这篇文章后,当晚曾辗转难眠,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学生时代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为那个年代的“阶级敌人”属于“黑五类”来进行改造的,而我与他不同的是,我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曾经是“祖国的花朵”,尽管如此,我也在劫难逃,与他经历的饥饿劫难并无二致,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问著名新闻学教授王振亚先生:“清明节,你回老家扫墓吗?”他说:“我每年都回去给我那1960年饿死的老爹扫墓,那一年,仅俺村的王氏家族三户人家就饿死了18口!土改时俺村共有276口人,到1960年夏天就剩下68口人了,其惨状现在回忆起来还胆战心惊”,说完他悲凄地摇了摇头。5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可见“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在人们心里留下的重创与伤痛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我每每想起学生时代所亲历的饥饿生活也是心痛不已,不堪回首。

解放前在冀鲁豫行署解放区工作的父母后来进城了,父亲成了平原省濮阳专署(1949年划平原省,省会新乡市,1952年底撤省后划归河南省)的一名中层领导干部。父母把我从山东农村姥姥家接回到城里来,我从贫穷落后的农村第一次来到城里,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看到了马路和楼房觉得真是新奇极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崭新的天地。1950年,我挎着新书包开始上学了,成了一名一年级小学生,那时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经历了旧社会忍饥挨饿的苦难岁月后,一步迈进了新社会,再也不用过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

闲暇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去地委、军分区他的老战友、老朋友家里去玩,他们经历了血与火

的洗礼后打出来一个新天地,那份自豪,那份幸福时时出现在他们的言谈中,有时他们也指着我说,咱们受苦受难搞革命不就是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幸福嘛,我也傻乎乎地冲着他们笑笑,心里觉得反正以后我会有吃不完的白面馍馍,缺吃少喝的日子与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沾边了。

1958年开始“大跃进”了,秋天开学我刚上高中一年级,还没有上课,一开学就大炼钢铁,为了实现“三年超英(国)五年赶美(国)”的伟大奋斗目标,我们在校院里支起土炉灶,没明没黑地炼起了钢铁,学校操场上浓烟滚滚,人声鼎沸,那种热火朝天的劲真比炉子里的熊熊烈火还热几分。我们挨家挨户地去搜集铁源,什么铁锹犁铧、锅勺铲盆凡是带铁的都拿来往炉子里烧,按规定每个学生都有献铁任务,有的同学看到家里实在没有铁可献了,为了完成任务,竟然把母亲出嫁时陪嫁的衣橱上的铁环都拔出来献了。城里的铁资源没有了,我们就移师到乡村去炼。农村的铁源就是挨家挨户地去砸人家的铁锅,甚至连农民家大门上的铁钉都不放过。那时候饥饿就已经开始露头,且渐行渐近了,然而我在农村却亲眼看到大量的红薯、玉米都烂到了地里无人收割,甚至连犁铧锄头都扔到地里无人要了。现在回忆起来,从当时烂在地里的那些硕大的红薯、玉米、谷子、高粱穗来看,1958年应当是风调雨顺的丰收年,而丰产却没有丰收,因为人们都去挖水渠、炼钢铁去了,“一天等于20年”,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粮食不是自己的粮食了,谁还去管地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

狂热的浪潮过后,迎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到了1958年底,饥饿的妖魔张着血盆大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了:学校的食堂里开始一日三餐给我们煮萝卜小米稀饭,开始时还是比较稠的,后来就越来越稀了,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岂能是几碗稀饭就能填饱肚子的!为了充饥,大家都是三



碗五碗地喝,上一堂 45 分钟的课都支撑不下来,大家两次三次去厕所,有时候正在讲课的老师也停下课来往厕所跑。1959 年初春,母亲要到外地进修学习几个月,临走前,她给我家附近一个包子铺的老板留下了一些钱说:“孩子上中学挺累的,每天晚上你给她送两个包子过去。”这个老板特讲信誉,母亲走后他果然每晚送两个包子过来,除了在学校的每天三顿稀饭外,起码我比其他同学还能多吃两个包子。没过多久,包子皮竟然换成红薯面加白面的黑皮了,又没过多久,这位大爷就不再给我送包子了,我怕是妈给的钱不够了,就跑去问他,大爷凄惨地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妮啊,我的包子铺已经关门了,买不到面和肉了啊,咋做包子呢。”大爷把剩下的几块钱塞给我说:“我正要说把剩下的钱叫孩子给你送去呢。”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流泪,从今以后我唯一的精细粮断路了。

1960 年,全面的大饥荒袭来,田野、乡村一片萧瑟,人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许许多多的人都浮肿了,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线,腿上一按一个坑,鞋子都穿不进去,那时候如果看到谁没浮肿就会惊奇地问“你是咋回事,怎么没有浮肿?”这时候我是高二年级了,每天饥肠辘辘,一低头眼睛里直冒金星,走路浑身无力,终日无精打采,一动弹就头晕眼花,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我的父亲当时

按级别享受一点点所谓的“特供”,即每个月大概有三两次吃到点肉的机会,因怕不能足额吃到领导嘴里,这点肉都是由机关食堂统一做好由享受特供的人打回家里吃,母亲怕我眼馋,每到此时她总是带着我到机关食堂吃饭,还有意多磨蹭一会儿,估计着等父亲吃完了才带我回家。等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关注的还是父亲吃剩下点汤水没有,父亲总是要给我留下三两片肉,没有肉了也要留下点肉菜汤,那时我吃着这带腥味的汤真是如食甘露仙丹,香极了。

为了保持身体的热能,维持着生命的底线,我们不仅不再去挖渠修堰炼钢铁了,而且学校的一切体育活动全部取消,就这样也没有抵挡住饥饿的折磨,红薯叶子、梗子、野菜、萝卜叶都成了食用的上品。有一次,实在饿得心里发慌,我和两个同学到郊外农田里想找点能吃的东西,也就是看看地里有没有农民刨地时剩下点没有拿走的小红薯和小萝卜之类的东西,好捡来充饥,谁知道田野里的那幅景象把我惊呆了:树叶被摘得所剩无几,有些树皮也被扒光了,看着那白花花的树干,我心里又惊又怕,人们怎么把树皮都扒吃了呢。

为了维持我们年轻的生命,学校千方百计想出各种绝招叫我们这些中学生填饱肚子:用水红花(黄河里漂浮生长着的一种杂草)碾碎掺上面蒸“馍”,草毕竟是草,无论怎么碾,蒸出来的干粮都保留着许多半厘米左右的草梗,学校食堂当时的粉碎技术还没法把这些杂草梗变成细粉。那时能用来充饥的东西太少了,只要是能吃了不死人的东西,一丁点儿也舍不得抛弃,没有哪一个同学说难以下咽的,大家照样吃得很欢实。俗话说:狼恶虎恶没有饿恶,不吃就不能活命啊!这一年我懂得了啥叫饥不择食,就连积水上边长出的一种绿藓苔我和我的同学也捞着吃过。还有一种叫地衣的东西,农民也叫地骨皮,即下过雨后积水处经太阳一晒会有一种黏糊糊的东西粘在地上,等干了以后把这层皮揭下来洗净吃。这一年,我把草根、树叶、藓苔全都吃过了,这些如今猪狗不食的东西养活了我。

1961 年,在饥饿中我考上了大学,虽然成了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但是饥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变,每顿一个纯高粱面干粮,剩下的就

是随便喝的没油的菜汤。当时大学生的定量可能是每月 29 斤，并没有听说过谁克扣过我们的粮食，也就是说这些粮食都足额吃到我们嘴里了。如果按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这个主食的量足够两个人吃了，因当时没有鸡、鱼、肉、蛋、奶、油、糖等副食，还是天天饿得心慌。

上大学期间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两件事是：刚考上大学去校农场劳动，我们班的鸣凤挖地时，偶尔挖到了一个花生，她惊喜的大叫了一声说：“啊！花生！”我们几个女同学都围了过去，她说：“咱们几个女同学分吃了吧。”一个花生两粒米，我们班共有六个女生，鸣凤硬是把它掰开使我们每人都吃到了一丁点儿，因为很久都没有尝过花生啥味道了，豆大的一点花生米也算是叫我们解了解馋。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母亲高兴地告诉我：“给你爸发了一张广州酒家的餐票，你去吃吧。”我说：“咱们一家都去吃多好啊。”妈说：“傻孩子，你以为这票里有多少东西给吃啊，够你一个人吃饱就不错了。”广州酒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郑州闹市区经营广式风味的最高档的饭店。我一听高兴极了，当我走进这家饭店后才发现这里十分萧条冷落，什么生猛海鲜鱼翅燕窝早就没有了，这里也只能经营些很一般的极为普通的饭菜。这张餐券所供应的是四个包子一碗汤，餐桌上我把一个包子才咬了两口，这时闯进来一个汉子，腾一下子把三个包子全抓走了，我连他长啥样都没看清，已经是大一学生的我当时趴在桌子上就哭起来了。

1962 年的冬天，“包产到户”的成就和威力显现出来了；有一天，大约晚上 9 点钟以后，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忽然听到校外有叫卖热红薯的声音，在那漆黑阴冷的冬夜里，这声音好像报春鸟一样使我惊喜不已。热红薯的叫卖声音，昭示着农村经济正在逐步复苏，农民已经能把食物拿出来换钱了。我真想出去买块热红薯吃，但是又没有这个胆量，因为这叫资本主义的尾

巴，卖者为什么白天不敢出来卖，晚上才敢出来叫卖，也是怕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买卖自由自古就是花开花落两由之，当时，生活在夹缝里的买者和卖者想交易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时光移到 1964 年，我上大四了，秋季开学一天课没上，我们就下乡搞“四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为了照顾大学生，上级为我们选择的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河南省偃师县山化公社。按规定必须到贫下中农家轮流吃派饭，中农以上成分的人家是不能去的（地富反坏右家更不能沾边）。因为贫下中农家经过我们一冬天的吃喝，每家也都反复轮过许多遍了，到了春天放宽可以到中农家里去吃饭了，尽管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公社，不管是中农还是贫下中农的生活依然还是十分贫困的，家徒四壁，进村以来，我们的主食全是红薯，喝的是小米稀饭或者玉米面糊糊，当时能吃饱，干一阵子活就饿得心慌。

毕业前夕，我们班六个女生在一起谈理想，当说到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有的说是先买条漂亮的床单，有的说先买双好看的鞋子，轮到我时，我想了想很严肃认真地说：“我先买几根油条吃吃，这几年我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油条了。”一句话叫她们几个笑得眼含泪花，评价是：说得最实在，最现实。■

（作者为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伟）

2011' 影响中国 100 部社科专著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学术专著的社会化利用，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2011 影响中国 100 部社科专著”目前正在组稿中，相关事宜如下：

一、书稿要求：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够较好反映目前社会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具有时效性，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

二、征稿范围：书稿主要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历史与年鉴等论著，以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论文集等为主。

三、其它事宜：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出版合同；2、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回复；3、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更佳，请注明联系人、地址、电话；4、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另需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书画作品，以及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等题材书稿，欢迎您赐稿！

投稿邮箱：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南里长城国际 B6 单元 705 信箱 (101121)

咨询热线：010—5843816952995426 传真：010-52995426

在线投稿：bookcb@163.com

联系人：王老师、姚老师 北京静海雅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www.bookyswh.com

我们公社的“101 反革命案件”

○ 宋士华

我家在浙江杭州市临安市(县)藻溪镇,人口大约 2000 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自杀 7 人,被迫害病死 2 人,其中一件“101 反革命案”就被逼自杀 4 人,事情发生在 1968 年 10 月 1 日,故定名为“101 案”。

1968 年 10 月 1 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红年代,那天藻溪开庆祝国庆节大会,大约有一万余人参加,会场设在完小的大操场,场中临时搭了一个台,台上彩旗招展,台下锣鼓喧天,每村的群众都列队前往。

开大会的下午,突然通知,分别召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议,及“地、富、反、坏”子女会议。我也参加了。我们会议由贫下中农尉某主持。讲不了几句话,突然发下纸来,叫大家用毛笔书写大字“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万岁”等字样,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遵命照写。事后才知道上午开大会时,大街某小吃摊下发现了一些反动传单,这个消息给藻溪笼罩着恐怖。更给“黑四类”分子和我们这些子女带来极度不安,因为贫下中农不会仇视共产党,不会仇视文化大革命,怀疑对象当然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不久就传来周祖武隔离审查的消息。

周祖武原毕业于蚕桑专科学校,知识分子模样,敦厚庄重,当过中心学校校长,据说,凌华在海宁当县长时,他当过建设科长,家中颇有一点资产,土改时排上地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村最早游街抄家戴高帽子有他一员。听贫下中农造反派说:“他当过官,家藏金器,抄家看看他的浮财,从阶级分析来看,他有仇视共产党、仇视文化大革命的因素。”听说对笔迹时,也有点像,因此把他抓起来,各种说法纷纷不一,我却感到难以相信。

101 案件成立专案组,人员由公安局的吴

某、金某、刘某及当地食品站经理钟某,银行职工葛某、信用社主任雷某、藻溪村方某、公社干部王某,组成专案小组。一时风声鹤唳,不几日周祖武弟弟周步武隔离到曹家坪专业队监督劳动,大儿子周长荣 17 岁,隔离在周冕水库劳动,小儿子周长华 12 岁隔离到方某家,跟着生产队里劳动。接着又把周祖武在潜东门山的弟弟姚金祥抓了起来(姚是从小抱给九里一户人家做儿子,年轻时在东门山招亲,家庭成分也有黑点),其妻子也多次遭到非法审问、威逼。还有供销社职工老李也被隔离起来,事后知道,他剪纸做五角星,却折错,一剪刀下去,成了十二角,变成国民党的国徽。整个村庄充满恐怖和杀气,弄得“四类”分子以及二等公民整日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事后听说周祖武是昼夜轮番审讯,威逼索供。一押就是九个多月,一直到第二年,在 7 月 5 日,那天,是历史上有名的“七五洪水”,闪电交加,暴雨如注,他解下粪桶环上的绳索上吊自杀。(死后他的儿子周长荣偷偷地揭开其父衣裳,见周遍体鳞伤,想必受过折磨)。周祖武死后,专案组人员说周是畏罪自杀,强令家属不准啼哭。周的胞弟姚金祥和供销社职工老李受不了长期管押,逼供煎熬,也先后走上自杀道路。周的表兄弟也受牵连多次传唤审问。还有凌家村一人叫凌佩凤,她哥哥凌华在国民党统治时当过浙江省海宁县县长,1950 年潜逃台湾,因此她也成了 101 案件怀疑对象,说她是台湾特务,关押数月,被逼自杀。

周祖武死后第二天,在公社的厅堂上召开群众大会,办案人员主持,扬言:“一个反动地主畏罪自杀。”周的小儿子周长华登台亮相,说反动传单是他父亲写的,叫他去散发,趁人不注意,把传单塞在一个摊贩的摊铺底下。……大家惊奇地说:“这个老实稳重,胆子很小的知识分子也会做

出这种事来”。

过了十几个月,突然传来一声惊雷:“101案件正犯已抓到了。”“是上肇村的蔡逢春”。真相大白,这三条人命就平白无故地被害死了。事后给被害家属每户三百元,算是平反昭雪费。

101案件制造者蔡逢春,藻溪上肇人,贫下中农,在谈恋爱中,多次受到挫折,后来有一次与藻溪公社某党员干部的女儿谈婚论嫁,因蔡的行为轻佻,遭到女方父母拒绝,心里产生不满,迁怒于共产党。1968年10月1日,藻溪地区在学校大操场开庆祝国庆大会,他偷偷地写了10张反动传单,“打倒毛主席,打倒周总理”,并具名俞福田。俞福田是中共藻溪支部书记,因俞福田是分住周祖武房屋,故而认为周祖武记恨于俞福田,嫁祸于他,故将周祖武押了起来,株连亲友。

隔了两个冬天,蔡逢春看此案查不到他头上,婚姻问题仍迟迟解决不了,再次行动。有一次蔡逢春从家潜去临安,下午三时许又乘临安到西天目的班车回来,车过东天目南庄,一个较偏静之区,从窗口投下两张预先写好的同样传单,刚巧两个孩子看到,马上拾来一看,发现是反动传单,急忙跑到东天目公社报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很快通过公安局传到西天目公社,公社马上组织人员拦车检查,结果都已下车走了。办案人员找来原车上乘客,按原位置坐好,发现投传

单窗口的座位少了一个人,乘客描述这人模样,说他在白鹤已下车,办案人员在白鹤附近村庄排查几天,一无所得,傍晚时徘徊在交口街道,在一家小吃店得知某傍晚下着毛雨,有一人在该店买过两个包子,店主描述该人大概形象,时间、形象符合,断了线的风筝又连上了线,他们又在绍鲁附近村庄排查,如石沉大海,正在绝望之际,又传来希望,那天傍晚有一人翻梅岭圩过去,他们把排查目标指向梅岭圩的上肇村一带,几天一过又断了线。有一天破案组人员踱到梅岭圩桥头,有一老妇在洗衣服,因有点面熟,攀谈起来,她问:“你们整天在村里开会究竟干什么?”老实告知后,问起“某一天傍晚有否看见一人从桥上走过”,老妇脱口而出:“是蔡逢春从梅岭圩过桥来,我还跟他答过话。”办案人员马上回村组织搜查,一跑到他家,已人去楼空,在搜查过程中又发现火柴盒有类似反动传单上的话,经过追捕,捉拿归案,公安局刘某突然悟到藻溪101案件有牵连,一查档案,笔迹无疑,真是同一人。蔡逢春全承认交代犯罪过程,被判了刑。现在看来蔡不过是一个行为轻狂、发泄私愤而已,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就释放了。■

(作者单位为浙江省临安市於潜人民医院车站分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欢迎订阅2012年
《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 **46-56**

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订阅价(含邮费):
每期10元,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 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 510600
电话: (020) 38308908
传真: (020) 38308918
电子邮箱: tongzhougongjin@gmail.com

专题策划 · 民富: 中国新思路 ·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再穷不能穷百姓
——重税治国不可行
“国富”如何变“民富”
“小河有水大河满”
——对话江平教授
历史上的中国为何没有“富民”传统

吴敬琏
刘军宁
陈志武
江平 陈夏红
十年砍柴

焦点关注
公众话题
灯下话旧
人物春秋
以史为鉴
文化广角
舟边絮语

最聪明的官员也做不到的事
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教育应告别封建思想
我为自己的女儿忧心
蒋氏父子在溪口的最后日子
林彪夺权海军内幕
胡适: 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得与失
1922: 苏俄知识精英被逐出国门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
忽然想到——关于口号
商鞅改革的启示
腹无良谋的晓明“智库”

丁学良
陈季冰
崔永元
王长乐
杨建业
王凡
吴殿卿
王开林
李辉
陶短房
徐元吉
张扬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安立志
陈鲁民

· 以上为《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部分目录

走出伪民主误区

○ 许良英

(一)旧说误人

《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对我们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一文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对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评价上。要厘清这两个问题，得追溯一百年前的历史。

早在1903年5月，18岁青年邹容发表的振聋发聩的政治宣言《革命军》中，4次宣扬了卢梭，声称要高举卢梭等大思想家的旗帜（原文为“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于我神州大地。显然，在作者心目中，卢梭是世界民主思想家的主要代表。

随后，1915年9月《青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主编陈独秀的论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声称：“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文中又说，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作者拉法（飞）耶特（Lafayette），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这是历史的颠倒。事实上，美国《独立宣言》系杰斐逊（Jefferson）起草，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而作为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志愿者拉法耶特于1777年7月才到美国。12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拉法耶特负责起草《人权宣言》，他邀请当时任美国驻法国公使的杰斐逊帮助起草。是美国革命影响了法国革命，而非法国革命影响美国革命。

上述两个似是而非的论述，一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承袭，有点匪夷所思。

(二)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吗？

施京吾文中说：“现代民主制的实践首先在法国，因大革命而传播欧洲，渐次世界”。可是，只要概略考查一下近代文明发展史，就会发现这一论断不符事实。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208年，就有1581年成立的荷兰共和国，继而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革命。而它们的发生是一环扣一环的。

经过20多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于1581年成立的荷兰共和国，虽然实行的不是健全的民主制，但已具备现代民主制的雏形。在随后一百年的黄金时代里，它拥有世界最大的海上贸易，世界最大的造船业、纺织业和印刷业。它所拥有的资本比欧洲其他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同时它是世界上最自由、宽容的国家，科学、文化都走在世界前列。

荷兰共和国的民主政治直接影响了英国。英国有悠久的争自由的传统。1215年就制定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1265年创建议会，但议会与专制国王的斗争层出不穷。1640年爆发了清教徒革命。1688年，为推翻信天主教的国王，国会两党领袖邀请荷兰共和国执政来英国保护英国人民的自由和新教，他欣然允诺，率领1.2万名将士乘600多艘舰船横渡北海，未遭任何抵抗进入伦敦，被议会奉为英国国王，条件是：国王不得自行其是，必须接受议会的决议和监督。这次革命史称“光荣革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开创了现代民主制的主要形式——议会民主制。

光荣革命体现了洛克（J. Locke，1632～1704）的自由民主思想，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继承和发扬了洛克思想。美国创建了近代最为健全的民主政制。13年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怎么能说“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

(三)现代民主理论创立者洛克

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柏林(I. Berlin)于1956年出版的《启蒙时代》中说:洛克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的始祖(father)”。光荣革命前7~9年,洛克写出了呼唤革命的《政府论》(1690年才出版)。他以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把常识、经验和理想、期望融为一体,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和相当完备的可行方案。

《政府论》认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都是平等而独立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人们可以相互订立协议和契约,因为真诚和守信是人的本性。自由是指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没有法律,就不可能免受这种束缚和强暴。法律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扩大自由;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当人们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政治实体)时,多数人有行动和约束其余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义务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书中还论证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并提出人人都有自卫和反抗暴政的权利。

1726~1729年间旅居英国的法国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读了洛克的著作,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说:“我是极端尊敬洛克的:我把他看成是唯一合理的形而上学者,我特别推崇他的那种极新颖同时又极明智、极大胆的严谨态度”。随后,1729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在英国考察2年,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十分赞赏,进而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理论。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回国后,大力宣扬洛克的哲学政治思想和牛顿(Newton)的科学成就,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中心内容是民主、自由和科学、理性。它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四)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发明人卢梭

启蒙运动中后期出了一位对公众最有感染

力的贫民出身的思想家卢梭(J.J. Rousseau, 1712~1778)。他于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此书副题为“政治权利的原理”。他满怀激情地宣扬前人已经揭示的原理,特别是洛克《政府论》的主要论题。他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又有洋溢的热情。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与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的原始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意味着人们要迫使他自由!”以后黑格尔(Hegel)又加以发展,把自由定义为服从警察的权利。对此,罗素(B. Russell)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学说“虽然对民主政治献嘴皮殷勤,倒有为极权主义国家辩护的倾向”,他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西方哲学史》,1955年)。“伪民主”,何等恰如其分的称谓!

卢梭创造的概念“公意”,不同于人们熟悉的众意。众意是各个个人意志的总和,中间存在着分歧和差异。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人民意志的表示,只能是一致的。社会集体要采取集体行动时,必须经多数同意,这就是多数决定原则。但少数人的意见仍受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这就是洛克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原则。而卢梭的公意迫使公民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心安理得地做集体的奴隶。这就是伪民主的专制主义。说卢梭的公意理论是洛克思想的发展,这是天大的误会。

(五)卢梭与极权主义

卢梭的伪民主专制理论在20世纪给人类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灾难: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Mussolini)首先使用的,是从“Total”(全体)衍生而成,意指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统治。他于1922年通过“进军罗马”夺取政权。他宣称:“我们是一个能控制自然界一切能动力量的国

家,我们控制了国家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经济力量……总之控制一切”。他们竭力鼓吹国家至上主义,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无形的有机整体,它的利益由一个全能的领袖来表现。在这个整体中,“真正的自由”是对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

1935~1945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都属于同一模式。

极权主义把专制推到极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奴役臣民,其他领域却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极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不允许有个人隐私,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所宣扬的“全面专政”。

(六)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它的爆发点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引发的源泉有二:一是使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启蒙运动;二是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的实践榜样。美国和法国两次革命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纽带人物拉法耶特,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他20岁时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成为华盛顿和杰斐逊的挚友。1789年7月,他在杰斐逊帮助下为法国制宪会议起草震撼人心的《人权宣言》。同时,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巴黎自卫军司令。法国革命初期,他对政局起着主导作用。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害怕进一步的民主化。1791年群众请愿要求国王退位,他下令开枪,造成50人伤亡。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声望。

法国大革命初期,各派林立,两年后温和派退出政坛,激进派蓬勃发展,他们主要聚集于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8月推翻了君主制,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革命的主力。1790年3月卢梭的虔诚信徒罗伯斯庇尔(G.W. Robespierre, 1758~1794)被选为俱乐部主席。

罗伯斯庇尔学生时代就

崇拜卢梭,称他为“圣人”,并曾见到过他。在《回忆录》中记有:“在你最后的日子,我见到了你。这段回忆是我骄傲和乐观的源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在他的心目中,革命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他首先看到,而且到处都有拉法耶特的身影。他在议会中不断呼喊:“凡是有自由事业的敌人的地方,拉法耶特就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应该对拉法耶特开战”。1793年3月开始,在他的操纵下,法国出现了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期,政见不合者被陆续送上断头台。一年多内共有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包括革命家丹东(G. Danton),化学家拉瓦锡(A.L. Lavoisier),他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其在化学史中的地位与牛顿在物理学史中的地位相当)。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于1794年7月被送上断头台。

历时5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就此黯然退场,迎来的却是拿破仑皇帝。卢梭的公意所表演的伪民主闹剧也到了尽头。

施京吾文中说现代民主制度是卢梭和孟德斯鸠理论的产物,这个论断不能成立,本文前面已经论证了现代民主制是洛克《政府论》的产物。■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1年1-3期要目

| | |
|------------------------|--------|
| 张爱玲文坛交往录(1943—1952,上海) | 蔡登山 |
| 《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 | 许子东 |
| 周瘦鹃年谱 | 范伯群 周全 |
| 缅怀樊骏学长 | 严家炎 |
| 想念您 樊骏好兄长 | 刘再复 |
| 萧红身世之谜 | 季红真 |
| 李之珽、张海、崔毅与我被 | |
| 打成“反党集团”与改正的始末 | 黎 辛 |
| 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 | 孙 郁 |
| 监狱琐忆 | 路 翎 |

邮发代号:18—162,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期定价18元,全年合计72元。

编辑部全年办理增订、补订,可邮购、零售。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电话:(010)65252161 邮编:100705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

• 王 龙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近年来最集中的争论,是关于长征开始前他是否被博古“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被捕牺牲的问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的吗?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中坚持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乘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认为,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矛头不是指向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革命先烈博古,这既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更玷污了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因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

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说法: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另一方面的例子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

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可见,连王稼祥拖着这么严重的病躯,坐着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他认为瞿秋白这样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怎么可能跟“不得不死”这样被动、消极的心态和遭际相提并论呢?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

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许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指出,瞿秋白留下来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博古不管任何人说项,都不再违背组织的决定,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何况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

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坚持《红色中华》正常编辑出版，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的身体，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捕获，后被杀害。在他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 1976 年状况

○ 阎长贵

编者按：本刊 2010 年 3 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

2010 年 12 月 22 日毛远新电话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 1976 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 年 4 月 30 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 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

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 1976 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应客观评价曾希圣

。张军

一

2010年8月6日,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传奇》(以下简称“传奇”),作者颂扬曾希圣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时期所作的贡献,文中列举他在战争年代担任情报局长时,令人吃惊的破译敌人密码的能力、献计帮助红军长征摆脱困境,战胜敌人等等,令人敬佩。但“传奇”中讲到曾在建国后的和平年代里,几十年里在各条战线积极开展工作,特别对于“责任田”的推行,倾注了他的智慧和热情。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先后在安徽省宿县和合肥郊区试点,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61年底逐渐扩大范围,“责任田”从60%扩大到90.11%,那年安徽整个粮食产量超产5000亿斤等。如果真是这样,1960年前后安徽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成为我国重灾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是无法向世人隐瞒的。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共青团安徽省委工作,后调来上海,因为我是皖北人,和家乡一直有些联系,故土难舍,对于安徽的一些情况特别注意。

讲几件事:第一、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在各机关里进行,声势浩大,气氛紧张,安徽也不例外。我也曾担任过“打虎队”队长,但“真老虎”不多,打的“假老虎”不少。当时《安徽日报》两位主要负责人——夫妻两人都被打成“大老虎”,因为他们“拒不认罪”、“对抗组织”被逮捕入狱。过了一段时间,案情没有进展,省委就派团省委书记项南(以后任华东团委书记、团中央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到监狱进行

劝说。项南同他们是多年战友,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当然知道项的来意,项还没开口他们就说:我们是好朋友,作为朋友你来看我们非常感谢,请坐下来谈。如果你受组织上委派,来劝说我们“认罪”的,请你立刻回去,我们没有话可谈。这时项南无话可说,只好作为个人来看看他们,坐下来交谈几句就走了。后来安徽省委上报华东局要判这两同志死刑。华东局有关领导发现这个案件疑点很多,进行核查,结果查明是一大错案。他们被无罪释放后,调来上海工作。这两位老同志现在都还健在。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不能说没有责任吧!

第二、1957年“反右派”运动,安徽省在扩大化方面也是够严重的。在干部和群众中口碑很好的李世农,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和平年代艰苦奋斗,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因为不同意省委对反“右倾”运动的结论说是“成绩是主要的”,于1958年1月,他与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部门的一些领导成员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一直到“文革”后才彻底平反。“反右”扩大化,把省委书记扩大进去,在全国恐怕也是很少的。作为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不是没有责任吧。

第三,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成立人民公社等过程中,刮共产风、浮夸风、吃饭不要钱等等,安徽也不落后,过去曾在上海龙华监狱同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一起坐牢的张恺帆,曾写下“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老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诗句,在敌人屠刀面前坚贞不屈,赋诗明志。解放后在安徽工作,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大跃进”中他到无为县去调研,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公社食堂,浪费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他下令解散食堂,让社员回家烧饭吃,允许农民在自留地里干活,到水塘捉鱼抓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这本来都是些大好事。可是有

些人把这些整理成材料密报给省委、省委转给当时正在庐山开会的曾希圣，曾立即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称张恺帆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党内阶级异己分子，传达到全国各地。张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逮捕囚禁、关押 200 多天，流放到基层改造，这事和曾希圣有直接关系。

三

“文革”之前，安徽是个穷省，工作比较落后，冤狱过后张恺帆写过一首自责诗：建国十年久，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尽，惭愧吃公粮。这是真实写照。何以如此，正像人们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了三年困难期间问题就爆发了。真正原因是曾希圣主持安徽工作以来，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欺上压下，弄虚作假，终使自己垮台。

记得 1954 年粮食统购统销，一些地方虚报产量，统购过头，群众没有粮食吃，叫苦不迭，差点没饿死人。但省里并没接受教训，到了“大跃进”时，浮夸风、共产风盛行，民不聊生。家乡的叔父和几个舅舅，都是农民，1960 年，家里没粮食吃，来信向我求救。我一面把来信转到阜阳地委，请他们调查了解，一面就把橱内《鲁迅全集》、《斯大林全集》等变卖，寄点钱给他们，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终他们都在饥饿中死去。

无为县原是靠近巢湖的鱼米之乡，县里报喜不报忧，1958 年产粮 7 亿斤，上报 13 亿斤。当时全县人口 90 余万，平均每人一年有 700 多斤粮食。如果不是上报 13 亿斤，无为县就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惨祸。

安徽死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先兆。1959 年张恺帆下乡了解情况，就发现粮荒十分严重，反映给省委曾希圣等，而省委却视为这是“假象”，群众把粮食藏了起来，下命令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赶紧回来找曾希圣汇报，曾说你的书面报告我看了，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有点右，要注意。结果下面同志都讲好话，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致不可收拾。

问题发生后，曾希圣等欺上压下，封锁消息。凤阳县群众写信反映饥荒严重、没有粮吃、想逃荒出去、到处设立“劝阻站”、不准外出等，信件被扣压。五河县一公社也扣压人民信件，不向外面

透露灾情，这些都是根据省委书记处秘密下达通知扣压的。1960 年，华东局柯庆施书记两次到安徽蚌埠了解灾情，省委封锁消息，使柯什么情况都没有了解到。中央领导董必武等到淮北视察，当地干部用欺骗手法，不让他们看到真实情况。就在群众挨饿，饿死数百万人的情况下，曾希圣等却在合肥大兴土木，大建别墅，给每个省委书记盖座小楼，花费巨大。

1962 年中央召开 7000 人大，曾希圣等人受到批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倒台了，几个主要领导人被调离安徽、降职、降级另行分配工作。曾希圣调离安徽后，要求重新回到安徽工作，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要向安徽人民“赔罪”，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好的。

四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陈年旧事，本可不提，但“传奇”一文制造谎言，掩盖事实真相，说什么从 1958 年到 1961 年，曾希圣推广“责任田”，1961 年产量超产 5000 亿斤，只字不提饿死人严重事件。如果真像“传奇”一文所说，曾希圣为什么还要回安徽、向安徽人民“赔罪”呢？曾希圣在安徽试行“责任田”是有的，那是在安徽大量饿死人之后的 1961 年 3 月试点，7 月之后推广，而不是 1958 年到 1961 年底，时间相差 3 年，这是有意混淆视听。

我不是要抹杀曾希圣在安徽工作上的努力和功绩，也不是把安徽发生的问题都推在他一人身上，上下左右可能都有责任，有的问题上面的责任可能更大些。我的意思是作为省的第一把手曾希圣对安徽省发生的严重问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还要说一点：我们有些高干子女，听惯了人们对其父母的颂扬，一听到批评，就不高兴、就反感。我劝他们心胸放宽一些。你们父母因工作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甚至有些人家破人亡，子女都受到连累。比较起来你们是幸运的。现在人家为了弄清事实，对历史负责，批评几句，又不是追究责任，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们认为批评不对，也完全可以申辩，进行反批评。■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责任编辑 杨继绳）

批判陶行知始末

○ 李仲谋

陶行知先生 1951 年因电影《武训传》牵连遭到批判,迄今已 60 周年。这是发生在陶行知逝世 5 周年、新中国诞生不到两周年的一次重大思想政治运动。当年激烈批判陶行知的先生们,后来对陶先生被大批判的是非多未能做出切实认真的反思。往事并不如烟,是非应该辨明。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 120 周年,逝世 65 周年。笔者追溯往事,望学界特别是教育界记取历史教训。

一、陶先生身后曾获崇高评价

陶行知先生于 1946 年 7 月 25 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 55 岁。据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电报称,先生是因为“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死的。陶先生之死,成为 1946 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悼诗称:“吾敬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园中规矩,教育愈陶多。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伸。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8 月 11 日,延安举行隆重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到会的各界代表 2000 余人,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陶行知给予了崇高评价。总之,陶行知死后受到中共中央和高层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

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 7 月底至 12 月初,长达 5 个月时间,上海(7000 多人)、重庆(2000 多人)、延安(各界代表 2000 多人)、南京(2000 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美国的教育界名流和中国留美人士 300 多人参加,在纽约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新加坡各界华侨 100 多个社团千余人,在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主持下,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三先生的追悼会。

诸此哀荣,或可以为是为陶行知先生“盖棺论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 年 8 月号第一卷第四期的《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社论,指出:“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这是当时的教育部主管的机关刊物,在开始新教育的建设和旧教育的改造的名义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所表明的一种态度。

新中国批判的第一个外国教育家是美国的杜威,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人民教育》1950 年 10 月号和 11 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上、下篇。该文指出:“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

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并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二、批判电影《武训传》,矛头指向陶行知

1944年夏,陶行知先生在重庆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几经周折,终于在1950年由昆仑影业公司摄制完毕,首先在上海、南京公映,引起轰动,并被《大众电影》杂志评为1950年十佳国产影片之一。

1951年初,孙瑜携影片拷贝进京。先是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一百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看了影片,放完之后,报以掌声。后于3月3日星期六,毛泽东和江青及警卫班的卫士,在中南海含和堂一同看了《武训传》。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毛泽东很深沉,一根接一根吸烟。影片放完后,他要“再放一遍”。第二遍放完后,毛泽东发话:“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袁曦《〈武训传〉批判记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这被看做是重要指示。

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汇报“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明确地说:《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转引自王一心著《最后的圣人陶行知》,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5天后即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就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编者按指出:对影片《武训传》及武训其人持赞赏态度的人,“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诘问语气:《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



陶行知(1891—1946)

吗?》,内容也做了些修改,并加了编者按。按语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

随即对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批判陡然升级。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社论中罗列了“歌颂武训”的40多篇文章、书籍篇目、作者姓名和发表的报刊,然后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为时不久,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

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毛泽东笔下始终没有点陶行知的名字,但显而易见的是,所指“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的人士为数众多,不能排除陶行知位列其中。

与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的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这一讨论当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写的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的发表,把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思想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引向深入,行动广泛。国家机关特别是文化部、电影局、教育部等,纷纷召开讨论会实即批判会。各大报刊特别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教育》等,相继发表大批量、重量级的批陶文章。这些批判会和文章都是“一箭双雕”,既批电影《武训传》,又直接点名批判陶行知,群起而攻之,剑拔弩张,势不可挡。

《人民日报》5月19日发表丁曼公的《武训的真面目》,文章说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作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贫乏的状况。”6月2日,李一氓的《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一文,不但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感染有武训思想”,而且严重地指出“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无原则地加以原谅或赞成。”

《人民教育》曾经是批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主要阵地。6月1日出刊的第二期社论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社论指出:“我们确没有能够从影片中发现带有原则性、

‘带有根本的性质’的问题。相反,我们进步的教育工作者中有人发出歌颂的欢呼了。……‘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社论中引语出处为《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武训精神”是陶行知提出与宣传的,打倒了“武训精神”,陶行知被打倒也就为期不远了。《人民教育》接连在第三期辟“关于武训问题笔谈”专版,集中发表了当时教育界重要的和知名的人物,如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特立、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曾昭抡以及孙起孟、林汉达、方与严、张健等人的23篇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有些是表态性而无攻击性,有的即极具攻击力。

方直的《这是一个起点》一文认为,当前批判《武训传》是一个起点,“从这一起点,我们要将我们的理论工作扩大到系统地批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派的教育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及研究与批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等。”这就是说要把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本主义教育思想视为同一体系、同一架构,均需系统地批判。

张健曾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他的《所谓“三无”、“四有”》一文,把陶行知概括的“武训精神”是“三无”、“四有”的行乞兴学过程,前因后果颠倒过来,认为武训恰恰是“三无”为“三有”,“四有”为“四无”,进而认为“陶先生错误地表现中国历史上一个‘行乞剥削农民,兴学为地主报务’的大骗子,当然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同时还由于陶先生的声望,这种错误地表扬曾一度大大抬高了武训在政治上的‘身价’,因而其危害性也是极大的。”“使我们更深刻感到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提出系统的研究与批评也是时候了。”张健此后发表在1951年11月号《人民教育》的《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检讨他自己“受着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影响,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来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友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

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不但群起而攻之,而且在阶级属性问题上,进一步地把陶行知从小资产阶级推向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

凯旆的《从讨论武训思想谈到批判旧教育思

想》一文认为：“想在蒋匪帮统治者下找出路的什么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便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反动思想——麻痹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所以，这些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者也能在反动统治下存在，并为反动统治者所欢迎，甚至给予津贴，作为反动统治的直接助手。”

罗慕清发表在1951年6月3日《光明日报》的《我不同意李士钊先生的检讨》一文认为，陶先生歌颂武训他就等于武训，也就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

社健发表在1951年9月号《人民教育》上的文章《关于“评小先生制”一文的商榷》认为，“陶先生的主要错误还不在于小先生制能否教人的问题，而是幻想在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下，不经过革命，就能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现普及教育。”“这和他当时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这和他那种基本上是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学说是分不开的。”“由于他缺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的帮助，直到临死时为止，对那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体系，尚未进行科学的批判。”

在批判《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的运动中，有些人其中也包括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检讨自己，把所谓错误根源指向陶行知，一方面把批判继续引申，写文章的人的身份职位也高了起来。

《人民教育》1951年10月号，戴白韬的《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文章认为，“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面，应有明确的认识。”“从他三十年来的言行看，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董纯才的《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一文，认为：“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作为陶行知先生的战友或学生，如张健、戴白韬、董纯才、刘季平等，在当时严峻、敏感的思想政治批判斗争中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政治思想界线，坚持认为陶行知政治上是革命派，而妥协退让到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问题划归到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实用主义，以避免陶行知受到更严重伤害。他们对陶行知先生的维护，用心良苦。

但这仍不被认可。《人民教育》1951年12月潘开沛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针对戴白韬、董纯才等所持观点，认为“把政治和教育分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的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的运用和新的发展。”

1951年6月，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由江青带队到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长达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修改定稿，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为题，在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连载。调查带着框框，为武训已定罪名找罪证，以流言飞语为根据，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是历史罪人。

据此，文化部、教育部门的领导人以为有了所谓调查的事实，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有了证据。郭沫若写的《读〈武训历史调查记〉》，在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8月25日第四卷第九期转载。他忙不迭地检查自己：“我对于武训的歌颂也曾附和过。我曾在1945年冬重庆武训纪念会上对武训的所谓‘功绩’作过一次极其夸张的发言，去年我又替《武训画传》写了书名和题词，实在是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然后笔锋陡转说：“陶行知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

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题为《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人民日报》1951年8月27日发表，《人民教育》9月号转载。全文三部分，第三部分标题为“陶行知为什么歌颂武训”，指出：“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起初也是改良主义的教育派别，后来逐渐变成了革命的民主派别。但是陶先生在思想上并没有与改良主义完全决裂。而这就是他狂热地颂扬过武训的原因。”钱先生不失公道指出：“因为陶先生曾经自比为‘新武训’，并且曾经热烈地歌颂武训，个别的武训批判者从此就认为陶行知就等于武训，就说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1951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似是《武训传》的批判作总结。该文关于陶行知先生有一段话说：“陶行知晚年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这场猛烈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运动，历时大半年，直到1951年年底才沉寂下来。

此次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除文化部周扬、教育部钱俊瑞最后以大批判作总结而告终，再没有结论，以不了了之。历史何以至此？

三、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呼声在反右斗争中湮灭

五年后的1957年，陶行知被批判事终有人提起。然而，却不是适宜的政治气候，陶先生仍然没能翻过身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陈友松教授，在1956年10月1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一文，认为陶先生“创造了一套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革命的、教育思想，留下了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人师’的榜样”，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有

宝贵的贡献”。四个月后，陈先生又在北师大教育系主持召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积极的和合理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只推崇苏联凯洛夫等教育学，忽视中国自己本土的教育思想，是另一种呼声，只是作为一个学术思想问题提出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5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提出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邓初民先生情不自禁地提出，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的问题。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初民先生有关陶先生的一段话。邓先生因此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和来信，还有朋友亲自到他家，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杂志，为纪念陶行知逝世11周年，发表了邓初民的文章《我们必须对陶行知给予重新评价》和张宗麟先生《关于陶行知先生》两篇文章。

邓初民先生的文章情辞恳切，他说：“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他以亲历亲闻指出：“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邓文还就有人批判陶行知的宣扬“武训精神”和“杜威翻版”两大问题实事求是地作了辩驳。邓文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

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把武训搬出来做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经对我讲过的。”邓文还指出:“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

张宗麟先生也和陶行知“相处多年,相知较深”。张文从九个方面对陶行知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训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经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极粗暴的棍子。这棍子不但打灭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等等。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先生的呼声,也就到陈、邓、张三文,即戛然而止。

事隔不久,北师大教授陈友松先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0月号的《人民教育》同期发表了两篇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文章没有涉及陶行知,无一字批陶。但时尚逻辑是因人废言,右派分子的言论,当作为右派言论。陈友松教授等提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遗产,对陶先生给予重新评价,随着反右派斗争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再也无人提起。

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好在有毛泽东题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题词作为护佑,陶行知没有被触及。

四、陶行知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

时光易逝,30年过去,终于坚冰消融,春归大地。

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

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介绍陶行知生平。邓颖超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1946年对陶行知先生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的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讲话指出: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鲁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武训是个平凡的农民,历史上的小人物。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指示,限“于地方范围内”恢复名誉。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篇关于《武训传》批判问题,指出“当时的具体做法有明显缺点,即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值得提出的是,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后,有的曾经批判过陶行知先生的如刘季平同志,先后在1986年陶行知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检查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给陶行知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等三顶帽子,在1986年第2期《群言》杂志上发表了《〈武训传〉批判对教育的影响》文章,重新认识和评价陶行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襟怀。■ (2011年7月12日)

(作者为安徽省教育厅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

○ 秦卫东

1961年8月1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向国务院《关于甘肃省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同居情况的报告》称,1959~1961年6月,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静宁、陇西、通渭、崇信、庄浪、天水、武都等县流入陕西陇县、兴平咸阳、宝鸡等地16~45岁妇女两万余人,并和当地群众非法同居,未办结婚手续的占73%。办了手续的占11%,订婚的占16%。有的已生了小孩。外流同居妇女原说自己没有结婚或丈夫去世,但实际上多数是有夫之妇。有的丈夫已找上门来,有的写信向政府告状。有的属于“放鸽子”,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来陕西求生就食。大量甘肃妇女流陕,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希望中央政府协调两省共同解决。

9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指出,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陕甘两省应密切联系,认真做好遣返工作,积极主动解决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甘肃妇女跑到陕西与人非法同居呢?

甘肃在三年大灾荒中是全国的重灾区。上世纪60年代初遍布全国的大灾荒,是天灾还是人祸?历来有不同说法。这几年随着“大跃进”时期史料的不断解密,史学界的看法趋于一致。史实证明,虽然那几年甘肃气候确有干旱问题,但总体上与1957年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把问题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是不准确的。刘少奇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总结讲话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问题出在“大跃进”中的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比如粮食生产的高指标,1958年甘肃省委提出的粮食生产指标是91亿斤,而经过努力的实际产量是31.5亿斤。浮夸风引来高征购,1958年全省征购粮食12.7亿斤,占总产量的37.5%;1959年粮食产量是33亿斤,征

购任务更高达47.6%,再扣除种子和饲料等提留,分配到农民手里的粮食全省平均每人全年不足160市斤。在此期间,还大规模进行“反瞒产私分”运动,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查“黑粮”,搞得农民家里基本无粮可食。

1958年5月23日,甘肃省人委办公厅印发内务部、粮食部工作组《关于甘肃省徽县春荒与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称:徽县从本年二月开始,个别的从上年12月间就开始缺粮,缺粮面在不少乡社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个别乡社达到百分之百。个别地区每人每天吃六小两粮食(相当于0.375斤)。吃代食品不仅普遍,而且以代食品当主粮。全县已出现浮肿、干瘦和非正常死亡。

是月,成县、礼县、甘谷、武山、秦安、镇原、华亭、民勤、民乐、张掖等县发生干瘦病和浮肿病,截至五月底,发病人数735373人,死亡9770人。还有因食用油渣等代食品中毒和外出乞讨而非正常死亡1886人。

1959年7月15日,庐山会议召开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召开粮食问题的会议。会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报告说,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全省除兰州市外,共45个县、市缺粮,其中平均每人每天能吃到12市两皮粮(相当于0.75斤,皮粮是带壳的原粮)的有19个市县,人均每天8市两(0.5斤)皮粮的有19个县市,不到8市两皮粮有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7个县市。这些地区中,严重缺粮的人口共154万。全省浮肿病9.6万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有6万人。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一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后,霍维德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甘肃的彭德怀”,被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理由是他向中

央报告甘肃的灾情,是为庐山的“右倾反党集团”提供了炮弹。

1959年7月底,国务院秘书长马永顺等六人来甘肃,在对陇西、静宁和武威三县共六个公社的灾情分别进行了抽样调查后确认:“甘肃缺粮和饿死人的情况严重,各生产队饿死或患干瘦、浮肿病及外流乞讨的社员普遍存在。至本月底,陇西县两公社因断粮饿死5621人,静宁县两公社饿死1810人,武威县两公社饿死1110人。”

“大跃进”期间,甘肃上马了西起岷县,东至庆阳董志塬的被称之为“共产主义工程”的引洮工程,未经认真勘察,仓促全面动工,施工期间常年动员民工10万人以上,最多时达到16万人。引洮工程从1958年到1961年三年多时间里,因公死亡667人,因饥饿和浮肿病病死亡1783人,其他死亡207人,共2657人。

从1959年起,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迫使甘肃农民开始了悲惨的逃荒生涯。这就是大灾荒期间甘肃妇女流落陕西的时代背景。

当年收到中央通知后,甘肃省指派由省地县三级组成的工作组赶赴陕西,动员流入陕西的妇女返乡。至年底,经过两省民政、公安、法院等部门协同工作,已动员回乡妇女两万人左右。

与此同时,甘肃省政府民政部门还向新疆哈密、内蒙古包头和青海西宁派出工作组,接受遣返本省外流人员。半年内遣返本省外流人员70279人(宝鸡遣返27945人,哈密24198人,包头13355人,西宁4781人。)其中妇女占半数以上。

由于灾荒仍在继续,逃荒潮也蔓延和扩大,省民政厅驻哈密劝阻外流人口工作组发现,逃荒到新疆的灾民有增无减,遣返一批又来一批。他们在安西县峡东火车站设立流动收容劝阻外流人口重点站,上到火车上开展收容劝阻到新疆逃荒的甘肃难民。仅1960年10月份一个月内,在火车上就收容劝阻本省流入新疆的难民1872人。

1960年12月15日,内政部工作组、省民政厅、兰州市民政局联合组成自流人口劝阻收容工作检查组,用9天时间检查了在兰州的收容所,证实流入兰州的灾民达到25.17万人。

1963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局又一次转来陕西省委批转省人委政法办公室《关于制止和处理与外省灾区妇女非法同居的报告》。报告指出,

自1961年9月以来,又有8万外地妇女和宝鸡、咸阳群众非法同居,其中甘肃妇女占六成以上。

12月11~13日,以甘肃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子厚、天水专署副专员白璋、定西专署副专员毛德功以及省公安厅、高级人民法院、武山、甘谷、秦安、张家川、通渭、陇西、漳县的负责同志等22人甘肃工作组,赶赴西安,与陕西民政厅副厅长吕向晨、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振瑞庭长,省妇联副主任刘静以及省公安厅、宝鸡专署民政局、咸阳专署民政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12人,举行处理甘肃灾区妇女遣返问题座谈会,讨论贯彻西北局和陕西、甘肃省委关于处理甘肃灾区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的指示精神,共同拟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和办法。

陕西和甘肃互相通报了有关情况,据初步调查估计,甘肃灾区流入陕西的妇女约有5万多人,这些妇女中原籍有丈夫的占相当比例,而很多人已同陕西群众非法同居,有的在陕西又生下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陕西人不愿放回,甘肃人要讨回,遭到刁难和毒打,造成一些妇女顾虑重重,于是,矛盾冲突大、阻力大,成为棘手问题。如天水中滩公社刘某,艰难地抚养两个孩子,于是决定陕西找爱人,卖掉老人的寿板材、家具、布证等,四次前往陕西,终于找见,因其爱人在陕西又生了孩子,该妇女既难舍陕西孩子,又思念甘肃孩子,在举棋不定时,刘某从甘肃带来村里人和亲戚夜抢该妇女,双方打起来,结果一人被打伤致残。

甘肃人在讨妻子时,陕西群众抵触情绪大,陕西人说:“陕西人把甘肃人救活了,现在甘肃人又来领人回去,没良心,理不通。”有的说:“在陕西时间长了,成了家,生了孩子,现在要领人回家,拆散夫妻,破坏家庭”等,因此在个别地区,对甘肃人接找原妻百般阻难,有的向接领者要算房钱、衣物等费用,有的将妇女深藏密窖躲避等。还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强迫捆绑。激化了矛盾,增加了遣返的难度。

座谈会认为,妥善处理甘肃灾区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对维护国家法纪、社会秩序,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婚姻、家庭,对发展集体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对增强两省人民的团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陕甘两省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密切配合,

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在座谈中，双方就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经过了充分协商讨论，十二月十三日形成了《陕甘两省关于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纪要》。《纪要》中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甘肃灾区流入陕西的妇女，流入地区应认真动员，使她们返回原籍与家人团聚，而动员重点是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原则上均应反复说明动员其返回原籍和家人团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现役军人妻子(包括未婚妻)，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妻子，应坚决说服动员返回。涉及诉讼法律等问题时，应按保护军婚的原则处理。”

“部分有夫之妇因与本夫感情不和，或因与现同居者已生有孩子等原因坚决不愿回原籍的，应继续说服动员，什么时候思想通了什么时候送回，不要强迫命令，防止发生意外。个别与原丈夫感情已完成破裂，无法和好的，如双方同意，可向男方或女方现居地的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应向本人现居地法院起诉，由法院和对方法院取得联系后判处。”

“无夫之妇，愿回原籍的，应当送回原籍；如和现在同居者情投意合，不愿回原籍的，由本人和原籍联系，原籍公社应及时出具该人在原籍无有配偶的证明，女方现居地公社接到证明后，应准予落户，承认其婚姻关系。”

“童养媳和流来的小孩，原则上应一律送回原籍。其中原籍确无亲人，生活没有依靠愿回原籍的，遣回甘肃，由甘肃省设法安置。个别坚决不愿回去的，应准许现抚养人继续抚养，不得歧视虐待；但属于童养媳的，应一律宣布废止，待双方达到婚龄时，是否结婚由双方自行决定。返回妇女原带来的小孩，应一律随其母返回原籍；与现同居者所生的小孩归谁抚养，应本着有利孩子教育成长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纪要》确定，凡经说服动员后愿返回的妇女和小孩，应按本人具体情况，有的可由政府或本人与原籍联系，取得同意后自行返回。有的由前来接领的家属领回，毗连地区，如陕西的陇县、千阳、略阳、宁强遣回甘肃清水、张家川、康县、文县

等地的尽可能通知原籍家属和政府派人前来接领，有的可由甘肃工作组接领，不能自行返回也无人接领的，经当地收容站通过专区所在地收容站送至甘肃省天水北道埠接收站接转，但由收容站遣送时，必须防止强迫命令、民兵押送、打骂捆绑、侮辱妇女等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自行返回和家属领回所需车路费一般的自筹，有困难时由当地民政局从资遣费内酌情补助，甘肃工作组或有关县来人接领的，所需车路费由甘肃方面负责；各县、市遣送妇女所需的车路费，由各县、市在遣送费内开支。

二是工作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纪要》认为，处理甘肃灾区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数量大、时间长，是一项相当复杂和艰巨的工作，有些基层干部、群众有许多思想阻力，特别是现在未返回的妇女，其中有很多人流来时间较长，有些和同居人已建立了感情，有的已生有孩子，有的是过去曾动员而不愿返回的。因此，必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严肃慎重，妥善处理，绝不能强迫命令，简单从事，严格防止发生打骂、捆绑等事情。流入和流出地区，均应向基层干部、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反复地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时刻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严防抢亲、斗殴、凶杀等事件的发生。凡党、团员和基层干部有留居甘肃流来妇女的，应说服教育他们带头将留居妇女送回原籍；并通过他们积极向群众宣传动员，将流来的甘肃妇女及早送回。

两省座谈会后，《纪要》精神在两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干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教育，遣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1965年7月，甘肃省派驻陕西接遣外流妇女工作组奉命撤回。工作组在陕西的15个月中，共接回流陕妇女两万多人，儿童4100人。加上1961~1963年接回的两万多人，8万流陕妇女中前后接回5万人，接遣工作告一段落。没有回来的，也都按两省座谈会的精神，办了结婚、离婚手续和户口及粮食关系迁移手续。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

(作者为兰州军区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

○ 萧 凌

清华附中的前身是 1915 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师子弟学校“成志学校”；1960 年改名清华附中，并成为面向全北京市招生的重点中学，汇集了高干和高知子女。一个偏踞京郊的中学，一群未成年的大孩子，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竟然担当了一个奇特的角色——红卫兵的发源地。

作为一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清华附中毕业生，我一直很想搞清楚那个把清华附中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的神秘的动因。可是，奇怪的是，我在清华附中学习的六年期间，几乎无人提起十几年前的那段非常的历史。我们当时的校长依然是“文革”前上任，被红卫兵小将打得体无完肤的“生不逢时”的教育家万邦儒先生。他总是笑容可掬，从容不迫。很多教过我的老师都经历过“文革”。但是很少听他们提及他们的个人经历。

但是我仍然好奇。如果不把这个事件的深层原因搞清楚，谁能保证再过 10 年我们不会再经历一次集体的疯狂呢？我下面的介绍是那个大混乱、大疯狂背后的因果脉络。

1. 起因

1966 年的春天，在荒芜的圆明园里，有一群清华附中的高二学生秘密集会。他们心里偏执的阶级意识、暴力革命的冲动、青春的叛逆精神、对精神偶像的崇拜，加上高干子女的特权心态，聚焦成了一个星星之火。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在全国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催生下，这个火星点着了清华附中，带动了北京的其他中学。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祖国的花朵”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在红旗下生长。但是，他们并不都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阶级意识从父辈继承下来。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业者）子弟之间的相互对立愈演愈烈。从 1964 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

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1964 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校领导把一个平民子弟和一个干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一位高知子弟回忆说：“‘革干’‘革军’子弟们……对我，从来是敛容正颜的。他们与我之类‘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关系。”当时全社会阶级成分观念已经很严重。

但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也有他们的不满。那时，清华附中成立了预科班。能够被选入预科班不仅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可以直升清华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基本还是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挑选的，只有那些有严重家庭问题（例如：杀、关、管）的不在选拔之列。比如预 641 班的高知子弟就比例较大。高 66 届的很多高干子弟没有被选入预科。这也成了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批斗万邦儒校长的一条罪名。一位高干出身的红卫兵的发起人回忆说：“我们都住在学校，常常去毁坏的圆明园讨论我们的战略、分析当时的现状。会议结束时，我们不敢走前门进入我们的宿舍，因为那里有站岗的人。我们从一条小道偷偷地溜回去。在那时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从事秘密的革命行动，并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我们那一组的人都很勇敢、无私，充满奉献精神。圆明园在我们年轻人心灵里有着特别的设想。它是中国过去半个世纪被侮辱的象征。我们满怀理想和热情，有着振兴中国的巨大的责任感。”

虽然 101 中学也在圆明园旁，但由于他们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子女又占大多数，没有形成高干与高知子弟的对立，没有成为红卫兵的发源地。红卫兵的诞生，借用林立果之类的一句话，就历史地落在清华附中。

2. 成立

1966年5月29日以高干子弟为主的一群预科班学生在圆明园遗迹上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一位红卫兵发起人事后说：“发生红卫兵运动有几个原因：来自高干家庭学生的优越性和特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极左倾向，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反感等等。”但是一位反对红卫兵的高知子弟说：“他们跑到圆明园遗址去成立‘红卫兵’，不就是要‘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不就是嫌他们的专政还不够牢靠，要‘誓死’加以‘保卫’吗？”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教室里。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当时，非干部子弟对高干子弟的特权心态很反感。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高知子弟们也组织起来对红卫兵进行笔墨回击，开始的局势对红卫兵不是很有利的。

3. 工作组介入

6月8日，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当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代问题。形势的突变使站满大操场的学生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保送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干部子弟独当大权。昔日文体兼优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平日并不出众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耀武扬威，内心觉得他们“个个面目可憎”。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

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红卫兵掌握的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7月下旬，高干子弟发起的红卫兵受到了意外冲击，他们的当权的家长们竟然开始受批判了！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罗瑞卿的下属，受到批判。

4. 更高层的介入

但是，情况向高层发展，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篇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一个条子直接交给江青。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直接和红卫兵见面。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大字报作了批示，批示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的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据当年的清华附中学生阎阳生记载：“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一位被红卫兵迫害的高知子弟说：“自从学校由‘清华附中’改名为‘红

卫兵战校’，校长老师和我们这些‘黑苗子’就都成了‘狗’。万校长叫‘万狗’，韩校长叫‘韩狗’，老师们也大都成了狗，我们班至少有郑、戴、赵、刘四条学生的‘狗’。红卫兵大头目不喊我们‘狗’。他们自视甚高，举手投足全然是青年毛泽东之风采。称人为狗会降低他自己的身份，他们是要做大事的人。因此，全校师生在斗争会上惊心动魄地齐声高呼某‘狗’站起来时，他们总是端坐主席台上，慢声呼唤被斗者的名字。他们知道，这种情绪平和甚而温柔的称呼，显示着专政的威严与阴森。那是比称人为‘狗’的狂声呐喊更令人恐惧的。”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清华附中有些班级的红卫兵相对比较温和。甚至保护了自己的班主任。这些班级的高知子弟也没有被打。而且工宣队进校后班里的革委会还向这些学生公开道歉。这样的班级中同学之间没有结怨。现在同学之间关系很好，来往密切。有的还一起开了博客，聚会也很多。但是斗争的激烈的班级因为红卫兵对同学伤害太大就至今不能和解、释怀。

5.血腥的“红八月”

7月29日，北航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标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该对联提出的血统论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谭力夫以血统高贵者的口吻发表了趾高气扬的讲话。清华大学红卫兵把《谭力夫讲话》大量印刷，全国散发。不久，血统论更大地掘开了全社会阶级敌我意识和暴力残杀的大堤。抄家、批斗、武斗蔓延中国。只有遇罗克等少数人敢以生命为代价站出来对血统论



毛泽东、林彪和红卫兵在一起

说不。8月8日清华附中高一女生不堪红卫兵轮番批斗，卧轨自杀。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8月1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参加围攻团中央。

8月18日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小将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毛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这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1000多人。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8月23日，北京市28名作家、演员和领导

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8月24日下午4点,12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贺鹏飞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妖风,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下午4点50分,12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撕了所有大字报,大搞打砸抢,多人被打,很多家被抄。6点,推倒了1911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二校门,强迫“黑帮分子”和“黑五类”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在身负砖石者的后面用鞭子抽打。其中,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被批斗,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1967年在二校门那个地点建造了毛泽东塑像。这是“文革”中中国第一座毛主席巨型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不久全国仿效。(注:这个塑像已在1987年被拆除,“二校门”被重立。听说有的城市近年又竖立了材料更昂贵、体量更高的毛主席像)8月下旬的北京已进入暴力的狂热。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一个学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清华附中的几乎所有领导和老师都被打。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对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几个高知平民出身的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拼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后来回忆说:“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利量的支持或纵容。”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布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郑义说:“在那个火热的‘红八月’,红卫兵们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了数千市民,并代行国家行政权力,发布通令,把十万市民驱逐到乡村。……世界史上著名的‘砸玻璃之夜’,那些德国的青年

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烧书吗?还是我们中国的气魄大,上来就杀人。”8月27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8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10月9日到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没收私房52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可见红卫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来自上面的煽动和纵容的。

6. 清华附中被赶出“文革”核心舞台

运动一开始,中学生红卫兵当了“文革”先锋。大学生有的观望,有的跃跃欲试。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9月,“大串联”开始,清华附中已经不再是红卫兵运动的核心。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清华附中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10月红卫兵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进入秋冬,生存问题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8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

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

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出现了内部权力纷争,产生了派别,以平民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和以主张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产生了冲突。造反派批判贵族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

进入1967年,上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因为“联动”贴出了反对“文革”、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在军队的配合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一些红卫兵头目非法捕走。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此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几位元帅也批评抓这些孩子的行为。毛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4月22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陈伯达警告这些红卫兵不要依仗高干特权而脱离群众,搞打砸抢。

7. 后记

清华附中的导火索作用只维持了大约一百天。“文革”后期上面来了个“大翻个儿”。无论是

“奉旨造反”、“越旨造反”还是“趁机造反”,一律被镇压清算,什么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挥手,不论是失势的高干子弟、“黑五类”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随着上山下乡的浪潮,离开了被砸烂的校园,远远地去了广阔天地。一位深受红卫兵迫害的高知子弟说:“留在城里,天子脚下,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第一次政治大失败。这种失败感随我们流放到乡村,造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批判性思维。”很多高知子弟自己写血书去最偏远的农村,想通过实际的斗争,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而且几乎没有想下去后是否还能够再回来。整个一代城市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背朝天时,以往的改天换地的伟大理想和所向无敌的暴力斗争成了过眼云烟。他们的心灵在大山中、草原上、田野里,承受了彻底的“再教育”。

十年后,当“文革”的疯狂失去了魔力,群体理性渐渐恢复,邓小平恢复高考。一夜之间,无数蹉跎了最佳的学习知识的时光的“知识青年”们,重新回到同一条希望的起跑线。家庭成分和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辖制。当年被红卫兵所痛恨的教育制度和学习环境,成了几乎所有知青不顾一切要极力找回的“天堂”。

那以后,清华附中又恢复了以往的教学秩序。我1979年入学时,学校里已经没有了高知、高干、平民子弟的划分和对立。不论住校的和走读的学生,都和和睦相处。对老师和领导也尊重有加。几乎没有人问及、提到1966年的那段历史。四季交替,读书声依旧,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人类群体的记忆,尤其是对痛苦的记忆总是很短暂的。

有趣的是,经历过红卫兵运动清华附中学生中出现了三个作家:为红卫兵命名的张承志,深受红卫兵运动之苦的郑义(原名:郑光召)和在插队时患病致残的史铁生。虽然这三位作家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际遇迥异,但是他们都因着这一段剧烈的人生冲击,激发了对人类心灵的深层反思和探索。张承志写了《心灵史》,史铁生写了《灵魂的事》,郑义写了《招魂》。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饱受火的洗礼的圆明园似乎仍然在等待着更多仰望星空、求索真理的心灵。■

(作者为旅美学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骨头如故作铜声

——读李锐“流放”日记

○ 奚 青

笔者同李锐先生交往多年，每有倾谈。期间，曾为他整理过早年书信、日记等文字，并阅读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李锐一生坐过两次共产党的牢，一次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一次在“文革”中，于秦城监狱单间关押8年。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多次号召领导干部敢于进言，要“六不怕”，即为坚持真理而不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李锐当真这样做了，结果是“六不怕唯头尚在”——除了脑袋，其余五样全摊上了。不过，他在秦城作的诗中有律句：“平生文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

1963年7月25日下放劳动期间，李锐向水电部刘澜波部长并部党组呈送一份思想汇报。其中谈到：“在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一严重的历史关节时，我是造成祸害的当事者之一，确是罪孽深重。然而在内心深处，又常觉得我那是一时性的错误，我并没有居心反党，我同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关系；尤其觉得对于主席从来是五体投地，有的也只是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意见。有时也就不免陷入某种个人的痛苦。”“我在庐山所犯错误，最突出表现在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党和主席所称许的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标准作歪曲的理解，即不是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原则立场上来运用独立思考，而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独立思考。”“‘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已淹死。’现在我才算是真正尝到了这口苦药。”“不过，从我的历史、思想查看，我之所以犯这个错误，主要还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我绝无其他居心，相信党也了解这一点。”李锐同许多“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真诚忏悔，深刻检查。但怎么认错，也不认为自己有反党、反毛主

席的思想和行为。

李锐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他在1964年4月8日写有一首回顾南宁会议的诗：

一电忽传飞邕宁，事关三峡误三门。
故人为我担忧甚，成竹藏胸敢直陈。
骋辩当庭虚实显，上书隔日是非分。
偶逢破格常言事，祸伏之心且语人。

该诗讲的是1958年1月，李锐突然被召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进行一场“御前论争”。其结果，原本憧憬“高峡出平湖”，主张修建三峡大坝的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反方意见，并破格要李锐做他的兼职秘书。毛在会议上热情地号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称李锐“廷试中了状元”。

在全党、全国发高烧、升虚火的大跃进中，倘若三峡仓促上马，绝对是一场特大的灾难。李锐率性直谏，影响并转变了毛泽东的决策，其功至伟。秦城诗作《龙胆紫集》中，有一首评价唐太宗的诗，末两句为：“直谏虽不易，纳谏更为难。”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的清醒和冷静，值得称道：七十年代催促三峡上马声中，他仍没有点头。

李锐并未受宠若惊。他对多年的挚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自己心直口快，很容易惹祸，不适合在主席身边工作；并开玩笑说，这是“自投罗网”。李锐也曾对刘澜波和黄克诚袒露心底，担任主席的兼职秘书，怕是要“碰鬼”（湖南话，惹麻烦之意）的。

尽管李锐心存顾虑，但忧国忧民之心无改。在南宁会议之后，他还是就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和“二五计划”指标落实等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三封信，对大跃进的浮夸及其不良后果，提出委



婉的批评。为此,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当众嘉许李锐:“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同时,也批评了李锐:“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李锐怕鬼(指有一封信复印给李富春了),要改。”进而大讲“六不怕”,要求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李锐并不想效法海瑞。一是毛泽东雄才大略,令人崇敬;二是即使有缺点,也不可能同昏庸的嘉靖皇帝相提并论。不过,李对毛泽东并不盲目崇拜。在庐山会议中,即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德怀“万言书”的当夜,不平甚或愤懑的李锐和周小舟、周惠聚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周小舟说,毛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说,毛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翻云覆雨”。三个人意气难平,接着去见黄克诚,周小舟讲毛独断专行,李锐讲了更为激愤一句话:他(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他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末了彭德怀来了(彭住在黄的对面房)。尽管李锐、周小舟、周惠当即离开,但此事

还是被人告发到毛处,于是上纲为反党的“组织活动”,受到严厉追究与挞伐。从此,李锐一栽到底,20年不得翻身。由于他的前夫人写了两本揭发他的材料,庐山会议一案,只有李锐被开除党籍。

1959年,李锐在一首诗中写到他和毛泽东的曾经密切,以及庐山的逆转:

生涯岂可料,一召上青云。
南海塌边问,东湖夜话亲。
山风来雨骤,飞瀑忽雷奔。
每念交心语,冥顽似负恩。

“南海塌边问”,指李锐1958年1月底,南宁回来后应召入中南海,同毛在其卧室中长谈。“东湖夜话亲”,指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李锐在东湖向毛直陈对大跃进的看法,毛蔼然听取。李当时问毛:你在农村长大,怎么能相信一亩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食?毛答:看了钱学森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倘若整治李锐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他自可横眉冷对。问题是,认定他反党的,恰恰是他敬仰和追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而毛泽东又曾十分信任他,器重他。这一点,使李锐诚惶诚恐,倍感痛苦,故而有“冥顽似负恩”的自责。他在1964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自审:“夜读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这种文章是读不得的。‘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简直是为我写的一样。”这是李锐对自己气锐直遂、率性而为的反省,有思想修养一面,也有性格一面。

在20年的劳改、监禁和流放中,李锐经常做噩梦,在梦魇中惊叫不已。为此,往往被人敲门、敲窗,将他唤醒。他的梦魇,多半与毛泽东有关。

李锐一生保有写日记的习惯。为自我保护,他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公”。如:

1960.2.22日记:“我事何日可毕!夜有幻想梦。公谓:‘不料你是个坏人。’”

1963.1.9日记:“昨夜做奇怪凶煞两梦。一梦割人四肢,还要坐观,设法中途逃走,安上两个木脚后,此人精神即已全变。此梦由‘泥足巨人’事而来?”

1963.7.26日记:“半夜梦呓,叫得巡夜的老徐在窗外招呼。”

1963.9.9 日记：“可以像培根一样，写一篇‘关于痛苦’，第一句话似乎都想好了：‘肉体的痛苦是可以言传和有止境的，精神的痛苦则往往难以言传和没有止境。’”

1963.10.20 日记：“近来总是长梦，与自己各段历史有关人物，累累出场。又几次梦见公，不外鄙弃冷落之情。可见我无甚怨意也。”

1964.4.11 日记：“梦多而古怪。前夜长梦游古城堡，塑像竟能活动，昨夜是见公请罪也。”

1964.8.21 日记：“昨半夜小有发作，服两种含片即平服。以后即噩梦频来，几次梦中惊醒。尚张眼，看房中是否有人袭入。又作往事长梦。现在还记得由刘带我们到农垦部谈工作，王震留吃午饭，刘告我要减人，似不得已，眼圈亦红，而铁铮几变得认不出了。两个肛门解手。一切都是心中不平之气引起的也。”

1964.8.26 日记：“长梦，梦见公等，还有那位帮我改检讨稿的人。那两年发生的事，大脑皮质中用砂纸也磨不掉也。”

1964.9.20 日记：“半夜大发梦呓，大喊屋内是谁。小徐来敲门，我才觉醒。这种梦呓，大概常有发生，昨夜是喘片引起心悸之故。”

1964.10.25 日记：“昨夜睡得尚好，大概只发了几次梦呓（今天小戚告我听到吼叫）。”

1965.1.24 日记：“昨夜擦上万金油上床，一点醒来，几失眠，头痛之至。再睡着后，竟连做奇梦：公来到我处，款以好菜，各种乡味，谈鸭公之词，不知怎么高音也来了，带来小妹、么么谨见。”（鸭公为胡乔木，因其长期在毛身边，“春江水暖鸭先知”，喻之。高音为李锐前妻范元甄，高声吵骂成习，故名；小妹、么么为李锐的两个女儿——笔者）

1965.2.6 日记：“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奇梦，现在记忆还清新如梦：那位‘多言’的市长约我与高音商谈（似乎高音在彼家工作），让我仍去参加那种会议。会上公一认出，必然请我出去。我决不愿去受此待遇，乃至痛哭。后拗不过两人劝说，去参加会了（会场在一七层楼上）。公一边讲话，一边走过会场空道，看到走向我这边来了，我将帽檐拉低，仍被认出，于是将我拉出来，我就随他一同到会场外面。我与他辩论良久，记得最后我说了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打动了他，欣然同我再进会场，叫人拿酒来，与我干杯，全场欢然。这类

幻想，过去几年中也许闪过，终于来到梦中。”

1965.5.3 日记：“总是不能平静，得‘天真幻想’四句，真是痴心妄想：六岁寄居为何情？牢骚偶语非素心。圣代当今多雨露，解铃还望系铃人。”（六岁寄居，指1959年至1965年，已流放6年。——笔者）

1966.2.23 日记：“做长梦，与公争执。”

1966.6.15 日记：“一切问题仍在没有真正心服。”

1966.5.30 日记：“邻居近来常止不住要来闲谈‘三家村’事，讲些言不由衷的话。今天吞吞吐吐讲了一句由衷之言：那时开神仙会，这次文化大革命之后再没人讲话了。”

1966.8.19 日记：“近日常有梦呓。记得一次狂叫，觉两手被人分开抓住。醒来尚在恐惧中。”

可见，“公”对李锐心理压力之大，尽管李锐仍对“公”怀着善意和幻想，解铃还需系铃人。

在中共领导人中，李锐更敬重和感念的是周恩来。1943年，李锐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被诬为特务，关押一年半，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开释。建国后，李锐陪同周总理视察三峡、新安江等地，聆受教益更多。在“御前论争”中，周恩来同众多中央领导人一样，对李锐之胜出倍感欣幸。在庐山会议时他很为李锐惋惜。“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葛洲坝水电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出现乱局，被迫停工。1972年周恩来曾在国务院一次汇报会上提起李锐：“还关着？放出来也好，可以给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李锐就不赞成在干流修坝，主张先开发支流。”周公试图借此机会，让李锐参与解决这一重大难题，改变其“罪臣”的厄运。不知什么缘故，总理的提议，并未得到落实。

李锐梦见毛公，绝大多数都是噩梦。梦见周公，则温煦如春。如1962.7.25日记：

“夜雨，睡得尚好。闭眼即梦。做了一个多美的梦：见髯公，极为亲切，说党籍要先解决，云代说项。”

髯公，即早年曾留美髯的周恩来。周允诺再次援手，首先恢复李锐的党籍。实则，周公在“文革”中自身难保，已经没有能力搭救李锐。李锐1976年1月9日的日记，写下对总理极为深挚的感情：

“六点起床。做气功时,突闻沉痛的广播音,没料听到是总理的名字!不禁双泪直下。想起从前的一些情景,特别是山上(指1959年庐山——笔者)出事之后的一次谈话,带着多么深的惋惜。虽知是在病中,总觉他从不生病,能够长寿的。整日心情沉重。”

未几,在观看周总理逝世纪录片后,李锐写下一首痛彻肺腑的悼诗:

世间多少悲酸事,未有伤心似此晨;
九万人人齐下泪,三千千界共招魂。
音容宛在春风暖,教诲犹蒙冬日亲。
望断灵车不复返,长号顿作巨雷奔。

李锐没有见过鲁迅,但对鲁迅先生极为亲敬,《龙胆紫集》有“鲁迅颂”(七言)长诗175句。1966.2.21日记载:“竟梦见鲁迅,同他商量出版什么事情,真是‘梦中有幸’。”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流放期间,李锐对庐山会议,对毛泽东,对自己,有许多反思,进而对“公”产生更多质疑和驳诘。《龙胆紫集》中戊己诗(1958-1959)18首、偶感9首,都是写毛泽东的,2000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李锐诗词本事》中,有详细的说明(编者胡遐之、朱正、谌震、俞润泉)日记中也有不少记述。

1962.1.6日记:“有些什感:一代英雄打定天下,进入承平,治世久久,必生问题。从来正确,从来谦虚谨慎,功业过大,世成定论,久久亦反己律。决断与任性,对立而统一,大决断与大任性也常相伴。大概艰危之时‘任性’不至生事,风顺之日则起大波也。客观亦常害人。因真假之像常易混淆。曾参杀人,三传即为动摇也。竹解虚心是我师,此种金石古语,永生光辉。人之难即在常怀疑自己,怀疑他人他事,完全是自然状态(根本不用头脑者不在此例)。肉体痛苦有时限,可以复合;精神创伤徒徒无期,甚至不可复愈。思想解放谈何容易。世之痛苦莫过于作昧心之言。世上光眼瞎子何其多也。”

1962.4.7日记:“读《原理》,《通史》,并翻《哲学笔记》。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不懂自然科学是不行的。公于此似差一点。年轻时自然科学无丝毫兴趣,甚为可惜。谭嗣同还搞‘以太’(指太空物质——笔者),通数学。马、恩、列都是精通的。”

1963.6.18日记:“夜听完全本《武则天》(以

前听过后半部)演员甚吸引人。不禁又想起庐山的一幕。掌管天下之人,决不能留有异己。”

1963.8.24日记:“做了许多幻想好梦,公之如何开恩之类,说情之人甚多。有连续之梦为重归旧业,还我山河也。”

1964.2.8日记:“我曾被目为‘秀才’,旋被推翻。倘细细思之,我身上‘秀才’之气并不甚多,有些事‘推廓不开’,但许多事还‘推廓得开’,否则尚能如此豁达记此一段乎?在山上时听到:‘跟随多年,仍是书生’之论,甚不以为然。如今证实,此种不以为然实在是为然也。我之缺点与优点常常是同一的或并生的,如自信力之过甚,生一主意,即难动摇,非达目的,决不罢休。”

1964.4.9日记:“午饭后闲坐,又得一首,记一九五八年高潮也:‘海上弄潮翻复翻,各路诸侯比浪漫。笑语洞中方七日,世上已过一千年。’”

1964.7.7日记:“真搞工业的人,当年何尝不心中雪亮,我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配角万岁’(195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杂文——笔者),竟成大罪也。问题在于必须承认故有经验,不能只有自己经历方予批准。信手写上这些,可见积习难除,尘心不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为1958年李锐致毛泽东第二封信中的提议——笔者)

1964.7.24日记:“上午挑选主席语录,共六条,多针对此间情况者。有一条颇为人们少见:‘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当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人的精华就在思维,有头脑而不能不用,不愿用,实莫大悲剧。”

1964.8.5日记:“不禁记起成都会议时的玩笑语。这种教训是什么呢?一个人大权独揽时,可以黑白颠倒至何种地步!而人们则是分类的教训:个人置之度外者极个别,摇旗呐喊者一群,随声附和多数,也有明哲保身之群,广大群众则唯有绝对服从而信任也。有什么办法预防此种个人当权。古往今来好像是没有办法的。封建朝代设摆样子的都察院,但也还有个别的好御史,以死谏者。而现在,人们反而‘聪明’了。共产党员总是要反对奴隶主义的,‘驯服工具’字样现在似乎不见诸报刊了。以上这些话如果断章取义,那又不得了了。”

李锐晚年，对早期中共党员有三大归类：一是建党初期的革命先行者，追求救国救民的新路；二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寻求翻身解放；三是参与“12·9”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怀有争取民主、自由、科学、国家振兴和富强的理想。李锐属于第三种类型，其革命动因来自思想信仰。这批人具有自主人格和独立思考精神，也有科学精神。（受胡乔木之嘱，1956年李锐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故而很难压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锐非但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认定错在毛泽东。如：

1965.11.26 日记：“多么虚诞的梦境：先是到六公（李六如——笔者）家做客，很是同情谅解，殷殷关问，还告及有人诬告之事，示意总可解决，并留午膳。接着又至公家，说了这样的话：‘也许是我错了。但你们也可能有错。’定要留餐，极为亲切。”

在梦里，集“伟光正”为一身的毛泽东，终于承认自己有错，尽管有些勉强。这是李锐一直期冀和盼望的。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彭德怀有5个小时的长谈。毛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进而安排彭德怀去西南抓三线建设。

李锐此时流放于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不可能知悉毛、彭的谈话。但他这个梦的时间和语境，同毛、彭谈话非常相似。如此巧合，或许是历史的某种灵犀和映照罢。

马克思说：“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李锐的认知逐渐加深，与他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后的经历有关。1960年5月，他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他回忆：“同我一起劳动的老头们，无不乐意回忆伪满时期过的好日子，说当时喂牲口的东西比现在好吃得多。”“人世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饥饿了。在地里劳动，目光就搜索一切可吃的东西，偶尔翻出一个土豆，当时就生吃了，发现了漏掰的玉米，也马上生吃了，就像牲畜一样！”田家英知道李锐陷于浮肿、病馁之境后，向李富春作了反映，1961年11月终于将他调回北京。李锐死里逃生，离开兴华村

时，村中已经饿死了二三十人。非常可惜的是，回京路过沈阳，见到他的二姐李英华，将他在北大荒的日记本扣下来，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李锐目睹了大跃进所致经济滑坡，环境破坏，民生凋敝，饿殍遍地。事实证明，彭德怀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对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毛泽东压制批评，颠倒是非，错的是他。

李锐于1963年春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革”中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游街、批斗、劳动改造。1967年8月，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到磨子潭找到李锐，要他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庐山会议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李锐说毛主席周围的危险人物，不是胡、吴、田三人，而是陈伯达。李锐说明了原由，并就此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后被退回，不予转达）。陈伯达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红得发紫。缘此，三个月后，李锐被专机送往北京秦城监狱关押8年。他的上述日记，同样成了重要“罪证”。

1975年5月30日，李锐从秦城监狱释放，重回磨子潭劳动。直至1979年1月平反，复出。

漫漫20年，作为钦犯，李锐初始有过失落和怅惘。如：

1962.7.6 日记：“无业游民整整三年矣。‘往事已成空，还如在梦中。’不敢翻后主词。”

1963.12.17 日记：“鹰的翅膀折掉，变成小鸡在地上活着。我自认无个人英雄，但有浓厚的事业心。过去七年算有了点经验，但山崩地拆，摔下来了，夫复何言！”

不过，李锐并未消沉。他读了大量马、恩、列、毛和古今中外文、史、哲并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包括若干人物传记，仍学英语，用以充实、砥砺自己。他在日记中多次联想到南唐李煜：“李后主是想起‘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终‘垂泪对宫娥’，是想起‘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而‘多少泪，断脸复横颐’。这是做了俘虏的帝王才子的沉重伤痛。时代不同，人不同，伤痛的思想内容不同，然而为个人则一也。当然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属于个人的伤痛了，问题是怎样看待这种伤痛。为党作了点工作，分内之事，何足道哉。我如果修养好些，就不会有这些个人

的‘感伤’了。”“我究竟是30—60年代的人，过去的日子我并没有枉过，没有浪费，我心安如松柏，实在不应当‘往事只堪哀’的。”“每逢情绪松懈只有挺尸之时，一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不由得惭愧起来。马克思只活了65岁，是坐着死去的。他们的生命，每一分钟都交给了无产阶级，交给了全人类。”李锐策励自己：“纵观历史，横看世情，全国、全局已经好转，个人委曲，又何足挂齿！”

李锐一向钦仰同乡谭嗣同。他在1964年1月25日日记中感慨：

谭嗣同诗何其阔大、雄放、豪迈：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如将其存诗二百首全部读通，真实材料也就可得一半了。诗以言志，诗以寄情。一般说，人之感情不到不得不迸发时，是不会写诗的。一个率情之人，真诚之人，是必定诗如其人的。

所谓“真实材料也就可得一半”，指的是李锐准备写一部《谭嗣同传》，并已阅读完谭嗣同诗文全集。他把这一想法对田家英谈了，田说千万不能写，免得招来以谭嗣同自居的误会，更加被置于死地。李锐听从了好友的劝止，但内心非常苦闷——几次跃跃欲试，却又不得不搁笔。

李锐到延安后任中共青年委员会宣传科长，是轰动一时的《轻骑队》创办者之一。继而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评论编辑，许多重要文章和社论（如《开展吴满有运动》）皆出自他的手笔（已编入《窑洞杂述》一书）。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冀热辽日报》（后改为《群众日报》）社长，接下来任高岗、陈云的政治秘书，《新湖南报》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可以说，是个大笔杆子。1952年“五年计划”开始时，他不愿再搞新闻和宣传工作，于是以自己学历学工科为由，投笔从工，投入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他在一首诗中回首：“从未关心风月事，却曾八年醉于斯。”可惜，李锐只干了八年水电，便折戟沉沙。风华不再。复职虽干了三年，只是做恢复机构的工作而已。

在落寞中，李锐自嘲“无党、无家又无业；有书、有画还有闲。”他想写作而受限，于是向部领导请求，让他做一点水电方面的具体工作。他在

1963年9月23日日记中写到：

新闻广播访问新安江（正装第四台），恍如隔世。第二个五年到三个五年，我是如此度过的。我好像一个在后方医院养了几年伤的士兵，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炮声。

1964年6月9日日记述怀：

对我国天赐水力之富，古代诗人甚多歌颂。太白尤喜吟咏，如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望天门山七绝云：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则俨然一坝址也。

中午假寐不成，得四句：

我欲踏破神州山，遍寻天赐水力源。

雅鲁藏布尚未识，如今困居磨子潭。

1964年10月14日日记更为激怀：

案头摆着水电书，触发回忆，不禁提笔写出这样的小诗，几乎是一涌而出：

一见钟情，

我的知己。

我没有注意你的美丽多姿，

只是关心你是否坚贞无比。

数不完的约会，

记不清的流连，

直到钻进你的心里。

新安江你说话呀，

我怎么能忘记你。

我噙着泪写这些小诗，

是欢乐？是痛苦？

是迷恋？还是无可奈何？

只有你们知音。

呵，永不疲倦的歌手，

创造美好生活的尖兵，

我剩下的一些感情，

全都交给你们。

你们都说话呀，

讲讲我对你们的忠诚。

很想每个地方（已发电或尚未建成的）写几行，抒发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情感。最后结尾几句也一涌而出，如上。不仅是“噙着泪”，而且伤心得大恸。……想起了那些紧张的勘测日子，想起钻入新安江河床底下的隧道，想起自己承担过的风险，想起那些沸腾的生活，想起自己全身心倾

注的事业,而突然中断,今天又还住在这样一个“打补丁”的小小水电站(只有一台一万多千瓦的机组),怎能没有一点个人的哀伤?……情绪一直不能平静,外面又下着毛毛雨,不能散步,关在斗室,实有天地何其狭小之感。

苦难出诗人,沉痛出诗人,愤怒出诗人。

上列日记中的“小诗”,是李锐诗词中罕见的自由体诗,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三十功名尘与土”。经过无数噩梦和幻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李锐对毛泽东之“解铃”,已经不抱幻想。但他缅怀“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深山大壑中,视察、调查、探查水电开发那热火朝天的日子。可惜,李锐当年“重归旧业”“还我河山”的要求,不得允准,他只能空耗年华和生命。他的寂寞、孤苦和郁闷,可想而知。

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挺不过刑讯逼供,把李锐咬出来。而李锐在关押期间,同样受到种种刑罚(戴手铐,站木凳五天五夜,不准闭眼,打耳光等),但他挺住了,顶住了,决不乱咬任何一个人。1958年,田家英对李锐讲过:自己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进言三条:一、听不得批评;二、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三、不要百年之后

编 读 窗

《汉阳一中事件》的纠误

我是武汉市蔡甸区(原汉阳县)政法委退休干部。曾经参加湖北省委1985年组织的“汉阳事件”复查和此后的平反工作。所以对贵刊2011年第7期刊载的《1956年的汉阳一中事件》特别关注,立即拜读。令人遗憾的是,该文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为维护贵刊在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现重点指出该文的几处谬误。

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标题“1956年的汉阳一中事件”实为1957年,正文第一句写的就是1957年。具体发生日期应是6月12、13两日,该文误为4月和4月13日。

二是引发事件的李穗老师是在初三(4)班上课,不是文中所称的初一(4)班。如果是给“初一”学生上课,她就无必要讲升学比例了。

三是学生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升学比例”并要看文件。校长韩建勋当时正在学校准备午睡,他回答学校没有文件,学生才到教育局去,并非

有人作秘密报告。这三条进言,在庐山会议上(中央全会)被当众披露出来,全场震动。为保护田家英,李锐在回答刘少奇的追问时,说“这三条意见是我的想法,与田家英无关”,从而使田家英脱难。庐山一案平反后,黄克诚称赞:“李锐这样的硬骨头,我们党内太少了!”

我问过李锐:在获罪遭遣的20年中,你有过绝望的时候吗?他说最难熬的是秦城8年,单间关押,经常受虐待。李锐向我展示过写在《列宁文选》内用紫药水和棉花签写的诗词(1980年出版后名《龙胆紫集》),和在陈伯达档案中找到的他于庐山会议期间使用的笔记本。唏嘘之余,我说你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说要是本人早自杀了,他说那不行,自杀我是绝不干的!

真个是:“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故作铜声”!

李锐的流放日记,记录了他所遭受的苦难,也映透出他的人格、气节和自我解剖精神。可谓:“楚狂本色总依然”。■

(作者为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校长不在学校”。

四是6月13日上午,所谓学生押着县长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在扭打中县政府调来警察,扣留了几名学生;学生们向县政府院里扔砖头,几百名学生把政府大院的围墙推倒了。事实是,韩县长在政府大门外答复学生,县里无权决定升学指标,他要求学生回校上课;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调动警察扣留学生;当时的县政府根本没有围墙,不存在几百名学生把县政府大院围墙推倒的事。

五是该文说县长韩茂林向地委汇报时称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这个定性不是出自韩茂林之口。

六是中央批准为“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时间是在1986年1月,而不是本文中所述的1985年1月。

本人十分尊崇贵刊“独立、权威、真实、厚重”的品质,衷心希望贵刊永葆如此特质。

读者 李功成

远征印 缅见闻

○ 刘金海 口述 刘德玺 整理

参军

我叫刘金海,1924年生于郑州西乡。1942年中原大旱,庄稼歉收。我离乡背井,随着饥民沿陇海线去陕西逃荒。

1942年夏,我在陕西眉县街头看见路边有个招兵站,桌子边的官长问我:“小伙子,想当兵吗?”“不想!爷爷说过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旁的大兵骂道:“日本人快打进陕西了,你小子想当亡国奴呀?”招兵的官长笑了笑,让我写几个字看看。我的爷爷刘光文是光绪年的末届秀才,我自小在爷爷的私塾里读书临帖,早将毛笔字写的有模有样。当官的见我写的毛笔字漂亮,笑道:“你虽小,字挺棒的,收下了。大敌当前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了。蒋委员长讲了,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少,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是中国远征军,吃的是大米洋面,穿的是美式服装,武器是先进的英美造。你如果目不识丁,大老粗一个,我们还不要呢。”我小小年纪便在乡村戏台上看过杨家将、岳武穆杀敌报国的故事。大敌压境山河破碎,正是男儿效命疆场救国时。我立刻报名从军,成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当天就给我发了军装,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全套新的衣服呢,我又高兴又神气,穿着军装四处走动。

1941年10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盟军开始对日作战。中国政府接受史迪威(1883-1946)将军的建议,号召十万知识青年参军参战,远赴印度、缅甸抗击日军。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誓师入缅,仁安羌大捷重挫日军,拼死掩护在缅英军突出重围进入印度。中国远征军声威大震,进入印境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副总指挥罗卓英。

当官的对我们略作整训,几百名新兵就向西

南开拔了,出发那天观者云集,居民们摩肩接踵争着为我们送行。我随爷爷读过唐诗,触景生情,“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场面历历在目。

我们步行到四川广元,又乘船、车经川黔滇来到云南祥云县待命。1943年2月我们在陆良机场候机出国。登机前,对新兵进行体检,不合格的,就在脸上用油彩打个X留下来。合格者把武器留在国内,经驼峰航线飞往印度汀江。

我团3000多人分乘50架飞机两批运完。我坐的是第二批飞机。一架飞机只能乘坐百十人。那时的飞机很落后,动力很差,飞得慢,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差不多是从半山腰飞过去的。在飞机上看地下,汽车像猪那么大,在白线似的公路上走动,人就像一只鸡子那么高。飞机窗子可以打开,吃的罐头瓶子就从窗口扔出。窗子一打开,风飕地一下就冲进来,机舱里立刻冷得受不了。连长就不准再开窗子了。飞机遇到气流颠簸得非常厉害,仿佛身体要散架似的,飞抵汀江时天已经黑了。在飞机上穿着棉衣还冷得缩成一团,下机后热得汗流浹背。来到驻地,对我们进行一条龙消毒,所穿衣服全部烧掉,赤身走进长长的排房内洗澡打针。洗了6次澡,打了12支预防针,最后发给一个大帆布包,里面装有:外衣、内衣、汗衣、胶布、蚊帐、面罩、胶鞋、皮鞋、袜子、毛巾、洗澡巾、腰带、毛毯、水壶、饭包、饭碗等,样样俱全。

蓝伽军训

翌日我们乘窄轨火车(车皮之间全以铁链相连接)抵印度北部的蓝伽基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训。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政治教育。训练结束还要对几千名新兵进行最

后的考核,考核内容除了各种轻武器的掌握和战术射击外,还包括搜索、警戒、渗透、埋伏、奇袭、突围、伏击、迂回、攻坚等各种战术,考虑到可能进入丛林作战,还加入了丛林战和丛林生存等内容,考核不合格便遣送回国。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是当年的口号。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参军,为远征军(进印后改称中国驻印军)补充数万高素质的兵员,中国驻印军扩编为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我被编入新六军14师(师长龙天武)42团(团长许颖、宁伟、刘子高)卫生队做救护工作。

军训是在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指导下进行的。史迪威是个中国通,会讲生硬的中国话。开始集训时他对大家说:“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指挥。你们不要害怕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和机关枪,我们美国会有更多的飞机大炮机关枪给你们。”行军时他喜欢走在队列前,师团长们常要为了他的安全跑前跑后。打仗时他爱挥着臂呼喊:“孩子们,要顶住,日军不是刀枪不入的,一颗子弹就会要他的命。”这位四星上将时时洋溢着美国式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官兵很大鼓舞。

我们卫生队除军事训练外,还要学习医护救助、战地包扎、疾病诊治。军训时中国教官还教我们唱《中国远征军军歌》: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纆。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妾。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菜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闾里欢腾骄红颜。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训练演习中,我们有着班超平西域和樱花树下醉胡妾的梦想,很多人都认为只要自己走上战场,就能一直打到东京。传说国内一些军队存在惧敌情绪,我们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没有恐日症。入印后我们的生活很好,武器、服装、住用全是美式装备。吃的主食是上等白大米,副食是各种罐头:有牛肉的、鱼肉的、猪肉和西红柿的。还有食油、花生米、白糖、饼干,连香烟、手纸、药品都是美英供应的。

士兵们大多来自贫穷落后的中国乡村,何曾见过这么丰富的食品,不消几日我们便养得身强体壮,一个个黑油油的,似铁如钢。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二战胜利,同盟国对中国远征军提供了难以计数的物资援助。身临其境,大家深感美英强大富足,也为我们国弱民贫感到不安,报国之志更加强烈。

调防列多

艰苦的美式军训结束后,我们调防到印缅边境上的列多。列多人烟稀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后来东印度铁路不断延伸,成为铁路的终点。中国远征军的到来,让它闻名遐迩,在二战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列多隶属于印度阿萨姆邦。印度有五百多个土邦,土邦大小不一,海德拉巴德邦和英国本土差不多,人口有葡萄牙的两倍。海边的比尔巴里邦面积不过一个半平方英里,仅20多人。土王级别不等,当他们进入英属印度时,英人会为较尊贵的149位土王鸣炮欢迎,对各王的礼炮声也不一样,有21响的、19响、13响到9响的。英人对土邦行政不加干预,土王犯了法要贬爵革职。土王生活奢华,有的王宫里有电影厅,大门前站着荷戈执矛的古装卫兵。

我们奉命不许同当地人接触。这时印度人民正为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闹独立,英印当局生怕东方被压迫民族互相同情,更担心中国军队介入地方事务。为了同英军搞好关系,避免他们猜疑。我军每个班发了一个帐幕住在荒无人烟的山野里。听几个华侨兵讲,起初英国人并不希望中国

军队入缅抗日,但是日军的攻势太猛烈了,连破新、马,席卷中南半岛,长驱入缅,声言要与希特勒会师中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严重关头,中国军队因应战局开进缅印。

驻印时常见到一头头牛在街上悠然自得地走着,印度牛不怕汽车不怕人,极享尊崇。当地法律规定汽车碰死一条牛要赔主人400卢比,碰死人仅赔200卢比。圣雄甘地说:对牛的保护是婆罗门教对世界的礼拜,也是人和他的哑弟兄订立的生死盟约。

一天,一个当地人来到我们团部,嘴里叽里哇啦,手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团长就派我们两个人跟着他来到一处平缓的山坳里,在路边停下来。他要过铁锹,就刨了起来。没挖几下,就挖出一个银锭来,元宝型,有七八十斤重,一个人抱着非常吃力。我们赶紧回去报告团长,团长派出几个连,到埋银场去挖,一下挖出几汽车,运到操场上,摆满整整一操场。团长报告军部,派飞机运回国内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批银锭是日军打过来时,英军来不及运走埋起来的。

一天下午,我在小镇的街上散步,看到一个中国伤兵躺在路边,伤口已经生蛆,奄奄一息,嘴里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想必是兄弟单位丢下的重伤员。我把情况报告给班长,班长说上边没有下令,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得看着这位兄弟死在异国他乡。目睹此景我们的心都凉了半截,一旦自己受伤,也是这种下场?

缅北行军

密支那是日军盘踞的缅北重镇,伊洛瓦底江经城东向西南缓缓流去,便于航行。它是缅北铁路的终点,又是重要的水陆空枢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的援华物资经“驼峰航线”空运到我国。为了空运安全,打通中印公路,1943年10月中国远征军对缅北日军发起反攻。行军路上山高林密、谷深水险,道路崎岖泥泞,难以行走。带的水和粮食不足,我们就砍倒竹子,用军刀剖开竹筒,内有五分之一筒水可供饮用。食物靠美机空投,空投一次每人可以分到一包烟、一筒咖啡、一筒牛奶、一包冰糖、一包压缩饼干,这些是一个士兵三天的食物。有时候飞



刘德堡与远征军老兵刘金海(右)于新密市文化馆

机不来空投了,我们就要饿肚子。夜晚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就背上一块涂有闪光磷的木块,让后行者望着不至掉队。

山高林密,工兵们手持大刀在前头伐木开道,遇水架桥。一路上不时见到黑熊、猴子和狼。这天我们在河里洗澡,从树上窜下一群猴子,抓住我们的香皂就啃,香皂不好吃,又将衣服抓跑了。我们赤身裸体,同猴子展开了夺衣大战。

山险坡陡无法下坐,休息时我们只能站着,晚上睡觉更是一大难题,瞌睡难忍时就背靠大树立睡一会儿。遇到平缓地方,我们刚支好蚊帐准备睡觉,毒蝇、牛蝇会穿过蚊帐骚扰、叮咬,害得人日夜不宁。森林里的蚊子、蚂蟥更是可怕,每晚睡觉前都要在全身擦一种英国产的防蚊油才能过夜。

山林中的蚂蟥无所不在,普通蚂蟥有一英寸长,水牛蚂蟥有3英寸,而巨型蚂蟥则有半英尺长!蚂蟥分布在灌木丛和垂下的树枝上,让人防不胜防。一旦掉到人身上,它便吸附在皮肤上,甚至能穿过几层衣服钻进皮肤。一旦被蚂蟥咬伤,轻则皮肤渗血,严重者伤口发炎。

季风气候进一步增加了我们行军的困难。当

部队行进到陡峭的山脊时,士兵们手足并用才能攀登上去。上去后还要在陡坡上开凿台阶,让同样疲惫的骡马能爬上去。就是这样,骡马还是不停地滑倒,时常摔断脖子折断腿。一头骡子摔死了,驮的物资只好扔掉。山道崎岖难走,带的水和粮食都不够吃。

在行军途中,大家拖拖拉拉十分疲劳,前后拉下好远。有的人口渴难忍,等不及让消毒药片在水壶里化开,就把药片随着河水送下肚子,立刻拉稀、痢疾痛苦不堪,体弱者常常一病不起。途中我们在一个小村包围歼灭一队日军。我们闯进敌营,发现日本人住处肮脏龌龊。不久,几个弟兄开始发热、皮烂,最后被夺去生命。弟兄们传染上鼠疫了!

攻克密支那

1944年夏我42团奉命攻打密支那,我们正在艰难行进,从前方传来好消息,中国新一军攻占密支那机场,不久几架美机降落在临时机场空运全团去密支那前线。我们飞抵密支那机场时残余日军不停地向飞机射击,人刚下完,美机便匆匆飞走了。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在头顶哧哧飞叫,我吓得躺在地上不敢动,一直待到黎明。吃早饭时,机场附近的日军已经溃退,我随救护队朝前线开拔。

密支那前线枪弹如雨炮声震天,美国飞机将密城炸成一片火海。我42团3000余人正在城郊激战,时时刻刻都有伤亡,一批批伤兵被抬到救护站,我们立刻进行救护。每批伤员少者数人,多者竟达两三百人!伤兵们的战伤有的在头部、胸部,有的在腰腹部和四肢,什么部位都有。伤员们痛苦地呻吟着呼唤着,场面惨烈鲜血淋漓。我们急忙为他们救治包扎,然后由美国运输机送往后方野战医院。伤员少时,就用可降落在道路上的小型联络机运送。医院的美国医生医术高疗效好,送来的轻重伤员都能得到较好治疗,一般的四肢枪伤,两星期就可出院归队。

一些伤情过重的伤员从前线抬下来仅仅哼了两声就牺牲了。我们眼含泪水把他们安葬在缅甸的山野里。他们同我一样,当年才十八九岁呀!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抗日救国保卫世界和平,

他们洒尽鲜血,长眠在异域他乡,一些烈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一天我们俘虏两名日本伤兵,为他俩包扎后他们目光迟滞,仿佛木头人一样。早失去了耀武扬威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吃起来狼吞虎咽,像饿鬼似的。我索性为他们端来一盆饭菜,眨眼之间,他俩吃个精光。从日俘吃饭的情景来看,由于美机的轰炸封锁,日军的给养早已断绝。收复密支那后,日俘更多了,俘虏们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我们还将日军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治伤看病。战后,这批战俘和日本慰安妇被美机空运到昆明收容所改造教育,择日回国。

在美国空军配合下,经过两个多月战斗,我军以坑道战的形式,步步为营接近日军防线。战斗残酷,敌我伤亡惨重,守城的日本旅团长水上少将自杀,1000多名日本残兵乘夜抱圆木顺伊洛瓦底江漂流南逃。我军以5000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于1944年8月5日攻克密支那。

休整期间,我们驻扎在机场附近的一个村镇上待命。刚住下来,密支那的华侨就来卖东西,有的是来卫生队治病的。我们就与他们攀谈,得知华侨街上云南、江浙、湖南人较多,也有河南人。有个周姓河南人50多岁,身上长满疥疮,让我们给他治,说治好了就随我们回国。他一战时就来了这里了,年龄大了思乡情更迫。

战斗结束后,常有美英士兵们来同我们交换战利品。他们有手枪、军旗、徽章、钢笔、军刀、相机、自行车等。当他们看到我们有缴获日军的的东西时,就走过来与我们搭讪。彼此语言不通,就用手比划。如果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只要他身上有的,毫不犹豫地与我们交换。即使要他的手枪,他也会拔出来慷慨交换。难怪英美博物馆里有许多远征军的物品收藏。而我们却很不重视这种文化收藏,远征归来两手空空,无任何物证。牺牲的战友、抛洒的热血和异国的风光民俗,只有从梦中 and 记忆里追寻了。

这时许多华人华侨成伙结队,争着来看望远征军伤病员。一些儿童还将他们花儿一般的小脸、白手,伸到头上身上缠满白纱布的伤兵跟前,让兵们亲吻抚摸。华侨们竟相对中国官兵控诉日军的罪恶。日据时期,华人有苦不敢纵声痛哭,小孩不苟言笑,失去童年的天真活泼。日本人千方

百计调拨中缅人民之间的感情,唆使缅甸奸商抢占华人的房屋、商店和财产。好多华人流离失所,被逼进山林。

密城被围后,日军像疯狗一样搜刮华人残留的一点粮食和财产,几千人无家可归,集中在一些破草棚里束手待毙。我们听得戚然泪下,热血沸腾,恨不能“一夜捣碎倭奴穴,蔽天铁鸟扑东京!”

我军立即将节省下的粮米救济他们,派出官兵利用废旧铁皮和木料为华人搭棚建房。密支那解放了,华人扬眉吐气重见天日,华商开始复业,华侨街上人流涌动。他们对中国军人的感情无与伦比,时常箪食壶浆,列队迎候。在这里,华侨们将每个官兵都当成祖国的代表,他们说:“祖国强大了,华人在国外才有地位。”

回 国

1944年秋国内战场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攻陷衡阳、桂林,进逼贵阳,蒋介石匆忙把新六军空运回国,我14师42团被空运到云南沾益,以屏卫重庆。因日军从贵州退回广西,我们又被空运到湖南边城芷江,准备入湘歼敌。可是,敌我之间还没交火,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城狂欢,军民同乐。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归来夹道万民看,朵朵鲜花掷马前。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远征军歌中的豪言今日实现了,我们感动万分涕泪交流。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奉中国政府的命令从武汉飞抵湖南芷江,代表侵华日军向中方代表肖毅肃、冷欣将军递交投降书和各地日军的驻防情况。我42团负责会场防守,目睹了今井武夫毕恭毕敬向我方投降的过程。新六军的兵员年轻,服装整齐,号称军中骄子,我们奉命东进从日伪手中接管南京、上海等地。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日战争结束了,远征军将士本该铸剑为犁,回乡过上和平的生活。然而,中国上空战云密布,新六军奉命从吴淞口坐军舰前往东北,同解

放军一决雌雄。尽管我们的武器精良装备好,还是失败了。我随余部撤回关内,被编进傅作义部军官三团,1949年1月随傅部在北平起义。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将军为起义官兵每人签发五种证件,要求地方政府给予照顾。

我久战思乡,千里辗转回到郑州老家。略作停留便南下湖北,追随堂叔刘政民(时任鄂西解放区恩施区长)在恩施粮站为入川解放军筹集粮草,长期在恩施粮食局当会计。公余时间以书法为乐,书法作品被编入《世界书画名录》。■

刘金海(1924-)郑州市人,抗战时在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6军14师42团救护队工作,1949年1月随傅作义部军官三团在北平起义,解放后在湖北恩施粮食局当会计。系鄂西自治州书法家协会会员。退休后住郑州市。

刘德玺(1948-)河南省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1年第10期目录

| | | |
|--------------|---|--------------------------------------|
| 书屋讲坛 | “权位空置”现象之我见 革命家被人“革命”可笑吗? | 任蒙 五味子 |
| 人物春秋 | 筚路蓝缕——赵宝煦 蔡以忱:“铸剑”人的清官身世 黎元洪点将蔡元培的来龙去脉 遭日军杀害的戏剧家侯曜 | 肖跃华 震烁 裴高才 陈正茂 刘金祥 |
| 书林折枝 | 不同文化铸就了不同民族文化性格 记忆文学和文学的记忆(外一篇)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读彭燕郊遗著那代人 | 飞翼 万之 胡晓进 石天河 |
| 湖湘人物 域外传真 | 蒋廷黻的“中国想象”与理性诉求 混浴古风今何在 韩国“兴文化”戏谑式幽默 | 秦燕春 李兆忠 刘畅 |
| 灯下随笔 | 人文研究与电子信息技术 漫话中国的奇装异服 “批驳弹正”以建构文学史 豆制品与诗系列 浅白深红,一斗新妆 出世的“有情” | 张隆溪 颜湘君 潘德宝 毛翰 南翔 鲍国华 |
| 艺术天地 | 《人间正道是沧桑》所展示的革命 题材影视剧成功动因 “刘三姐”被言说的过程 | 米彦青 韩袁红 |
| 说长论短 | “大义灭亲”还是“亲亲互隐”? “中国味”的绘画与戏曲 张养浩的学、“也不学” 文明透视下的风雅 | 刘强 陈昌友 赵其钧 王宏任 |
| 前言后语 | 香樟与杜鹃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前言 《大学的精神尺度》自序 | 谭仲池 傅国涌 叶隽 |
| 思史佚篇 | 历史应该诚实 | 石定乐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九一三”事件 40 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

○ 被访谈者：朱永嘉 访谈者：顾训中

访谈者按：上海在“文革”10年间的军政关系究属如何？“九一三”事件前后有何变化？

朱永嘉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并一直负责写作班子的工作。

“九一三”事件 40 周年前夕，笔者访谈了“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朱永嘉，就此前后上海地区军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究。

顾：朱老师，“九一三”事件 40 周年快到了。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事件在当年上海发生的影响的回忆，以及在此前后上海军政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朱：上海的军政关系，先是与警备区的关系。因为各地都是警备区、或者是省军区进行“支左”。上海开始也是警备区执行“支左”任务的。

上海与其他地方情况不一样的是，自从 1967 年 1 月 4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来以后，上海的“文革”就直接受到中央文革的指导了。相比较而言，上海的运动就有点独立性了，在这种状况下，有些重大问题还是得到了部队的支持。譬如说，“一月夺权”时关于电台的管理，对外通讯也是需要部队来帮忙的，民航的管理也是要部队来管的。

我开始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活动的时候，军队方面的代表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是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他曾担任 20 军军长，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他与陈丕显的关系比较好，因为原来都是来自新四军和三野的部队。在战争中，他的一只手残废了，腰部受过重伤，身上还穿了一件钢丝马甲。1967 年初我和他一起参加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几次会议。他讲话不是很多。在会上我看不出他们和市革委会有什么大的矛盾和分歧。后来分

歧的产生是由于警备区内部的矛盾。因为警备区内的造反派起来了，廖政国就把这一派压下去了。

顾：这些造反派是不是警备区机关里的一部分人？

朱：是的。

顾：警备区领导中有没有同情或支持这些造反派的？

朱：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是支持这些干部起来造反的。

顾：这些造反派的目标就是对着廖司令？

朱：当然是罗！提意见么就提到负责人、一把手那里去了！副司令员张宜爱、副政委李彬山，都是同情造反派的，这样矛盾就出来了！

军队里的造反派受到压制，被看起来、管起来了。情况通过游雪涛小组（指由原上海《青年报》记者游雪涛在“文革”期间组织的一个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小组——访谈者注）反映过来了。当时小组里负责联系军队的是夏运闾，原来也是《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情况反映过来以后，中央文革方面就认为，不能这样子镇压。这样，上海市革委会就跟廖政国的关系对立起来了。上海与廖政国的对立倒不是因为上海的运动怎么样，而是因为军队造反派起来以后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态度问题，两方面发生分歧了。当然，他把陈丕显请去参加警备区的党代会，还让他坐在主席台上，多少有一点为了跟市革委会唱对台戏。其实，那时陈丕显的警备区第一政委职务并没有撤职，本来也算正常，但市革委会的人看了肯定不高兴。

顾：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朱：1967 年上半年的事情。

顾：那是市革委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

朱：是没多久！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几次会议

我都参加的,在外滩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这几次会廖政国都是来的。后来看不到他了,他不来参加了。军队有一个情况,他并不听你的。尽管你张春桥后来当了警备区第一政委,他还是听南京军区的。

这种情况下,两边的关系就搞僵了。这样,上海的“支左”虽然有警备区的干部,但是不多。

就上海的情况来讲,所有的部队“支左”干部不是靠原来军队单位的指挥,而是要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指挥。这个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实际上,上海工作的许多意见是从中央文革直接下来的。

照道理,上海成立市革委会,军队方面当头的应该是廖政国。但由于廖政国的缺席,实际上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这一点廖政国也不高兴。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展开了。

游雪涛小组还从军队内部反映了很多情况。后来这被张春桥中止了。张认为,我们去摸军队情况不好。张把游雪涛在军队中的活动停了下来,缓解了我们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关系。

这样,军队的“支左”就不找警备区了,去找空四军了。

顾:这是市革委会主动去找空四军来参加“支左”?

朱:是这样的。所以,那时上海市革委会的警卫都是空四军派的,复旦大学的“支左”是空四军派的,《文汇报》的“支左”也是空四军派的。许多要害部门的“支左”都是空四军派人来的。

顾:这样,市革委会与空四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朱:更加密切了。而警备区、廖政国退出了,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一直到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王维国才参加市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相当于过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样一个级别。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访谈者注)也给他办公室了。

所以后来“公革会”(指市公安局内部造反派组织“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访谈者注)的接管都是靠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分工主管上海政法部门。

到空四军来接管以后,公安系统这个事情就归王维国管了,把原来在公安局夺权的造反派都

镇压下去了。造反派找我,我已经不可能再向张春桥、向王维国报告了。这个时候,市革委会已经明确由王维国主管政法系统工作了。他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代表军队的还有警备区副司令张直爱,负责农口,副政委李彬山,负责民兵。

原来警备区机关中那些造反的干部在警备区站不住了,就出来了,由市革委会接纳了,参加“支左”。所以,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参加“支左”的警备区的人,都是军队的造反派,实际上都是给廖政国赶出来的人。包括在铁路系统“支左”的警备区的人,也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跟铁路系统造反派谢鹏飞、万景荣这批人的关系很好。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警备区本身倒脱身了,不管上海的事情了。相反,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双方的矛盾很尖锐。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访谈者注)到上海来,廖政国是告状的。当然,许世友是帮廖政国的,跟张春桥谈不到一起去。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许世友不是在大别山吗?不是毛派张春桥去请他出来的吗?外面传说,张春桥到了合肥以后,派直升机去接许。实际上是张亲自坐着直升机去接许世友的,这点人家都不讲。接的时候,张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政委来接司令员噢!后来毛对军队干部讲话时说,政委接司令员,党史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我,一次是张春桥!

许世友到上海以后,杨成武、张春桥一起陪许去见毛。到了毛那里,杨、张退了出来,让毛与许直接谈话。许世友跪在毛面前,毛扶他起来,做他思想工作,安抚他,讲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最后许世友出来时很高兴,对杨成武、张春桥说,我到大别山去打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后来外面传说,打一只兔子送给张春桥,打一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完全没有这回事。

张春桥拿了这只豹子,剥了皮,豹子肉请警备区的人来吃了,皮还做了个东西放在家里。到“四人帮”倒台以后,警备区的人来抄他的家,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是从他的孩子那里知道这个情况的。

所以从当时的情况看,上海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关系处理不好,包括上海与许世友的关系也受

到影响,是这样一个过程。

顾:我插一句:当时部队“支左”大体是怎么分工的?刚才说了,警备区负责农口、民兵、交通,空四军负责政法、宣传……

朱:空四军管的还有大专院校、民航。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与空四军的关系就不好了。

顾:也就是说,此前你们与空四军维持了这么一种相安无事的格局,而与警备区摩擦多一些,因为你们用的都是人家造反派的人。

朱: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阵线就很鲜明了。因为王维国在会上的表现,都听林彪他们的话。不光是王维国,上海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人,包括杨富珍(原上海纺织行业劳动模范,“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访谈者注)跟着他们了,陈敢峰(学生造反派、时为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负责人——访谈者注)也跟着他们了。这就说明,张春桥系统、空四军系统在市革委会内部也有了分化。

这以后,王维国就不来管事了。

顾:我想问一下,当时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在他们参加会议回来以后,你有没有听说一些情况?

朱: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包括跟徐景贤聊天,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们多多少少还是透露一点情况给我。心里大体有数,但细节不是很清楚、很具体。

我那时在复旦工作,复旦负责“支左”的是空四军的方耀华,我跟他们关系还可以,我还得靠他们工作呀!

我管复旦的事情是1969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呢?作为写作组,你要搞各种各样调查研究,你要翻阅许多书,你不能不依靠高校文理科教师的队伍啊。有的时候毛要我们一些西方的、古典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天体怎么运行,这类书好多,不是一本两本。那就把理科的老师包括苏步青、谷超豪这些老专家都请出来了。

顾:那时你在复旦有什么具体职务吗?

朱:没有什么职务。正因为没有职务,我这样一抓以后,他们就告状了,说是我在中间插了一杠子。他们告到市革委会文教组去了,文教组反映到徐景贤那里了,徐景贤就反映到了张春桥那

里了,说我“手伸得太长了”。张是这么说的:他“手伸得长”,无非是想做事情,也没有别的。那就让他去兼个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在复旦有了个正式职务。

顾: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朱:大概是1970年的事。

后来姓杨的那位走了以后,是徐海涛做了文教组负责人。徐是警备师政委,他也是支持造反派的。

顾:就是他1967年1月底带着警备师的部队到复旦大学去救徐景贤的?(指该年1月底,以复旦大学学生造反组织“红革会”为主发起“炮打张春桥”,绑架了徐景贤。警备师按张指示派兵去复旦大学援救——访谈者注)

朱:就是他!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他在文教组当家的时候,我在复旦的工作就好做了,什么事情找他就一口下去了。后来他不具体管那个事情了,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空四军在市革委会慢慢地退出了,王维国不到市革委会来管了。但空四军在下面单位的“支左”人员还没有动。那样,就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调来了,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市革委会,担任了副主任。从此,军队方面就由他负责了。周纯麟也是四方面军的,打过不少仗。他原来是南京军区的炮兵司令。他与廖政国对调,廖去南京军区任炮兵司令,周纯麟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

所以,军队干部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有个调整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来的,但是因为造反派的原因,关系搞得不好;后来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最后又是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来。

顾:这么说吧,具体到下面单位里与“支左”人员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上面。

朱: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大家一起要把工作做好。譬如说,画历史地图的工作,那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务啊!我想把这项工作做好,他们也认为,能够帮助把这个工作做好也是很光荣的事情。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也是有分歧。譬如说,中央开教育革命座谈会,我们上海也去了很多人。去开会的时候我给他们定了个调子:17年是“黑线专政”。这是我当时定的调子。上海去

的人是根据我的这个调子讲的。但是空四军去的人不一样,他们根据林立果那个系统,定了另外一个调子,说是“红线专政”。这样一些大的认识方针上的差异也还是有的。他说他的,我们也不反对他,我说我的。谁是谁非,最后由中央来定。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吵架可以吵得下来的。这点上我们大家还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我们,我们也尊重他们。

在基层里面,大家并不是你想整我,我想整你,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是这样一种状况。矛盾主要在上层,不是在我们这里。

“九一三”事件以后要进行清查了,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顾:你曾经提到《文汇报》文章与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后来清查时牵扯出来的事情吧?

朱:都是开始清查之后发现的,当时并没有认为是什么事。

1971年1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文章大样送到兴国路市委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时,张认为有问题,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吴××。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由写作组文艺组的高义龙执笔,具体是徐景贤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让《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这个过程在我们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然而,吴××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促使林立果加速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1972年1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有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有来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据此,林立果加紧谋

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现在来看这两篇文章,都是空话套话,也没有什么政治针对性。当时来看,也只是一般的理论文章,并没有指着对方鼻子骂的话,一句也没有。而且对象也搞错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吴××这个人实在是做了件事,造成这么大的后果,谁也没有想到过。

顾:当时你是在什么场合比较正式地听到了“九一三”这件事情的?

朱:好像就在“九一三”不久,徐景贤传达的。是在锦江小礼堂,市革委会范围里传达的。我有印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看到后很吃惊的。

顾: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朱:当时觉得林彪为什么要这么做?想不通!怎么会走这么一条死路?这个人怎么会脑筋搭错啦?非常不正常么!没有必要这样做么!你作检讨就是了么!

印象深刻的还有毛讲的那句话:江青来得晚了,毛说了句“王者无私也”。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翻书去了,一看是这样的意思,懂了毛与江的关系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两个人住在一块儿,毛讲了什么,江就出来传达了。现在江是政治局委员了,是公对公了。

顾:这话是“九一三”事件传达时说的吗?

朱:当时把政治局会议怎么讨论的内容都传达给我们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内容?因为有张姚的关系。把一些政治局讨论的细节都传达了,包括毛拍手鼓掌,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后来喝茅台酒,大家很高兴,这些细节都知道了。

顾:上海这边应该说是属于中央文革这一派的,当时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兴高采烈的“好”的感觉?

朱:没有感觉什么“好事”,这是倒霉事啊!整个“文革”都受到很大伤害啦!毕竟是“林副主席”啊,不是别的人啊。

顾:是不是可以说,到了上海这个层面,并没有两个司令部、两个对立路线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朱:这个感觉有:好危险!脑袋掉了也不知道!他们那么狠!这种想法是有的。但是你说的,什么胜利啊的感觉是没有的。什么胜利?是灾难。我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在清查过程中,我对复旦“支左”部队的方耀华他们就没有说过一句坏话,能够留的人我都留呀。我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两个营垒,非要弄个你死我活的样子。

当时我脑子里想到的问题,这事情总不太好办吧?不是件很光彩的事情。

顾:听到毛高兴得拍手、周提议喝茅台酒这样的细节,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朱:感觉林彪这件事情是了了,但将来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九一三”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就是空四军的干部慢慢地退出去了。

顾:这就要讲到清查的问题了。对他们是先进行清查、还是退到部队以后再进行清查的?

朱:像复旦的“支左”人员是退回部队去清查,我们不管的。整个上海的清查运动是王洪文管的,具体的清查工作是戴立清(原是王洪文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后成为上海市革委会重要成员——访谈者注)在抓的。

王洪文管清查工作以后,与许世友系统的矛盾也很尖锐。空四军的干部与林的关系很密切,按照毛的政策,清查的同时,在处理时需要慎重。因为“九一三”事件又牵涉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时,那些大军区司令当时都写信向林表态,包括韩先楚啊、许世友啊、杨得志啊……还有四员大将(指当时参与军委办事组领导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访谈者注)以下的许多干部,空五军陈励耘、空四军王维国他们下面都还有很多人,怎么看待呢?他们都是革命过来的。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应该正确对待,不要揪住那些历史问题不放。他们打过仗,有经验,若要打起仗来,我们还应该用他。他们还能立功劳。关键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他。

许世友当时在处理空四军干部问题的时候,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赶光,另外自己派人。那就在这个问题上跟王洪文发生矛盾了。王洪文认为不能这样干。张春桥倒是态度比较鲜明的。他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事情呀。

顾: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王洪文处理时是采用了怎么一个办法呢?

朱:他主张原来的班子不能大动,能够保留

尽量保留,因为它有个工作连续的关系。人都换了,就会发生工作无法连续的问题。包括在杭州处理空五军的问题,他和许世友也有矛盾。那个时候,毛主席要王洪文在上海处理空四军的问题,到浙江去处理空五军的问题。这两个军都是与小舰队密切相关的重点区域。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面,许世友是一刀切,统统下去。王主张大部分保留,不要再派人了。

顾:这已经不只是处理参加“支左”的部队人员了,而是部队领导班子的处理问题了。

朱:实际上,这也是许跟张发生分歧的继续。王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秉承张的意图办事。

毛泽东几次想唱“将相和”,始终唱不起来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两个人的传统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思考问题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手段都不一样。这样一来,你要完全合在一块儿,相当难。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张春桥不想“唱”,他很想“唱”。许世友也不是不想“唱”,他也很想“唱”。他打个豹子送给张春桥就是想“唱”。他们一起喝茅台酒也是想“唱”。但是,许世友喜欢的那一套东西不一定张春桥喜欢呀。许喜欢喝酒,张不喜欢喝酒。许送了一箱酒给张,张叫秘书何秀文退回去。何秀文就作难了,只能放在角落里,张看不到就算了。

还有一个差异,部队领导干部看不起文人:你们无非摇摇笔杆子,没有上过战场,没有拼过性命。我们是生死场上过来的人,大家都是同生死、共命运的人。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同张春桥那种只讲工作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和油很难交融。不是不想做,大家都想做。后来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毛泽东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也慌呀!

顾:许对毛的批评不能不听。

朱:是呀。所以,听说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上海轻工业局的头头马振龙正在找对象,他赶忙派夫人田普到上海来说,我有两个女儿,嫁给马振龙好不好?让他挑一个。这就是军队干部,表现得那么直!他对毛要求的“将相和”没有什么招数,把这种事也拿出来了。

顾: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朱:是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以后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他已经调到广州去了,跟上海距离那

么远了,也还是想改善关系,不是不想改善。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嘲笑他,而是分析他的性格。他不是从思想、观念上想办法沟通,而是用这种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态度:我态度算得上是好的了吗?你还要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已经表示到这个态度了!

顾:是啊。

朱:当时马振龙也感觉不是个味道了。因为那时马振龙已找到对象了。

顾:那么,王洪文和许世友在清查中的分歧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是王知常(时为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访谈者注)告诉我的。我没有参加清查工作。这一工作从头到底我都没有参加。我做的工作不是这个内容。王知常是跟着王洪文一起到杭州去的。军队干部之间那一套拉拉扯扯的关系王知常看不惯,不愿意参与。军队干部的出身、经历自然而然形成了那套东西,外面的人是加入不进去的。他们大多是从底层社会奋斗出来的,自然而然有着底层社会的人的那种习性,一下子改不了的。林立果正是利用这种观念,能在空军系统搞一套他的东西。

顾: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按许的思路做、还是按王的思路做?

朱:当然是按许世友的思路做了,因为是许在南京军区当家的呀。

顾:那不是毛亲自派王洪文去处理的吗?

朱:是啊。但那时的清查工作都是南京军区在主管,空军司令部门已经靠边了,上面管不了了。在这个状况下,许世友就把他们的人往里面插。王、许两个人有矛盾,可以一起喝老酒、一起出去打猎,但是涉及人事问题,对不起,许世友寸步不让。王洪文最后也没有办法想,毕竟南京军区是许世友在管,你不能动他啊。

“文革”初期,毛要张春桥去南京保一下许世友,做一下南京两派“好派”、“P派”的工作,要他们联合,他去了,也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许世友并不买账。他的想法是:我要你们来保啊!

顾:最后我还想问一下,“九一三”事件以后,在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代表军队出任市革委会副主任之后,上海的军政关系有什么变化?

朱:周纯麟是在1970年5月来上海警备区

工作的,真正参与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那是在6、7月了,6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2月,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他来的目的是改善上海地区军政关系。不久,王维国因林彪问题与市革委会疏远了,他就顶上了这个位置,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市里的工作。

从我与周纯麟相处过程看,他是想改善警备区与上海市革委会的关系。他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市革委会的许多会议他都参加。有一段时间,上海市委书记们每天上午都有政治学习活动,他都来参加。那时,我辅导他们读马列经典著作,读毛泽东要我们标点的古文。休息的时候,他与我闲聊,讲他参加长征的故事。他曾经是陈昌浩的警卫员。他介绍说,红军到一个城市,陈昌浩第一件事便是找当地报纸看,了解当地和全国的形势。给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尽可能多而且是最新的报纸看。每份报纸陈昌浩都看得很仔细。周纯麟为人非常平易近人。他要我们编的党史教材也送给他们看,我就送给他了,他给我们讲四方面军的故事。有一次,周纯麟住华东医院,肾脏有一个囊肿,开刀拿了。我去看望他,送他给毛主席标点的古文,他可高兴了。所以,在他担任警备区司令员期间,上海地区军政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当时,市革委会的警卫部队又换成是警备区的人了。

抓了“四人帮”以后,这些警卫人员又成为监管我们的人。我从日本回国,被隔离审查时,就被关在警备团在大场的营部。

所以说,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不能改变上级部门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拿我个人来说,只能是听天由命。■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 赵英秀

闪光的一页

包惠僧,原名道亨,并用过包晦生、包一字、包一德、亦愚等笔名和化名,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1917年,这个23岁的热血青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便去教书,半年后转至武汉做新闻记者,专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供稿。之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他热情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同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旋即重返武汉,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包惠僧(1894—1979)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谓之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抵沪,准备赴苏联考察学习。但此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执意让他留沪工作,特请包惠僧就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职,专事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事务。同年4月,他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先进青年,由上海乘船赴海参崴,再转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留学。

1921年5月,包惠僧到广州,与陈独秀开展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系列活动,并努力从事《新青年》杂志和《群众》社的工作,迅速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影响。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

海召开。包惠僧作为13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会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推选当时身在广州的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会上,包惠僧发言活泼踊跃。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返归武汉,依然负责湖北共产党的工作,毛泽东回到长沙,担任湖南共产党的领导。两人为了党务常有书信来往。1922年春,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的办公室,毛、包住一起十余日,朝夕相处融洽得很。

脱离了共产党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惠僧照此办理,并到黄埔军官学校就职。

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统管,其间廖仲恺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要求周恩来回黄埔。蒋复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不得撤回,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如是,主任由一变二,即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6月,军校留校学生被派参加粉碎“杨刘叛乱”,此乱平定后,军校学生全部返校复课,周恩来调任党军第一师党代表。这样,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悉由包惠僧负责。时年包惠僧31岁。

包惠僧可谓官运亨通,先后任黄埔军校高级

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至1927年1月，包惠僧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5月，“夏斗寅叛变”紧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包惠僧返回湖北黄冈老家避难，继而转赴江苏高邮，又隐匿上海等处。翌年（1928）便脱离了共产党。

为了糊口，包惠僧在上海投奔到贺耀组门下，助其筹办《现代中国》杂志，继而又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部下任参议。1931年，他借助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旧关系，出任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遂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并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蒋介石对包惠僧“用而见疑”。包惠僧在国民党军内官阶为中将，但只是虚挂招牌，并无实权，充其量不过是个幕僚的角色而已。

蛰居澳门意难平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下来，转任文官，先后任内政部参事及内政部户政司司长等职。1947年，又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人口局乃清水衙门，无油可揩，无权可施，只靠每月官饷混日子。包惠僧对中国人口无研究，政绩平平。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立马写了申请，请求离职。包惠僧携带家眷逃至澳门，栖居柯高路88号二楼，静观国内政局之变。有时心情郁闷，空虚无聊，便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坊里走一圈，玩两铺。

1949年10月，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开国大典的盛况及毛泽东庄严宣告的声音，从报纸上睹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巨幅照片，触动了包惠僧的神经，他百感交集，激动难抑，真可谓“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他回忆的思绪，从中共一大开始，一幕一幕，直到目前。

他提笔于10月初为周恩来总理拟了一封电

报，并发到北京，电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

兄等以20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弟包惠僧叩

栖梧老人与焚信稿

包惠僧于1949年10月给“恩来兄”发了电报之后，翌月，全家悄悄地离开澳门，来到北京。

包惠僧回到大陆后，被安排到内务部做参事工作，后又任国务院参事，但他最主要的课题却是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是因为在他的生平史上，不仅当过记者，而且参与了中共的筹建工作，又出席过中共一大，对于1927年7月之前，中共上层的一些重要活动，他耳熟能详。

在北京，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吃饭话旧，并鼓励他为新中国多做一些事情，但包惠僧自卑心理太盛，谨小慎微，甚至不敢提笔写作，直到1957年，他才以“栖梧老人”的笔名，在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革命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对他进行批斗。自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惊恐之余，连夜将珍藏了40多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亲笔信100余封塞进火炉中焚毁，这批重要的历史资料，顷刻间化为灰烬。

自1920年始，包惠僧与陈独秀书信来往不断，40年来，包惠僧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罹经风雨沧桑，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并精心装裱，作为传世之宝，万未逆料在“文革”之初即毁于一旦。陈独秀墨宝，留存不多，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1979年，包惠僧走完了他85岁的人生路程，离开了人世。■

（作者是山东省广饶县政协文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南怀瑾：海峡两岸的信使

○ 周瑞金

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人们非常关心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事。作为国学大师、密宗高人，介绍南怀瑾先生的文章已经俯拾皆是，人已尽知。这次从大陆与台湾两岸合作信使的角度，写一写南先生心忧天下的高士情怀，人们一定会倍感兴趣。

自2005年4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和平之旅”，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国共两党领袖睽违60年的首次握手，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开创了两岸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来之不易。在两岸关系起起伏伏之中，1982年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廖承志以个人名义给台湾蒋经国先生写了一封以情感人的公开信，倡议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早看到这封信，并向国民党当局报告的，正是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忧国忧民的南怀瑾先生。在他建议之下，一个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由宋美龄出面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给廖承志作训诲式的答复。虽然两信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然而开了国共两党隔海对峙30余年后文字对话的先河。到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又开始了秘密接触，担任密使穿梭两岸的是蒋经国的前机要秘书沈诚。

1987年由杨尚昆主席出面致函蒋经国先生，经沈诚秘密转呈，邀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作为回应，蒋经国先生宣布废除台澎“戒严令”，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然而，就在两党谈判有望开启的重要关头，蒋经国于1988年1月溘然病逝，痛失了和平统一契机，令人扼腕。

李登辉接过蒋经国权力后，沈诚被台“高检”以“涉嫌叛乱”罪名起诉，后虽被判无罪，却从此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这时，大陆选定蜚声海峡两岸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为居中牵线人，在香港开辟新的两岸秘密沟通管道。



南怀瑾(1918年—)

南怀瑾先生一生行踪奇特，常情莫测。抗战时投笔从戎，跃马西南，旋返成都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后与校长蒋介石政见不合，遂离军校遁迹峨眉山闭关学佛，遍读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后又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黄、红、花各教派上师印证，成为密宗上师。1949年初抵台湾，设帐收徒，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并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门生遍海岛，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台湾高层上将、中将、秘书长、主任，以及李登辉的儿子、儿媳和后来成为密使的苏志诚三人，都成了“南门弟子”，可谓“冠盖辐辏，将星闪耀”。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先生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先生不得已“避迹出乡”。

邦”，离开了生活 36 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 3 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1988 年秋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六天，南先生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贾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主任与南先生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他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先生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唯一合适的国共合作信使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从 199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先生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先生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但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即后任台“国安部”部长许永跃的父亲）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分量，增

进会谈效果，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 1992 年 6 月 16 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 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 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 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而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先生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曾庆红也介入会谈。1992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 年 4 月 27 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 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江主席举荐南怀瑾先生，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先生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江主席参阅。同时，汪道涵又代表江主席邀请南先生回大陆，与江主席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由于南怀瑾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

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江主席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直拖到两个多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道涵先生见面。并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同时,南先生也对大陆当局对台实行“文攻武吓”政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就在两岸关系渡过危机、处于微妙阶段的时候,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先生应邀率领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度聚首,并同江主席进行坦率交谈,最后达成汪道涵应邀访问台湾等四项共识,使两岸关系春意初现。

恰在1998年10月下旬,我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将率领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汪道涵先生得知此事,殷殷嘱咐我专程去拜会辜振甫先生,代他致意,并了解台湾政界对刚达成的汪辜会晤“四点共识”的反应。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拜访了辜老先生。他在台北台泥大厦自己办公室亲切会晤代表团,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无拘束的交谈。一开头他就谈大陆之行与汪先生会晤的感想。他说:“我有五十五年未到北京,五十三年未到上海,再到大陆我有惊世之感,和以前的情况不能比。大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景象,令我印象深刻。这次与汪老会晤是在两岸关系的冰冻很久后举行的,显示了两岸以协商代替对立时代的来临。我看,两岸只要多接触,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来的。”辜老谈起自己在台湾“立法院”报告大陆行时,有三位立法委员高兴得唱京戏,还有人献花,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说“行政院长”萧万长急于了解大陆情况,特请辜老共进晚餐,台湾政界大都正面看待“四点共识”。各方都将做出规划,推动两岸关系。

我们代表团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因汪道涵先生事先交代我到香港应去拜见南怀瑾先生,听取他对“汪辜会晤”的反应。这是我第一次去南先生香港寓所拜访神交已久的南先生。当时他81岁高龄,精神矍铄,称我为“南书房行走”来了。一语双关,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

的副总编,又戏称今天我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当我代汪先生向他致意,并问起他对“汪辜会晤”的看法时,南先生心直口快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汪辜’闽南话是‘黑锅’,某人在台湾名声不好。而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我一回到上海,汪先生马上会见我,听我汇报台湾之行。他特别关注南怀瑾先生的反应,我当时隐讳“黑锅”之说,只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访台机会渺茫,李登辉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想不到,南先生对我说的话,竟成讖语。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致使汪先生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此后,汪辜两老,对隔海峡,咫尺天涯,无缘再见,抱憾终身。

所幸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见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修炼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仙逝,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副:

海上鸿飞留爪印

域中寒尽望春宵

表达了对国共合作信使同僚的哀悼之情。南先生的弟子当时在场,问老师这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南先生说汪道涵走了,汪辜会谈也画了句号,希望两岸关系的寒冰期早日结束,开启新的时代。

六年过去了,可以告慰汪道涵先生在天之灵的是,台海两岸关系协同破冰,三通恢复了,对话顺畅了,宝岛自由行的大门打开了,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扩大了。如今已94高龄的南怀瑾先生,在大陆创办的太湖大学堂,在推动和促进两岸关系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南怀瑾先生六年前所期望的“春宵”已经悄然到来。

2011年7月20日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继)

长征中几个细节的考辨

• 夏宇立

红军长征,其中的许多细节璀璨照人,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然而,笔者作为红军长征的研究者,也对流传中的某些细节存有疑虑,这里选取其中的几个,略作考辨,以就正于读者。

一份电报

这里有一份长征中的电报,许多著作或作品都会提到它,表明它影响巨大。电报全文如下:“才芳: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8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电报的发电者:朱德、张国焘。收电者: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这则电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没有收,笔者也没有见到它的原件。但是,从目前所公布的文字看,一眼便知,这是一份残缺的电文。至于如何致残,何时致残,以及如何刚好残至眼前这种状态,则不得而知。

它残在何处?其一,从序号看,有“甲”无“乙”,更无其他。其二,从内容看,电文上半截关于“九十一师两团”之事是清楚的,而下半截则明显地词不达意、难成其句,使人莫名其妙。

论说,存在这样严重的硬伤,很难体现原电文的真实面貌,必然造成它的价值亏损和折扣,引用时必须慎重,因为,或许电文的真实含义刚好体现在缺失的部分里。然而,恰恰相反,它却得到了几乎所有有关史书的特别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说:“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著:《中国人民

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9月8日,张国焘还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

《毛泽东年谱》中说:“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说:“同日……张国焘还命令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页)

这一解读,令人质疑。

第一,将那不知言为何物的“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等语,直接定性为“要他们转令”、“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部队”等;将“如其听则将其扣留”改为“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种对残缺的电文随意改动和添加关键文字的作法,难免有猜测臆想之嫌,如此情况下的“解读”,能否反映电文的真实内容含义,令人怀疑。

第二,发电者明明是“朱、张”(朱德、张国焘)两人,却居然都无一例外地隐去了朱德,而变成了张国焘一个人了。事实上,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能根本否定朱德在此电报上的签字。笔者在查阅朱、张两人一起期间所发电报发现,朱德与张国焘在出现原则分歧时,张国焘所发电报,朱德

没有签字。而这份电报里却清楚明白地存在“朱”字,表明朱德签了字。如果此电文内容真如所解读的“扣留军委纵队”如此恶劣之事,朱德竟签了字,则不可思议,因而,恐怕不能排除电文的真正含义,刚好隐蔽在残缺的部分里。而这些“解读”,对发电者使用随意取舍的手法,则显得极不严肃。

第三,即使上面两项问题全部排除,只要联系历史事实,仍然会显示出此一“解读”,于情理不通,于事实不符。

此时,发电者朱德、张国焘在西面阿坝地区,收电者詹才芳在南面的马尔康地区,蔡树藩和军委纵队在东北面的巴西、班佑地区。其中,“朱、张”离东北的蔡树藩和东南的詹才芳各约五六百里距离,而南面的詹才芳距离北面的蔡树藩九百余里。

当时,身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的詹才芳正在指挥第九十一师等部面对着理番(今理县)方向防御,“朱、张”电文的上部分,命令詹才芳指挥第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并负责修复沿途桥梁,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下面的事,可就令人费解了。

詹才芳在左路军,处于红军队伍的最南面,也就是最后面。蔡树藩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在毛儿盖分编左右路军时,军委纵队,或称中央纵队,编入右路军,直属中共中央指挥,并且已经在8月27日左右,也就是此电10多天前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也就是说,到了红军队伍的最北面,也就是最前面,仍然和中共中央机关在一起。“朱、张”为分编左右路军的主持者,而蔡树藩等率领的军委纵队属于高级别的大单位,其归属和去向“朱、张”并非不知道。要“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朱、张”为何不自己去“飞令”却要詹才芳去“飞令”呢?詹才芳当时虽为红军的一位军政委,但是他与蔡树藩互不隶属,詹才芳怎么去“飞令”?此时,詹才芳在南,蔡树藩在北,相距九百余里,中间是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还有大雪山和若尔盖大草地相隔,“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又如何去“扣留”?况且,当时前面的蔡树藩及其军委纵队的活动范围和驻地方位,后面的詹才芳一无所知。如果真的是要詹才芳“转令”蔡树藩,那詹才芳总得有行动吧?詹才芳“转令”蔡树藩的电报

又在哪里呢?并且,“朱、张”电文里面清楚明白地要求詹才芳“电复处置”,可是,却不见詹才芳的有关“电复处置”方面的电报,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所谓“转令”和“电复处置”方面的证据。

再说,如果“朱、张”真的是企图“飞令”蔡树藩,并且实行“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那他们怎么不直接致电就在蔡树藩及其军委纵队身边的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或者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又或者红四军、红三十军政委,却偏偏致电一个距离蔡树藩最远的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按照这一“解读”,怎么看都缺乏常理,违背历史事实。

一段回忆

《彭德怀自述》里,有一段文字说道:“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军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漆黑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201页)

这一段回忆,被反复引用和传诵。黄超见彭德怀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出自上面《彭德怀自述》,另一个出自《彭德怀年谱》。

《自述》版说故事发生在亦念,而《年谱》版,故事则发生在达维。地点不一样,时间自然也不一样。因为它必须根据彭德怀在这两个地方的时间来确定。

首先看《自述》版。令笔者质疑的首先是黄超的谈话内容。其中,第一,黄超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这是谈的红军目前的战略方针之事,意思是说红军应该先南下。笔者认为,此时(在亦念之时),黄超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此时红军中所有人员,自然包括张国焘和黄超,都是在致力于北上进行松潘战役,部队都在积极推进中,在此时散布南下论调,无异于阵前倒戈,性质严重至极。如果说在这之前的两河口时,当时战略方针正在商讨中,不论张国焘还是黄超说这种话或许有可能,在这之后,在左路军葛曲河遇涨水后,或许也有可能。但是,在亦念时,却是绝不可能的。第二,黄超说什么“西北马家军骑兵如何厉害”,这也不可能。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打的就是马鸿逵的第三十五师,全歼敌一个整团,红四方面军并不怕马家军。四方面军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黄超长期做政治工作,鼓动工作,恐怕他不会如此胆怯吧?

由于《彭德怀自述》产生的特殊背景,当时作者失去人身自由,也没有一些文献资料可供借鉴参考,加上时间久远,事情又较为复杂,单凭个人记忆肯定难以做到准确,因而错误在所难免,比如,《自述》在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西路军的回忆中,就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其中包括与作者自己当年亲自签署的电文内容截然相反。再比如,就在上文中,他回答黄超说,与张国焘“没见过面”,显然是记错了,彭德怀和张国焘都参加了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应该说,两人见过面。并且,时间离到亦念之时,也才过去半个月,怎么就会忘了呢?对于《自述》中出现的错漏之处,读者自不应苛求,笔者也能理解。但是,错误之处又是客观存在的,采用时不能不慎重对待。

大概《年谱》的作者,对《自述》里上面的那一段话也感觉存在瑕疵,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把彭德怀与黄超会面的地点生硬地做了改动。殊不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却使窟窿越补越大。

《年谱》这样说:“6月中下旬在达维接待张国焘秘书黄超来访,对这位不速之客十分警惕。”(《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地点改了,时间自然也得改。但是,问题复杂在哪里呢?在黄超那里。黄超可不能跟你跑到达

维呀!只要稍微追踪一下黄超,就会明白《年谱》说的靠不住。

达维在南面,大雪山夹金山的北下坡不远,属懋功县(今名小金)。亦念在北面,黑水县的东南。两地相距用现在的公路里程计算400多公里。彭德怀到达达维的时间在6月20日左右,到达亦念和在亦念附近活动的时间是7月上旬至下旬。

张国焘为了与中共中央相会,于6月20日从茂县出发,作为中共西北军委秘书长的黄超随行。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25日到达两河口。黄超随张国焘到达两河口时,彭德怀早已离开了达维,并也北进到达了达维(达维在两河口南约100公里处),第二天(26日),与张国焘一起参加了两河口会议。会后,彭德怀开拔继续北进。而黄超则一直随张国焘到29日才离开两河口启程返回茂县。所以,这个期间,黄超是绝不可能与彭德怀都南下跑回达维见面的。

那么,会不会是彭德怀在达维时,黄超去同他见面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彭德怀在达维时,黄超正在茂县准备随张国焘出发。茂县距离达维用现在的公路里程计算是400多公里,这段路途中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还有好几座大雪山。黄超就是再焦急地盼望去会面,大自然也不允许呀,不知《年谱》的作者考虑到这一点没有。

黄超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和任何一位革命者一样,黄超可能犯过某些错误。但是,黄超又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红西路军失败后,他与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因西路军问题说了真话,遭秘密错杀(199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发文追认黄超和李特为革命烈士)。彭德怀在《自述》中,认为黄超是“年不满三十”的青年,一个“秘书”而已。《年谱》的作者也这样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黄超不是张国焘的秘书,也不是“说客”,黄超早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他与陈昌浩、博古同年。他是知识分子,很早就投身革命,党龄也比彭德怀长。1931年他由中共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后即任中共鄂豫皖军委政治部秘书长,后在川陕苏区任省政府秘书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准备实施川陕甘计划,这时,调任中共西北军委秘书长,先后参与策划这一战略计划和

后来的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的一系列战略计划的具体实施工作。后任红五军政治委员,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与军长董振堂并肩战斗,共度艰危。1936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和李先念左支队一道,越祁连,穿大漠,九死一生,进入新疆,直至被错杀。黄超作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能力和业绩究竟如何?只要看一看他在川陕苏区任政府秘书长就明白。川陕苏区作为战略大苏区,面积和中央苏区几乎相等,人口六七百万,是中央苏区250万总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任秘书长时,川陕苏区政府主席为刚刚挑选出来的当地抬滑竿的雇农熊国炳,其从政经历起步为零,正如徐向前所说,“实际上是黄超在主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作”。黄超既实质主持工作,又对熊国炳等人热情“传帮带”。川陕苏区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其章法严整,井井有条,其经济财政金融工作,堪称各个苏区的典范。没有出众的才能、本领和经验,是不行的。

黄超为富家子弟,学生出身,彭德怀为贫家子弟,行伍出身,他们都投身革命,献身于党的事业。与彭德怀一样,作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黄超也是立过大功的,同时,也与彭德怀一样,蒙冤而终,出现了悲剧性结局。因而,他与彭德怀殊途同归,同属悲剧性人物。彭德怀写这段文字时,正身陷囹圄,而黄超则沉冤已久,正魂游大漠。然而,无论如何,黄超的短暂人生经历,却正是追求革命、忠诚于党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

对于所谓黄超送银洋给彭德怀,并被认为“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之说法,原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就很不以为然。他曾拿着《彭德怀自述》对笔者说,他不知道黄超送没送银洋,也不知道黄超到底是什么用意,但是,像这样的事那时在四方面军里很正常,说不定是好心当成了恶意。于是,他给笔者讲了四方面军中的一些有关情况。他说,那时不像现在,部队供应由后勤部管。当时像我们这当军长的,既要打仗消灭敌人,又要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还要负责全军的穿衣吃饭,担子很重。有时遇到一个好的富裕一点的防区好办,如果是在贫穷地区,就束手无策。但是,四方面军有一个好传统,几个军之间不分彼此大

家相互支援。我富裕一点,可以支援你,你富裕一点,可以支援我。这种支援,除了把军里的收获尽量向总供给部上交外,有时,军里领导有事到兄弟军去,知道他们有困难,就带上一点钱去,这钱虽然是交到个人手中,但绝不是给个人的,是给部队的。部队之间,相互送钱和物资,在四方面军中,有不成文的规矩,首长接收后,要统一交到供给部门。那时当首长的吃饭和战士一起,穿衣统一做,住宿也在一块,你把钱拿在自己手上,也没法用,钢洋那么重,还是个负担呢!

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遭到朱德的坚决反对,张国焘怀恨在心,多方迫害朱德,一天夜里,派人偷走朱德的战马杀了。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不仅导致那些原本严谨的学者在其著作中采用,更给那些善于制造耸人听闻效果的“纪实”作家,提供了大施拳脚的空间。其中有的添油加醋,编成了故事“续集”,张国焘以朱德的战马肉,特设“马肉宴”“宴请”朱德,以此故意侮辱他,遭到他的怒斥后,又软禁了他。

对于这一说法,笔者的第一感觉是造假。试想,若真此事,当属土匪行为。而这种行为,不仅红军里不可能出现,就是正规的国民党军队里恐怕也不会出现。红四方面军中,军法极严,宰杀战马是死罪,决不可饶恕,谁也不会舍身试法。如果哪个干部战士真的这样干了,就是张国焘也救不了他,哪怕他是受张国焘指使的。

这一说法一出,一些四方面军老同志忍不住了。陈明义,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时任红军总部参谋。余洪远,成都军区副政委,时任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负责为红军左路军筹集粮食物资。当时都在朱德、刘伯承身边,并与他们的夫人康克清、汪荣华十分熟悉。他们一起找汪荣华、康克清“喊冤”。

余洪远的次子余昂向笔者介绍了这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父亲和陈明义叔叔一起进来。他们给北京的汪荣华(刘帅夫人)打电话。我就在旁边听着。开始是父亲讲,后来是陈叔叔讲。由于电话音量比较大,我也能听出他们的对话。我听出来了,他们是对有的

文章不满，那些文章说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对朱德、刘伯承如何如何，还有杀朱德战马的事。父亲对着电话说，汪荣华同志呀，您也知道呀，我们那时都在一起呀，我们对总司令、总参谋长都很尊敬呀，生活上也都很关心呀，您也都见过的呀，哪有现在说的那么多事呀！现在这样说不太对嘛！汪荣华回答，哎呀，那些文章我也没看，这样写不对，当然是不对的。父亲和陈叔叔对那些所谓为难朱德、刘伯承的谣传很不满，他们都忍不住分别给汪荣华和康克清打了电话。”（笔者访谈记录：《余昂谈父亲余洪远》2007年12月12日）

另一位当事人也出来说话了。林木森，20世纪80年代初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年，他正是朱德战马丢失的亲历者。他这样说道：“据说有个同志写文章，说是张国焘派人把朱老总的马偷着杀了。不是那回事。这件事我知道。那是1935年9月，我们红四方面军长征走到阿坝。当时我在军委警卫营一连任警卫排排长。警卫营编制三个连，一连负责内勤，武器装备全是短枪，全连有一百多架盒子。二连装备的是四川造快慢机，三连装备的是步枪，这两个连负责总部机关的外围警卫。我们随总部机关一起走，一起住。在阿坝，朱总司令骑坐的两匹马以及随从的坐骑，共六七匹牲口，拴在一间看去好久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这间空房子还有个破破烂烂的后门，是我们捡砖头现堵上的。夜里，被蛮子（即指当地少数民族）挖墙把马赶跑了，谁也不知道。后来，其中的一匹骡子挣脱跑回来了，这才发现马丢了。当时，还是我去通知警卫营出去找的，但没有找到。于是，总部就从三十军要了几匹马，因为当时三十军驻地离总部近。要马的是一局局长周子昆去要的。这件事，朱老总当时的警卫员潘克文（现仍在北京哪个单位工作）清楚，康克清同志也知道。”（北京军区红四方面军回忆录写作组《资料选编》第20期，1981年12月14日）

朱德虽然从一方面军来，但他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又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在红四方面军军中，享有崇高威望。长征路上，对朱德这位年已五旬的老人来说，有马与否，绝对是大事。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干部极为关心总司令的马怎么样，出毛病没有，经常还有干部特别挑选最好的战马送给他。比如，“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

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汪乃贵同志特意选了4匹好马送给了朱总司令。”（高厚良、陈明义、王政柱：《缅怀徐帅学习徐帅》1991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关于汪乃贵给朱德送马的事，汪乃贵曾亲口对笔者说过。汪乃贵说：“给总司令送几匹马，我们心里也快活。”（《汪乃贵将军访谈录》1988年6月6日）这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怀。

1935年9月10日，红军右路军中的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后，左路军中朱德、张国焘之间的确出现了矛盾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始终限制在党内正常范围之内。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始终崇敬和爱戴朱总司令。张国焘尽管对朱德不支持他深为不满，但是，慑于朱德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出于他继续争取朱德的个人企图，因而对朱德也绝没有胡编乱造出的那种言行。朱德虽然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但是，从维护革命大局出发，他对张国焘，也是一手讲斗争，一手讲团结，对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他耐心开导，循循善诱，千方百计推动党和红军内的团结统一。谁都明白，大敌当前，内斗只有死路一条。既然不能北上，就得打出一片地盘，保存红军，所以，朱德和刘伯承都参与了制定南下作战计划。南下期间，朱德十分关注战局，深入前线指导作战，他十分喜爱红四方面军这支生龙活虎、英勇善战的部队，他热情帮助各参战部队深入总结经验教训，留下了大量著作文章。应该说南下期间，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一起，心情是愉快的。哪里有什么“迫害”“软禁”之类的事情发生？

那么，“杀战马”之类的荒谬说法究竟怎么出笼的呢？笔者终于从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中得到了答案。10年前，某军旅作家写了一部红四方面军“纪实”的书，洋洋七八十万字，其中编造了很多丑化红四方面军的情节，洪学智同志看了很生气，把我们几个人找去，要我们写批评文章，还指示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与出版社和有关部门交涉。笔者与该书作者作了电话沟通，我问您的这些材料哪里来的？作家也很坦诚，直言相告，他说他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不太熟”，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地方也大都还没去，接触的亲历者也不多，书中的一些情节除了一部分“是我自己设计”的以外，大部分是从其他的材料里面看到的。

这就够明白了!如果再赶上一个“路线决定一切”的年代,为了斗争的需要,一切事情往路线斗争上挂钩,没有事例编造事例,公然造假无所顾忌,要红红个透,要黑黑到底,什么样的“产品”不出来?

不过,对历史造假是不成的,迟早会恢复它的真实面目。■

(作者为著名军史学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代购代邮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 费 |
|----------------------------|----------------|--------|-------|
|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 埃德温·J·丁格尔 | 36.00 | 7.00 |
|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 龚小夏 | 28.00 | 6.00 |
|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 史景迁 | 19.60 | 6.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 锐 | 22.80 | 6.00 |
|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 杨继绳 | 42.00 | 7.00 |
| 通往立宪之路 | 刘刚 | 60.00 | 8.00 |
|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 张木生 | 58.00 | 8.00 |
| 文人陈独秀 | 石钟扬 | 39.00 | 7.00 |
| 从“东欧”到“新欧洲”——20 年转轨再回首 | 金 雁 | 48.00 | 8.00 |
| 普列汉诺夫·陈独秀·顾准 | 靳树鹏 | 30.00 | 6.00 |
|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 谢 韬 | 49.00 | 8.00 |
| 帝国崩溃前的影像——晚清连环画中的晚清社会 | 荆诗索柯岩初 | 55.00 | 9.00 |
| 聆听历史细节 | 王 凡 | 36.00 | 7.00 |
| 高尚传 | 戴茂林、赵晓光 | 59.00 | 7.00 |
|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 冯亚光 | 126.00 | 12.00 |
|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 邓 鹏 | 97.00 | 10.00 |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施用勤译 | 58.00 | 8.00 |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 150.00 | 12.00 |
|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黄宗良等 | 246.00 | 20.00 |
| 国学大师之死 | 同 道 | 29.00 | 7.00 |
|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 梁漱溟 | 28.00 | 6.00 |
|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 雷 颐 | 29.80 | 7.00 |
|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 梁漱溟 | 43.00 | 8.00 |
|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杨奎松 | 88.00 | 10.00 |
|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 何 方 | 39.80 | 7.00 |
|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 28.00 | 6.00 |
| 党员、党权与党争 | 王奇生 | 48.00 | 8.00 |
| 望九球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 白永达 | 22.00 | 6.00 |
|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 肖复兴 | 25.00 | 6.00 |
| 国家记忆 | 章东磐 | 98.00 | 10.00 |
|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 乔云华 | 58.00 | 8.00 |
|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 38.00 | 7.00 |
|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 丁三著 | 32.00 | 7.00 |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 49.00 | 8.00 |
|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 金以林著 | 48.00 | 8.00 |
|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 尹家民 | 95.00 | 10.00 |
| 历史:何以至此 | 雷 颐 | 28.00 | 6.00 |
|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 徐 孔 | 29.80 | 6.00 |
| 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 | 沈志华主编 | 148.00 | 12.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6.00 | 7.00 |
| 三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四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张闻天在 1935~1938 | 张培森主编 | 17.00 | 6.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 杨天石 | 60.00 | 8.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 杨天石 | 38.00 | 6.00 |
| “中间地带”的革命 | 杨奎松 | 54.00 | 9.00 |
| 牛棚杂忆 | 季羨林 | 29.00 | 7.00 |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 林贤治主编 | 38.00 | 7.00 |
| 南海人物春秋 | 顾保孜 | 78.00 | 7.00 |
|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 李立宁 孟新 | 48.00 | 7.00 |
|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 孟庆春 | 49.80 | 7.00 |
|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 侯井天 | 98.00 | 11.00 |
|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 朱 正 | 26.00 | 7.00 |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吴 思 | 28.00 | 6.00 |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 吴 思 | 28.00 | 6.00 |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 28.00 | 7.00 |
|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 李新著 陈铁键整理 | 39.00 | 8.00 |
| 官场怪圈定律 | 李茗公著 | 46.00 | 8.00 |
| 走出个人崇拜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薄一波 | 88.00 | 11.00 |
| 夹边沟记事 | 杨显惠 | 34.00 | 7.00 |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 沈宝祥 | 39.80 | 8.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5.00 |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再版,对社会阶层固化、阶层冲突、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新的剖析。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吸毒者、性工作者、罪犯等社会群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了改革前后三十年来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利益诉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变化发生,还指出了这些群体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本书批评了当前种种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指出了走向社会公正之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为了达到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目的,就得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即: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作者为美籍华人,2009 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与弗吉尼亚州议员竞选,她亲身经历了西方民主选举的全过程,为读者展示了美式民主最为真实的操作细节。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一位英国记者亲身经历的辛亥巨变,这是一位在华普通的外国人对当时时局的切身感受,作者第一时间采访黎元洪、唐绍仪、萨镇冰、张彪、胡瑛等辛亥风云人物,最真实客观的记述那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罗隆基人权与法治史观

○ 刘志强

考察中国人权史，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罗隆基作为 1929 年~1931 年那场“人权论战”的主将，通过撰写大量的有关人权的文章，系统构建了其人权理论体系，并以此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独裁的本质。他的人权理论与观点不仅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政治活动的基础，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政治实践。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座丰碑。

一、何为人权、法治

什么是人权？罗隆基认为：“人权的意义，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凡对于下列之点有必要的功用的，都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都是人权：（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用“功用”的原则来独创一种人权条件说，强调做人的必要条件，即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这说明罗隆基受功利主义学派的影响。依笔者的理解，罗隆基的人权概念，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是其概念的总揽，衣、食、住的权利，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一层意思；身体安全的保障，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二层意思；个人养成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为其人权概念的第三层意思；达到完成人群至善，享受最大幸福的必须条件，为其人权概念的第四层意思。他的人权的形态是基于人性要求，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群体（社会），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层层演进的过程。以此为逻辑的起点，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就演化为从人权到国家关系，从人权到法律关系，以及人权时空与人权范畴关系的构建，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什么是法治？罗隆基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

含有三层意思：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处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要注重“法定的手续”。第三，在法治的国家，一切罪案，要法律上有详确的定义，肯定的范围。也就是说，法治就是以法治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事，依法治罪。罗隆基认为，法治是治国的唯一方法，这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他说，对待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问制度不问人的一条路”。只要制度上了轨道，中国的政治问题，才有解决希望。政治制度上先决的问题自然是对国家的态度，也就是国家组织。罗隆基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因此国家对国民负有保护、培养和发展的责任。建国、救国的策略和方法都不能与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违背和冲突。法治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二、人权是宪法的根据

罗隆基认为，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法治，首先就是要制订宪法，实施宪政。没有宪法，人权无法保障。宪法如未能制订，至少也要制订一部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在他看来，宪法（或约法）不仅保障最基本的人权，而且是确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走向的基础，十分重要。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法律不能产生人权，相反，人权是法律产生的来源和

根据 ,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于保障人权。所以 ,争人权的人 ,主张法治是必然的逻辑。罗隆基把法律分为宪法和宪法以外的普通法两种 ,前者为人民统治政府的法 ,后者为政府统治人民的法。“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 ,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 ,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 ,人民统治政府的地位 ,非有宪法不可”。所以 ,罗隆基认为 ,没有宪法 ,人权无法保障。为此 ,他主张 :“争人权的人 ,先争法治 ,争法治的人 ,先争宪法”。为保证宪法和法律不被少数人或团体利用 ,罗隆基主张 ,人民必须牢牢掌握法律的制订权 ,并称这是不可被人剥夺的“革命的人权”。

罗隆基认为 ,一党专政是和法治相互背离的 ,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平民政治)的基础和原则之上。从确立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出发 ,也必须首先有宪法 ,而且必须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进行立法的工作。所以他提出 :“中国应立即召集国民大会 ,制订宪法。”1929 年的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 ,作出了以孙中山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根本法的决议。在“人权论战”中 ,国民党左、右派党员即以此为依据 ,有的认定总理遗教是中国一部不成文的宪法 ,有的则认为《中山全书》是一部成文宪法 ,总之 ,在中国已经有宪法了 ,不须再制订宪法了。罗隆基认为 ,中国目前不是要不要宪法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宪法的问题。他同时驳斥了国民党人所谓中华民国已经有宪法 ,所谓《中山全书》、《总理遗教》、《建国大纲》就是宪法的说法 ,认为姑无论这些《全书》、《遗教》《大纲》有没有宪法的内容 ,重要的是国民党通过了什么法定的手续使它们成为中国今日的宪法 ,成为全体国民应该遵守的大宪章 ,这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宪法的来源 ,只有两个 (1)人民制定的 (2)人民默许的。根本的原则是宪法一定要人民的承认。人民对于宪法某部分不同意

时 ,有法定的手续 ,可以修正。”从这个前提出发 ,国民党所谓已经有宪法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根据宪法由人民产生的原则 ,罗隆基主张必须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制订宪法和解决国是。宪法是平衡权力和权利之物。有宪法并非一定有宪政 ,宪政是法治的更高的阶段 ,法治进一步实施了宪法 ,宪法之治就是宪政 ,法治或宪政在于限制国家权力 ,以保障人权。

三、主张法治以保障人权

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 ,这是罗隆基主张法治 ,反对“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的一党独裁的理论基础。罗隆基以主权在民为基础 ,认为法治主义的关键是“人人有份的政治”。法治主义离不开议会 ,但它所要的议会是人民选举的议会 ,而不是某人或某部分人指派的议会 ,法治主义离不开宪法 ,但它所要的宪法是人民自己制定且承认的宪法 ,而不是某人或某部分人自己制订而强迫人接受的宪法 ;“法治”与人治相连 ,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而非“他人拿他们当亡国的奴隶”的被治。法治主义能实现国家的功用 ,而独裁制度则不是“达到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方法”。

罗隆基指出 :“我们是极端反对独裁制度的。我们极端反对一人 ,或一党 ,或一阶级的独裁”。其原因有三 :一是从国家保护国民权利的功用出发 ,认为国民权利安全的程度 ,以国民自身保护权利的机会的多少为准。政治的实际是谁失掉了政权 ,谁的一切权利的保障也就破坏了。而一人一党或一阶级的独裁 ,在权利的保障上 ,“自然是重在独裁者个人或党或阶级的方面。”只有在两者的权利不相冲突的时候 ,独裁者才会偶然顾念到被治者的权利 ,否则 ,被治者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做我们权利的评判员 ,只有我们自己才



是我们权利的忠实的卫兵”，只有政权操诸国民全体，全国成年的民众，都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上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的民主政治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罗隆基反对“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二是在独裁制度下，国家完全失掉了培养与发展人格方面的功用。思想自由是独裁制度的“最大仇人”，对付这一仇人的方法就是搞所谓的思想统一运动，其结果只能使国民的思想充满了懦弱、消极性、依赖性和奴隶性，甚至成为全无思想的机械，还谈何国民思想上的培养与发展呢！三是独裁制度是国家达到国民全体幸福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秩序、公道的环境的破坏者。独裁者的独特地位，根本取消了政治上的平等，抹煞了公道，自然引起被治者的不平与愤怨，成为一切革命的祸源，而在一个循环革命的社会里，当然也就不会有和平、安定和秩序。“举国大乱，境无静土”，正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目前的独裁政治造成的。

罗隆基不仅反对独裁，而且反对把独裁制度作为向平民制度过渡方法的训政。他之所以反对训政，一是认为国家组织在性质上，不容有训政这回事。二是认为人类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在经验中获得的，不可能等到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时，才允许他参政。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训练。因此“拿独裁制度为平民制度的过渡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认为，按照孙中山“权能分治”的理论，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即人民要有选举权、创议权、否决权和罢免权。然而，在一党独裁的政局下，国民党不可能把政权交到人民手中，在“党权高于国权”、“党外无党”的情况下，人民也无法走到享有四权的目的地。因此，民主民权与一党独裁是不能同时并进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条件是国家的统治权应树立在国民的全体，而不在某个特别的团体或阶级身上，“如今中国的政治……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上的榜样。天天让小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这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怎么可以同时并进呢？实际的情形是，中国国民的无权，远甚于罗隆基认为实行“独裁”的俄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因为在中国人自己的国家里，国民不可以放胆讨论国事，也不可

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主义，“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了”。

四、主张法治反对“党治”

罗隆基在他的人权理论中，主张民主政治，主要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他认为，人权只有在法治确立之下才能得到保障，颁布宪法（或约法）只是法治的基础，并不就等于法治，人权的保障除了宪法（或约法）规定法定权利外，还必须有其他相应的救济的手段。在当时国民党训政下的中国，法治作用是在于保障人权，主张法治必须要反对“党治”。罗隆基指出，国民党在“建国”、“救国”的策略和方法上走上了与国家的性质及目的相反的道路，这就是“党高于国”、“党在国上”，结果必然是“党治”代替了法治，“党规”乱了国法。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一点人权都没有，用胡适的话来说，这就是“无法无天”的政治。

1930年11月初，罗隆基遭到国民党的拘捕，亲身经历了国民党无法无天的厉害和“党治”的罪恶。这次罗隆基被捕，罪名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共党的嫌疑”，控告他的是国民党党部，通缉的机关是警备司令部，执行拘捕的是公安局，法律手续上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罗隆基认为，这种“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罗隆基尖锐地指出：“‘党员高于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党员高于法’，不止是党员不守法律，法律同时加党员特殊权利，做小党员横行的保障。”他痛心地呼吁：“这次被捕以后，根据切身的痛苦，我退一步来要求法治。法治之上又卑之无甚高论，目前且不谈约法与宪法。我的要求是：‘政府守法，党员守法，政府和党员遵守党政府已经公布的法律。’”“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

1931年5月，国民党操纵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用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化。由于罗隆基撰文约法进行了批评。7月下

旬,天津市整委会认为罗隆基该文“诋毁约法、诋辱总理”,应严行取缔,当即函令公安局查禁,同时通知北平市整委会设法查禁。不久北平新月书店被搜查,店伙被抓,一千多本3卷8期《新月》被没收。事发之后,罗隆基愤激地抗议道:“新月书店因查禁所受的经济上的损失和店伙的被捕,都是问题的小枝节,严重的是这涉及训政时期约法的尊严和中国法治的前途两个大问题。”“平津市整委会认我们‘诋毁约法’,所以主张查禁月刊,但是‘诋毁约法’远不如‘破坏约法’罪案的重大。采违法的手段,达护法的目的,这是中国人最普遍的错误。中国人根本没有明白法治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政治改进上极大的一个危险。”

罗隆基认为,法治不仅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法治的内容不仅局限在政治思想领域,而且也包括国家的财政经济。财政上的法治,就是国家应该建立预算制度,人民有国家的财政管理权。他说:“预算制不是指国家财政上预先的统计或款项上预先的支配的一种计划,而是‘国民直接或间接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种制度’。这里应注重的是‘批准’二字,它是人民行使国家财政管理权的标志。所以,预算制不止是经济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也是法治的表现。罗隆基提出国家财政实行真正的预算制,在法律上必须具备以下三条基本的原则:第一,不得人民同意,政府不得强行征收任何赋税,公债,乐输。第二,不经人民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分配并开支国家的收入。第三,国家的款项不得移作私人团体的用款。罗隆基这种把财政的预算提到法治高度来看待,的确超出其他‘人权派’的思想。他同时认为,‘国家的坏人越多,制度越重要。制度的功用在于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

五、司法独立以维护人权

法治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而真正具体体现人权的保护和维护则要落实在司法独立。罗隆基认为,“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作为法治具体内容之一,是罗隆基人权理论中一个重要观点。在罗隆基人权理论纲领性《论人权》一文中,他提出了35条必争的应有人权(罗隆基

提出的35条人权,经笔者考证其实只有34条人权。参见刘志强《罗隆基“35”条人权检正》,载《广东省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其中关于法律和司法的就有10条。他认为,司法独立的条件比较重要者有三:“(一)行政长官绝对无权解释法律及执行司法的职权;(二)司法官非有失职的证据,不得随意撤换或受惩罚;(三)司法官不得兼任他项官吏。”违反此三条,就是侵犯司法独立。罗隆基指出司法独立在于:“(一)非司法人员,不得执行司法职务;(二)人民在任何情形下不受国家司法制度以外特殊法庭——例如宗教法庭,军事法庭等——等审判”。罗隆基还主张国家司法官吏应选举产生,不得受宗教及政治信仰的歧视,不得有保荐及贿赂的弊端。司法官吏和法庭应向国民全体负责,不向任何私人或团体负责。无论任何人,不经司法上的法定手续不受逮捕、检查和收押;只有经过法庭的判决,才能受到惩罚。只有司法独立,人民在司法上才能受同等的待遇,受同样的法庭审判,受同样的法律制裁,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才有意义。

在国民党统治下,由于司法不独立,造成政府、党部和军警随意干涉司法和滥用司法的混乱局面,罗隆基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激烈的抨击。他指出,在党治的制度下,“个个党员是军警指挥官;个个军警机关是国家的司法部。”“党员指挥军警,军警代行司法,在地方是如此,在中央亦如此。”他说:“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查查各地的警察厅,看里面尚有多少被押的人民?再检查各军营,各衙门,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受罪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有钱有势者,偶有保释的生机;无依无靠者,永无逃刑的活路。有冤莫白,举国狱啸;无辜被戮,遍地鬼哭。这就是如今的实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

罗隆基尤其反对军警执行司法。他认为,普通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不应受“军人纪律”的管辖。而且他推崇英国实行的无论什么时期,军事法庭都不可取代普通法庭的规定,认为这是英国司法独立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应该采取的原则。

六、法治真义在于政府守法

罗隆基认为,国家有了宪法,有了独立的司法机关,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有实现法治的可能。关键还要看政府有没有真正按法律办事,遵守法律的精神。

罗隆基呼吁人权,主张法治,主张民主宪政,结果招来的是被拘捕、被辞退和国民党报纸上的人身攻击。而这一切,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在“依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国民党政府也在不断地制定和公布法律,但有法是一回事,执不执行又是一回事。国民政府一边公布“人权命令”,一面又在肆意践踏人权;一面下令禁止军警机关受理诉讼、干涉司法,一面军警照样随意抓人捕人。罗隆基认为,法治的前提当然是应该先有法律,所以他说:“好法律胜于恶法律,恶法律胜于无法律。我们如今依然是这样相信。”有了法律之后,法治更重要的是遵守法律的问题,罗隆基说:“法律,从一方面说,亦可以看做有机的东西。他的完美,亦要经过演进的程序。对法律的将来,我们绝对不悲观。我们觉得走上法治的轨道,重要的条条,是守法的精神。是全国人民站在平等的地位,遵守法律的精神。在‘法治’上,‘智者做法,愚者守法’的传统思想,一定要打倒的。”因此,“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罗隆基指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是政府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是“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

政府守法的精神,首先就是政府要承认法在人上,承认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国家里有权力有特殊地位的人,可以凭他的喜怒好恶,不经法定手续,操人民身体、财产、言论等自由之权,这是天下极危险的事。所以,罗隆基指出,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是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

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其次,执政者有守法的精神,就是要执法者对犯法者,有依法办理的步骤。这就是美国宪法上关于“法律的正当手续”的规定。罗隆基认为,美国宪法的这条规定,是美国人民身体、财产及一切自由上最大的保障,是美国法治的基础。而它之所以起这么大的作用,是因为“法律上正当的手续”的功用,是在有法律限制政府官吏,在人民的权利上,又是有法律限制约束一切越职、侵权、专横、独裁的行动。只有“执政者这一类的行动,有了约束,才有法律行使职权的余地,才有法治可言。”任何人犯了法,政府只能采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凡是越职、侵权、专横、独裁的行动,都是违背法治原则,都是破坏法治。比如张三杀人劫货,张三是犯法,李四执张三而杀之,李四依然是犯法。张三没有犯李四的法(法是国家的),李四非执法之吏,这是主张法治的人,应根本明白的。“法律上正当的手续”这种限制,是给张三犯罪者正当的保障,是给李四越职侵权者的限制。在法治国家,任何罪案,都要依法律来检举,来判断,来惩罚,以防止人民的权利被侵犯,及被侵犯后能及时补救。罗隆基指出,中国上不了法治轨道的症结,就是执政者缺乏依法办事的精神,“中国一班执政者的习惯,法律条文自为法律条文;个人行动自为个人行动。要人的字条,官吏的电话,团体的公函,随时可以发挥司法上的效力。党部衙门,军警机关,随时可以自动执行司法职权。在人民方面,如今亦找不到安分守法的原则,只有听天由命的活路。横祸之来,严同触电气、遭雷打、染时疫一样的意外。偶然被劫,不知其所来,幸而被免,不知其所然。”也就是说,人权被侵犯,说到底主要是来自公权力的政府的侵害,政府不守法,不知法,人权谈不上保障,而法治就在于既限制人们,更限制于公权力政府的恣肆侵权。

七、结语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以其人权理论为旗帜,强烈地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主张法治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幻想对其加以改造走上民主法治国家。他对人权与法治等有关的阐述,把握住了人权理论的

精髓,这是他人权理论的价值所在。

在“人权入宪”宣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罗隆基的人权与法治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人权与法治材料。人权与法治是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两个核心方面内容,人权是法治的目的,法治是人权的护卫。人权的普世性决定人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性,不论是“姓资”还是“姓社”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一般而言,侵害人权主要来自公权力的异化,因而制约公权力则是人权法中第一原理(以本人的理解,在人权基本理论中,本人认为,对抗权是人权法的第一原理,合作权是人权法中第二原理。)也是建构法治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公权力无制约则人权保障是空谈。故,公权力无制约则无人权,公权力无制约自由无保障,公权力无制约则无法治,公权力无制约则无平等,公权力无制约则无秩序,公权力无制约则无公平。从这意义来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规制公权力的法治比单务指向

的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显得极为至切。法治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权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化保障来限制国家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从而加强执政合法性。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如果国家不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循自己制定和颁布的现行法律,那么规则就会逐步变得形同虚设,政府也势必失信于民。如果现实中存在超法规的特权和践踏规则的政治行径,那么公民的守法精神也就根本无从谈起,秩序只能乞灵于强制力。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或有所不周全,但他的思想决定了他的高度。遗憾的是,这位一生追求人权理想的斗士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

(刘志强,历史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教授。同时兼职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文原有大量注释,为篇幅所限,没有刊出,需要者请登陆本刊网址参阅本文网络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图 书 介 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 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

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我打地主堂曾祖母

○ 黄仪瑛

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也过“古稀”之年了。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时回忆起少年时用竹枝打长辈——虽然出于被逼的,也不忍心打——的事,良心上仍然受到很大的折磨,有时很痛苦、很内疚。感到不公开忏悔,内心无法得到安宁。

1936年12月,我出生在广西省邕宁县(现已划入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镇)一个壮族家庭。我们这个自然村李姓是大姓,有30户人,黄姓为第二大姓,有14户;另有杨姓2户。1952年土地改革时,李家划2户地主,一户富农;我们黄家也划2户地主,一户富农。我家有田地不足15亩,祖父已60多岁,祖母50多岁。我五岁时,父亲被人打死了,母亲只有23岁就成了寡妇,家中劳动力只有母亲和50多岁的祖母。耕牛一头。

大约在1948年,李家有一户人是我家的亲戚,他家孩子多,生活很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来要求我祖母,让他的大女儿(我叫她表姐)到我家来劳动,能活命就成了。当时,我家的经济来源是靠种田种地,虽然有10多亩耕地,但是广种薄收,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不用愁温饱,但一旦年景不好,所打的粮食也不够吃和支出,也不得不向人家借谷渡过荒年。到1951年才还清债务。表姐到我家大约一年左右,就出嫁,离开我家了。我家因劳动力少,又缺少耕牛,在农忙时,舅父、姑丈,还有一些亲友带耕牛、农具帮忙耕田种地一两天。我家虽不放高利贷,但雇长工(表姐)、短工进行剥削,土改时就划为地主成分。家中的主要劳动者母亲,虽然年年含辛茹苦参加劳动,但是“当家人”,就定为“地主分子”。不过,我家要赔还贫雇农的“血汗钱”是全村四户地主中最少的,折合谷子3000斤,刚夏收完,另向亲戚借了1000多斤,就赔清了,成了“守法地主”。

而堂曾祖父、曾祖母一家因要赔还贫雇农的血汗钱折合谷子1万斤,还不到一半,又无处可

借,土改工作队和农会认为他不老实,顽固抗拒,就定为“不法地主”。

一天晚上,我和小我3岁的弟弟被贫农成分的堂祖母叫去(她家是“土改根子”)。她和一个陌生人(大概是土改工作队队员吧)对我俩说:“你家是‘守法地主’,今晚要斗争‘不法地主’黄××的老婆。你两兄弟要去参加斗争大会。在斗争大会上,她要是不老实,我们贫下中农喊‘她不老实,顽固’时,你们就用竹鞭子用力抽打她,叫她老老实实。如果她再不老实,就再用力抽打她。你们两兄弟如果不打她,打她时,不用力抽,连你们一起斗争”。

当晚,我和小弟弟走进会场中间,周边是黑压压的男女老少贫下中农包围着我们。我们害怕极了,心头跳得很响,像跳出喉咙来了。贫农的堂祖母递给我和小弟弟各一根准备好的竹鞭子,有大人手指般粗,弯弯的,很韧,不易断,抽打起人来,皮肤有刺心机的疼痛。

斗争会场上,突然喊起的口号如炸雷般震天响。虽不是斗争我,但15岁的我和未满13岁的小弟弟生来从未见到这样吓人的场合,害怕极了,特别是听到会场上喊起一阵阵“她不老实,就打死她”时,手拿鞭子的我,全身发抖,小弟弟被吓得尿裤子了,但不敢哭出声来。当看到堂祖母等人咬牙切齿逼我带头抽打地主婆堂曾祖母时,开始,我实在不敢举鞭子抽打在她身上。我实在无法违抗,更不能有丝毫的抗拒,我只好壮起胆子,举起手中的鞭子。可是打下去的力量却很小。我身边的小弟弟如失魂落魄,被吓惊呆了。会场上的贫农堂祖母等人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在月光下闪亮闪亮的,像一把把尖刀一样对着我刺来,威逼着我。她带头喊出:“你这个地主仔不出力打,我们就连你俩兄弟一起斗争,一起打。”当时,我为了不挨斗争、不挨打,更为了年少的小弟弟也不被斗争、不挨打,于是,我就举起竹鞭子,往地主婆的堂曾祖母的身上

抽打下去，一鞭、二鞭……

虽然已过去 50 多年，但我记忆犹新。我每抽打一鞭，小弟弟也跟着我抽打一鞭时，堂曾祖母的身体就连抽搐两次。但她却不知疼痛似的，始终没有哼一声，默默无声地忍受着。

到了第二天，听到一些贫下中农说，要我和小弟弟在斗争地主婆的大会上，用鞭子抽打地主婆，是“以毒攻毒”。原来如此！

我家和地主婆的堂曾祖母与贫农的堂祖母，同是一个高祖的后人。每逢“红白喜事”——婚丧都一起操办；多少代人以来，一直无冤无仇。土地改革，我们变成了敌对两个阶级的人了。我和堂曾祖母，同是地主成分，我是地主仔，她是地主婆。想当年，我为了自己不被斗争，不被打，却举起鞭子抽打到堂曾祖母的身上！不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恐惧的记忆，也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内

疚。1954 年我就离开家了，由大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和姐夫——把我抚养成人。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年代里，我为了和地主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实际我无时不想念我家中活着的祖母、母亲和小弟弟）。我一直多年不敢回家。真庆幸，这一切终于都成为过去了，成为历史了！

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曾想回故乡看望家中亲人时，顺便登门向堂曾祖母“谢罪”，但因时间太忙，又各择另一座山边建了新居，她又不闲在家，无机会相见面。后来有时间回去了，她却早已离开人间变得阴阳相隔了。如今，我唯有以此文作为忏悔，以释放出压抑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内疚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编读窗

对《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的几点意见

○ 王伯惠

《炎黄春秋》今年 7 月号载《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是近年报刊概略介绍孙立人身世、评价其抗日业绩的文章中，最切实公允的、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但其中有数处与当年史实略有出入，谨提出几点供参考：

1. 孙立人沪战伤愈后“立即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实际是孙回武汉后得知沪战后税警总团已撤销，改编为 44 师，驻守河南归德，日军进犯时师长竟不战而溃逃，孙十分痛心，辗转找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经孔批准在长沙收容原税警总团在医院伤愈出院伤病员和各地流散旧部 2000 人，重新组建财政部缉私总队，并去云南招纳一批新兵，先后又组成 6 个团，驻贵州都匀练兵，孙被任命为中将总队长。

2. 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孙立人将军奉罗卓英之命亲率 113 团星夜驰援”，实际是：罗卓英命副师长齐学启率 113 团往援，孙以此役关系重大，以我军一个团 1000 人的兵力去抗击日军两个联队约 7000 人的固守，弄不好自己会被全歼，因此除遵命出兵外随即星夜赶到指挥部见罗卓英，要求亲去指挥。到时已夜 9 时，罗已入睡，参谋长杨孔业接见，谈到午夜两点，杨仍不同意，孙乃告杨：自己必须前去，至于责任问题，只有等任务完成之后再承担。随即抗命驱车赶去正向仁安羌徒步疾进的 113 团。

3.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英国政府的政策一开始就是“弃缅保印”，不是仁安羌战役之后才决定的。

4. “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在当时医院疗伤”。在仁安羌被围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是斯高特（Scott），当时在英法尔养病的是其上级英军第一军团长史利姆（W·J·Slim）。

5. “共击毙日军 3 个联队长以下 3.3 万余人，伤日军 7.5 万余人”。新一军缅甸战果有多少个版本，孙立人后来又受到两蒋的冤诬软禁，将孙的业绩肆意压缩。最可信者应是在新一军凯旋回国到广州受降后，在广州白云山麓修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时孙立人亲撰的“碑记”中所述：“二年以来……迭克重镇，归复土地六万平方公里，毙敌官兵七万四千人，伤者倍之，而我将士壮烈成仁者亦及万余”。

6. “1945 年 1 月 27 日，新一军与滇西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奏”。按：芒友在中缅边界缅甸一侧，在中国侧为畹町、芒市。芒友会师大会上，滇西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在会上致辞说：“今天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去，在那里会师”。

（作者为原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翻译官和技术军官）

个人出书、单位出书约稿通知

一、约稿范围

1、文史类书稿 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年鉴、地方志、历史与文化记录、历史事件实录、或其它历史纪实作品等；

2、社科研究著作书稿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与伦理、历史研究、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文学类书稿 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个人专著、作品集；

4、小说类书稿 历史、当代商战、言情、武侠、反腐等各类题材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作品；

5、美术类书稿 绘画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作品集；书法类：毛笔、硬笔、篆刻等作品集；摄影类：风光、人物、旅游、收藏等专业或业余摄影作品集。

6、其他学术研究著作 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教育教学等领域学术研究著作、论文、各级课题研究成果等；

7、博客博文 各类题材以及不限体裁的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

二、书稿要求

书稿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可以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

多人合集可以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每位作者单独或多篇作品字数应达到3万字以上。

三、出书办法

与出版社合作，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其中国内出书的，由国内相关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可以以丛书形式出书（如：社科文献论丛、探索文库系列）和单独出书。书稿达到出书水平的，按合作出书方式的办法；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的办法。

四、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2、约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3、来稿请勿寄原稿（手稿），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4、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书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要求，作者可要求退稿（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5、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6、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文史类：《哲学大师冯友兰》 社科·心理研究类：《人体波动原理》 美术·绘画类：《虎妞历险记》 长篇小说类：《梦幻终点》 社科·励志类：《第七大营养素》

咨询热线：010-80547239 010-86878776 010-52837796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编著中心（收）（邮编100025）

在线投稿：bookgj@126.com；chuban@188.com 联系人：穆乔 QQ：1025410080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4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籍,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9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家史家谱

(三年出版一千余种, 欢迎来书店参观洽谈或来电咨询)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 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 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家史家谱: 先烈纪念集、先辈遗文集, 家族百年史、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一般32开本, “家族史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 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 内文黑白胶印, 胶装或线装; 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 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 只用于交流与赠送, 需要书号发行的另行协商。北京客户上门服务, 外地客户来电说明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 010-6892 0114 6892 0399 6252 5116

接待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 (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 编: 100080

单 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net)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题词选登

初念炎黄春秋在研史知
史及中共党史和中國
史以代史的工作下取
得輝煌成就

才光達



言三子

二十年来炎黄春秋以对党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伪存
真以史为鉴留下了许多宝贵
的历史资料发表了探索
改革开放建设繁荣民主公正
和谐社会的文章为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朱良



扶别 史封 历史之精髓
化解 改革 开放中难题
喜看 炎黄 子孫 遍天下
何愁 华夏 文明 不复兴
《炎黄春秋》留念

吳泉敬賀 二〇一〇年
六月一日

兼容并包
廣納智慧

祝頌炎黃春秋期刊廿周年來
成績斐然 二〇一〇年七月

李寶光



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

长征中几个细节的考辨

荣经“五九事件”

走出伪民主误区

批判陶行知始末

远征印缅见闻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